

世代



謀身肯信貧難忍

食指其如累不輕

見說湖南風物好

何時去買薄田耕

文徵明



世
代

目录

卷首语 / 许宏

11 支持研究创作：一本美国杂志的生长环境 / 许宏

56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 / 丁祖潘

82 工商团契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及影响 / 曹志

134 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时间问题 / 孙毅

146 沃格林、哈耶克……的赞助者 / 许宏

封面、封底：《从威廉斯堡看纽约及周边》/ 以利法列·布朗、埃德加·福尔曼

封二：《寄陈以可乞米》节选 / 文徵明；《潇湘八咏》部分 / 文徵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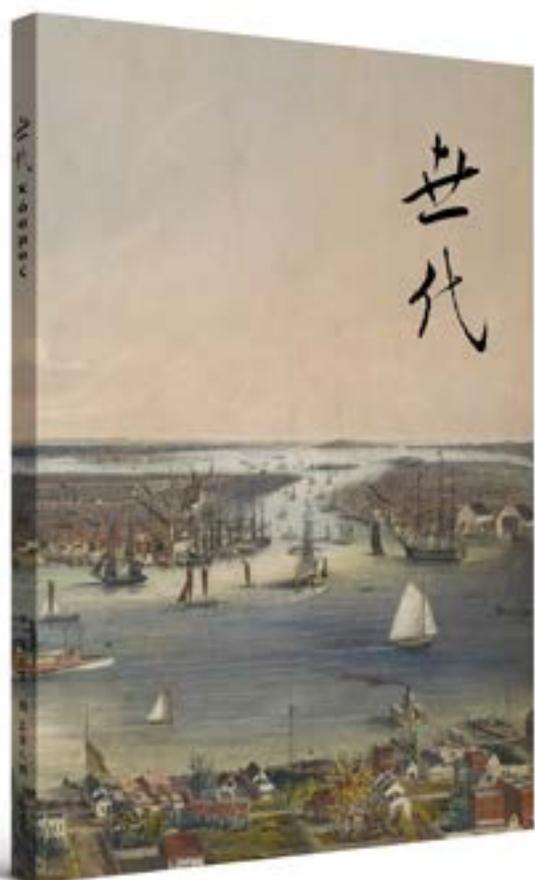
封三：《基金会》/ 约珥·弗莱士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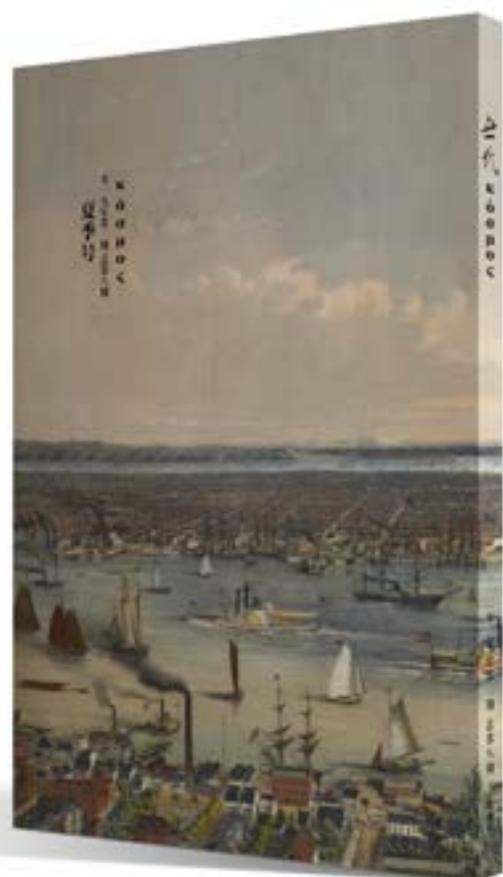
封面题字：世代 / (明) 王宠、(宋) 陆游

网站：www.kosmoschina.org 微信：世代Kosmos 邮箱：kosmoseditor@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卷首语

文 / 许宏

一

每一位写作者，可能都有过第一本让其大块朵颐的思想杂志。他遇见的那本，是《首要之事》(*First Things*)。

在写下这样文字的时候，他即将离开《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成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历史上最年轻的言论版专职专栏作家。

那是2009年1月8日。29岁的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之所以特地提起《首要之事》，是由于该杂志的创办人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 1936—2009)在那天离世。

多塞特已经不记得他父母是何时开始订阅《首要之事》。可以肯定的是，此本杂志是他十几岁的时候最重要的读物之一。在其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中，他也读同龄人通常会遇见的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 1874—1936)、路易斯(C. S. Lewis, 1898—1963)等人的作品。

不只如此。这本杂志带来的熏陶使得多塞特在成年之后进入美国现代公共空间的重要位置，从事政治、信仰、文化方面的评论工作。⁽¹⁾

别说在中文世界，即使于英语世界，恐怕很少人听说过《首要之事》。

但是，这本问世于1990年纽约的月刊所影响的人却远不止多塞特。对于熟悉它的有些人而言，《首要之事》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探讨传统基督信仰与公共生活的媒体。⁽²⁾

或许更少人关心的，是《首要之事》这样小众的思想类杂志是如何不仅经历了将近30年还可以存活下来而且仍在生长。这离不开其支持者及所在的环境。怎样培育如此鼓励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是《世代》第8期关注的主题。

二

从多塞特的例子看，《首要之事》的支持者包括多塞特的父母和他本人。这种有着家庭传承的支持，既为一本思想杂志的持续存在做出贡献，又给该家庭的至少两代人带来益处。

根据多塞特的回忆，正是在他父母于信仰上的探索以及他由此所受的潜移默化中，这个家庭开始与《首要之事》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³⁾

然而，如果仅仅依靠这样家庭的订阅，《首要之事》或类似顶多只有两三万付费读者的思想杂志仍然难以维持。它们还需要具有一定规模而且持久的赞助。在现代西方，尤其在近百年来的美国，这样的支持往往来自不少基金会和众多个人的捐赠或者投资。

在现代西方的公共空间，即使在美国，类似《首要之事》有着传统基督信仰背景的思想杂志是罕见现象。

在现代西方公共空间的思想界，包括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出版社，对传统基督教持批评或反对立场的自由派既是此空间的重要塑造

者，也是此空间形成之后的重要角色。

在此过程中，持传统基督信仰的人逐渐从该公共空间退出，其活动范围主要限于教会和神学院之内。

近几十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些许改变。《首要之事》的出现并持续至今是此变化的显著表现之一。

它的存在和影响，显示了一个群体的兴起，其中既有纽豪斯这样已经过世的拓荒者，也有多塞特这样年轻一代的受惠者以及将此群体价值观带入自由派媒体的后继者，当然还有多塞特的父母那样中间一代的传递者。

在《首要之事》以外，也有跟此杂志相关却不同的其他群体。比如，于1995年创建《书与文化》(*Books & Culture*)杂志的一群学者和出版人。

在信仰的道路上，纽豪斯和多塞特都曾有过从基督教新教转向天主教的经历，而《书与文化》的创办者们则多是新教福音派成员。后者主要在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和出版社推动了传统基督信仰与历史、哲学等领域深入关系的探究。

但是，《书与文化》在2016年底宣布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被迫停办，则反映了美国新教福音派思想界在现代公共空间仍然需要面对如何长久生存并发展的问题。

从另一角度看，这也表现出美国新教福音派思想界的分立状况。有些个人和基金会的支持投向了《书与文化》之外的杂志和研究机构或项目，牵涉政治、商业、艺术、社会学、新闻学、自然科学、人文地理、古典基督教等不同领域。

而在上述几个群体之外，还有基督教新教自由派背景的基金会和个人

向他们认为的信仰与科学未知领域的探索提供了丰厚的赞助和奖励。

以上涉及基督信仰与各领域关系研究及创作的群体和个人，散落在西方现代公共空间的思想界各处。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获取的多样支持，折射出具有多重层面及意义的基督教对于西方世界尤其美国的重要影响仍在继续。⁽⁴⁾

三

对于《世代》而言，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问题不光是关乎现代西方公共空间思想界之中基督信仰与各领域的状况。

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陆，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各领域专业人士有机会接触或接受基督信仰。他们中的有些人关注这个信仰与自己所在或感兴趣领域的关系问题。

他们发现，这些领域在历史展开中的很多时候或方面往往与基督信仰有着重要关联，无论在近一千多年来的西方还是近几百年来中国或东方各地。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大陆，这些触及西方文明和人之生存深层根基的关联基本被国家意识形态和多样的流行思潮所遮蔽。近年来，这些关联在比如自媒体和出版机构的中文世界公共空间开始得到挖掘和梳理，有些像《首要之事》、《书与文化》等杂志的相关者在英语世界的现代公共空间所做的事情。

然而，这方面在中国大陆及更广阔中文世界的尝试还远没有像在西方那样有着丰富的沉淀和支持，虽然在西方也不乏挑战。在中国大陆，这方

面的尝试依旧面临着可能随时被中断的状况。

《世代》在 2019 年夏季号提出并初步讨论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问题，意在期盼涉及基督信仰和各领域深入关系的探索可以在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处长久生长下去。《世代》也藉此向在过往及将来对无意或有意培育相关支持机制的各界人士表达谢意。

这个支持机制离不开政治、经济、信仰、文化等各种资源既相对聚集又彼此分立且自由流通的世界。在美国现代公共空间的成型之中，一百多年来的纽约可能是此方面最典型的景象之一。本期《世代》封面封底展现的是《首要之事》所在的纽约于 1848 年时的样子。^{〔5〕}

正是在 19 世纪中期，美国现代公共空间的思想界开始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这样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出现。^{〔6〕}

美国历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1845 年至今)就在那个时期的这几个城市开始发行，总部则在纽约。

在该杂志创刊号致其支持者的公开信以及另一篇文章中，都有谈及自然科学和基督信仰的言论，体现了当时美国科学界与基督教之间既相联又复杂的历史关系。^{〔7〕}

而多塞特目前及曾经任职的《纽约时报》(1851 年至今)、《大西洋》(1857 年至今)也是分别创刊于那个时期的纽约和波士顿。^{〔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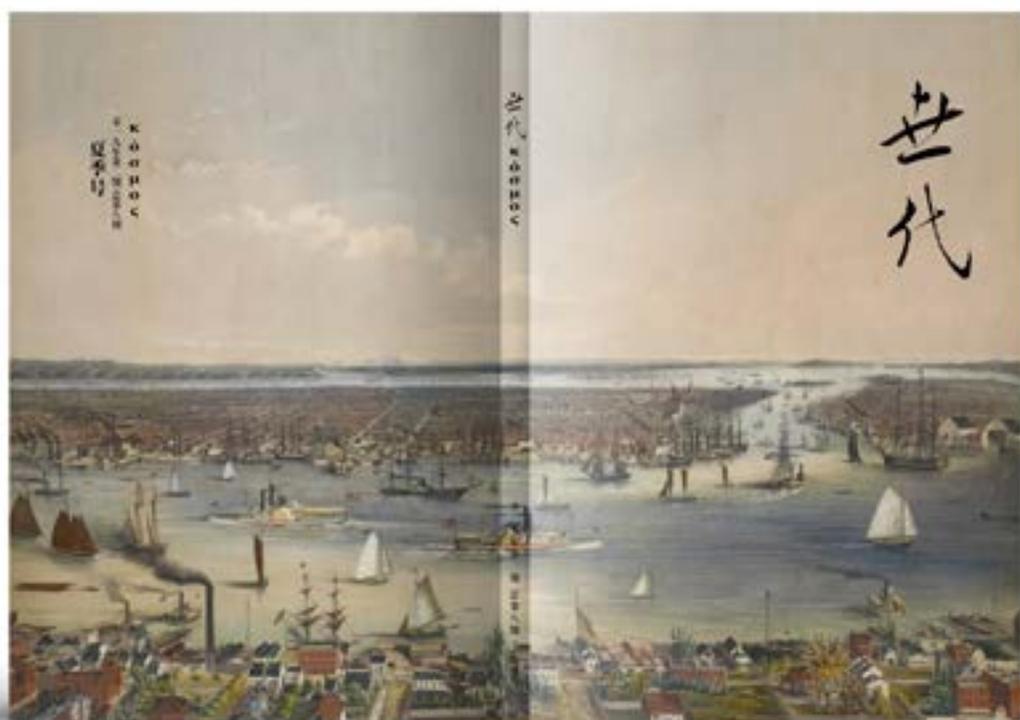
一百多年后，这些报刊仍然是西方现代公共空间思想界的重要部分。如此长期的运行并生长，少不了与之密不可分的支持机制。在此方面，同样在纽约的《首要之事》显然参考了它们的做法。

不过，《首要之事》或任何关心基督信仰与各领域关系的群体会在多大程度上于现代甚至之后的公共空间走得深远，还需要长久而耐心当然也

可能不乏别开生面的探索和积累。●

-
- 〈1〉 Ross Douthat, “Richard John Neuhaus, RIP”, *The Atlantic*, January 8, 2009, <https://www.theatlantic.com/personal/archive/2009/01/richard-john-neuhaus-rip/55902/>. Joseph Bottum, “Richard John Neuhaus, 1936-2009”, *First Things*, January 14, 2009,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09/01/richard-john-neuhaus-1>. Richard Pérez-Peña, “Times Hires New Conservative Columnis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09, <https://www.nytimes.com/2009/03/12/business/media/12douthat.html>. Michael Calderone, “Douthat enters new Times zone”, *POLITICO*, March 31, 2009,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09/03/douthat-enters-new-times-zone-020679>. Ross Douthat, “A Goodbye”, *The Atlantic*, April 17, 2009, <https://www.theatlantic.com/personal/archive/2009/04/a-goodbye/56093/>.
- 〈2〉 George Weigel, “Transition: Richard John Neuhaus, 1936-2009”, *Newsweek*, January 9, 2009, <https://www.newsweek.com/transition-richard-john-neuhaus-1936-2009-78013>. “Endorsements”, *First Things*, <https://www.firstthings.com/endorsements>.
- 〈3〉 Ross Douthat, “Richard John Neuhaus, RIP”, *The Atlantic*, January 8, 2009.
- 〈4〉 详见卷首语后文章正文及注脚。
- 〈5〉 以利法列·布朗 (Eliphalet M. Brown, 1816—1886)、埃德加·福尔曼 (Edgar W. Foreman, 生卒年未知), 《从威廉斯堡看纽约及周边》(*New-York and environs, from Williamsburgh*), 原图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https://digitalcollections.nypl.org/items/510d47d9-7c9b-a3d9-e040-e00a18064a99>。《世代》用图版本来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YC_1848.jpg。《世代》在使用该图时对左右方向进行了调换。《世代》本期美术编辑: 陆军。
- 〈6〉 Edwin G. Burrows & Mike Wallace, *Gotham: 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to 189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49-690.

- 〈7〉 Editor, “To the American Public”, “Rational Relig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ume I, Number I, New-York, Thursday, August 28, 1845,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3/Scientific_American_-_Series_1_-_Volume_001_-_Issue_01.pdf. Christine Gorman, “Scientific American-Then and Now”,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1, 2011,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first-issue-thoughts/>.
- 〈8〉 Elmer Davis,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1851-1921* (New York: The New York Times, 1921), 3-47. Ellery Sedgwick,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Monthly, 1857-1909: Yankee Humanism at High Tide and Ebb*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21-43.



KOBAN
原季与

世代

世代

支持研究创作： 一本美国杂志的生长环境

文 / 许宏

一

2016年10月,《书与文化》(*Books & Culture*)宣布停刊。^{〈1〉}

一本小众杂志的存在和消失,通常都是悄无声息的事情。

相比流行文化世界中的那些小众媒体,《书与文化》可能更是小众中的小众了。

这本双月刊问世于1995年。到了2016年底关闭之前,其付费订阅者大约在一万人左右。^{〈2〉}在互联网还未完全兴起之前的1990年代末,该杂志的付费读者也没有超过两万人。^{〈3〉}

这并非意味着《书与文化》完全是所谓某个小众之内的私事。

《书与文化》是一本美国杂志。在它创办几个月以及10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曾分别发表专文。那两篇文章都是基于对《书与文化》创刊主编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的访问,介绍了该杂志本

身及其在美国思想界的位置。⁽⁴⁾

知名大众媒体的报道，可能让《书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大众视野，却没有将其变为大众杂志。

二

这个现象与《书与文化》本身有着直接关系。《书与文化》是由美国新教福音派基督徒出版人和学者创办的书评杂志。

在威尔逊以外，一位主要创立者为美国历史学家马可·诺尔（Mark Noll）。在威尔逊看来，1995年诞生的《书与文化》与诺尔于1994年出版的一本书密不可分。⁽⁵⁾

那本书叫作《福音派思想的困窘》（*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也有译为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在书中，诺尔指出，作为现代北美在信仰生活上最积极也是人数最多的群体，新教福音派基督徒于基督信仰的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优点，但是在基督信仰的思想方面却非常匮乏。

在诺尔的定义中，近现代意义上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不是单一而固定的宗派，而是各样人群的组合。

一般而言，福音派出现于18世纪中期的西北欧和北美，其不同背景的成员通常强调作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在基督徒生活中的权威地位，重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之后的复活对于信他之人的拯救并由此带来的重生，以及关注此福音在世界上的分享和传播。

而诺尔所说的基督信仰的思想方面，主要不是指圣经和神学研究，而是由于基督启示而来的关于上帝和上帝所造世界的思想，此思想不是被限定在圣经和神学研究之内，而是涵盖各领域各学科。

在诺尔的观察中，正是在这方面，新教福音派基督徒没能在20世纪的

北美做出应有的贡献。诺尔举出的最为突出的例证，是新教福音派基督徒没有一所自己的研究型大学，也没有一份与现代世界进行深入对话并面向公众的研究型或思想类杂志。这与新教福音派基督徒在北美历史上的显著位置形成巨大反差。^{〔6〕}

正是在此背景下，《书与文化》于诸多因素的帮助下得以问世。按照诺尔在《书与文化》停刊之后的回忆，这些因素主要在于：

1，曾经的《归正杂志》（*The Reformed Journal*, 1951—1990）群落，包括作者、顾问、读者，希望这份有深厚基督信仰背景并深入探讨各领域各学科问题的评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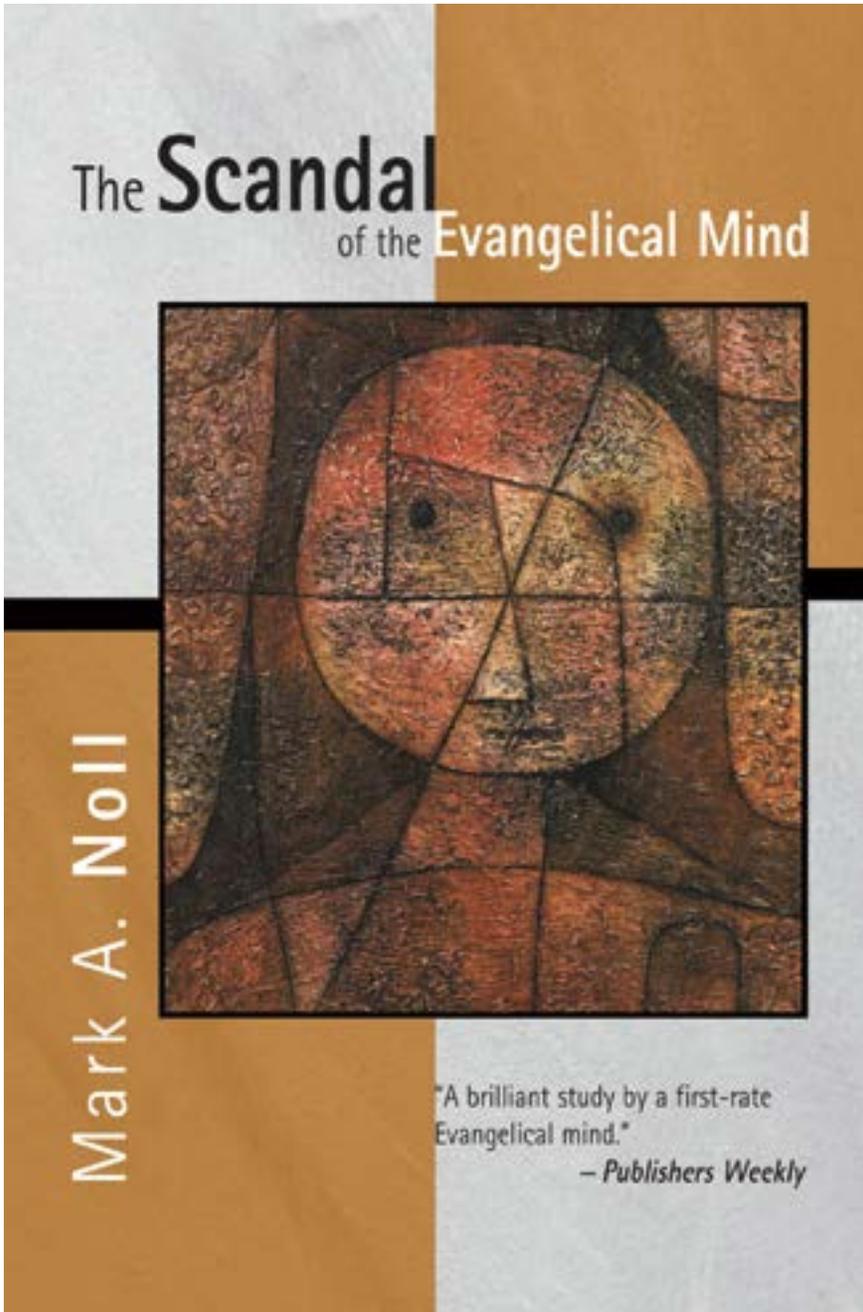
2，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提供了《书与文化》的启动资金。该基金会的项目管理人员乐于看到《归正杂志》以某种形态复刊。

3，《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出版人和编辑当时在考虑添加对书与文化世界更富有反思的内容。这个北美新教福音派的重要机构以主办者的身份建立《书与文化》，使得新杂志群落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原先《归正杂志》所在的密歇根州大激流城（Grand Rapids）基督徒思想界及其相关地方。

4，《今日基督教》邀请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出版机构工作的约翰·威尔逊担任《书与文化》主编。威尔逊在基督信仰上的深度及读书的广度，以及他与各样作者的关系，让这份新杂志从创刊伊始就有着“富于见识”（judicious）、“非意识形态化”（non-ideological）的特点。^{〔7〕}

三

就在宣布《书与文化》停刊的当月，威尔逊和诺尔以另一种方式说到“非



《福音派思想的困窘》(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也译为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封面,
<https://www.eerdmans.com/Products/4180/the-scandal-of-the-evangelical-mind.aspx>。

意识形态化”这个特点。

在威尔逊看来,假如《书与文化》扮演的是某种意识形态推动者的角色,该杂志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的言下之意显然是,那样的话,《书与文化》或许就不会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关闭。

然而,威尔逊强调,《书与文化》从最初就不是一家“搞运动的杂志”(a movement magazine)。而在诺尔的眼中,威尔逊正是在充斥意识形态争斗的时代少有的可以从长期历史的眼光进行反思的评论者。⁽⁸⁾

在《书与文化》宣布停刊之后,有一批该杂志的作者和读者以文章或短评的方式表达对此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

甚至有一本在2018年出版的文集,是专门献给威尔逊及其妻子的。⁽⁹⁾该文集源于2017年9月由多方机构和个人参与的会议,探讨因《书与文化》关闭而折射的北美新教福音派思想的状况问题。⁽¹⁰⁾

对于这些相关者而言,《书与文化》的存在和消失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书与文化》的关注却没有能够使得这本杂志继续下去。这是他们难以回避的现实。

如果从诺尔在1994年指出的问题来看,《书与文化》的停刊显示出北美新教福音派在与各领域各学科相关的思想讨论方面仍然处于某种“困窘”的状态。跟1994年之前上百年的大体情况近似,2010年代的北美新教福音派虽然在人数和资源上都是相当显著的群体,却依然难以在上述思想方面进行持续而有规模的投入。

四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书与文化》显然不是一份知名的杂志。其所在北美新教福音派及北美社会与中国大陆和其它华人教会及社会的具体

情形也很不相同。

然而，鉴于北美新教福音派及北美社会对于当今中国大陆和其它华人城市教会及社会的影响显著，《书与文化》的存在和消失所反映的问题于中文世界而言可能就是并非完全无关。

如何在中文世界培育基督启示之下与各领域各学科具体研究相关且面向公众的思想交流环境，是《世代》自2017年创立以来就关注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初步回答，已经逐步体现在迄今各期具体主题的探讨中。

本期《世代》主要讨论的是关于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问题。《书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此方面可以参考的重要案例。本文结合《书与文化》及其所在北美新教福音派思想界以及更广大世界的状况尝试梳理出与培育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相关的一些方面。

五

从与支持机制最为直接相关的方面看，作为一个交流和评论研究及创作成果的平台，《书与文化》得以问世是因为有启动资金。本文之前提及，这笔资金来自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在现代西方，尤其美国，个人或家庭或其他群体发起的基金会是培育研究及创作支持机制最常见的基本环节之一。从社会机制的角度看，持有不同立场的众多基金会的存在及其支持的组织和个人是美国社会具有相对长期活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1〕}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最早出现于1948年。建立者是约瑟·牛顿·皮尤（Joseph Newton Pew, 1848—1912）的子女们。然而，在皮尤那一代，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基因就已经显现出来。

皮尤曾就读于美国东北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师范学校，也做过当地

学校的教师。19 世纪中后期，石油天然气产业在宾州及北美其它地区兴起，皮尤参与建立的公司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

同时，皮尤是基督教长老会成员，他于 1876 年参与创立了有长老会背景的格罗夫城学院（Grove City College），一所在当今美国最著名的思想保守派本科学院之一。^{〔12〕}

1948 年后，在与基督信仰相关的重要捐赠中，皮尤基金会分别于 1956 年和 1969 年帮助建立了《今日基督教》杂志及哥登—康维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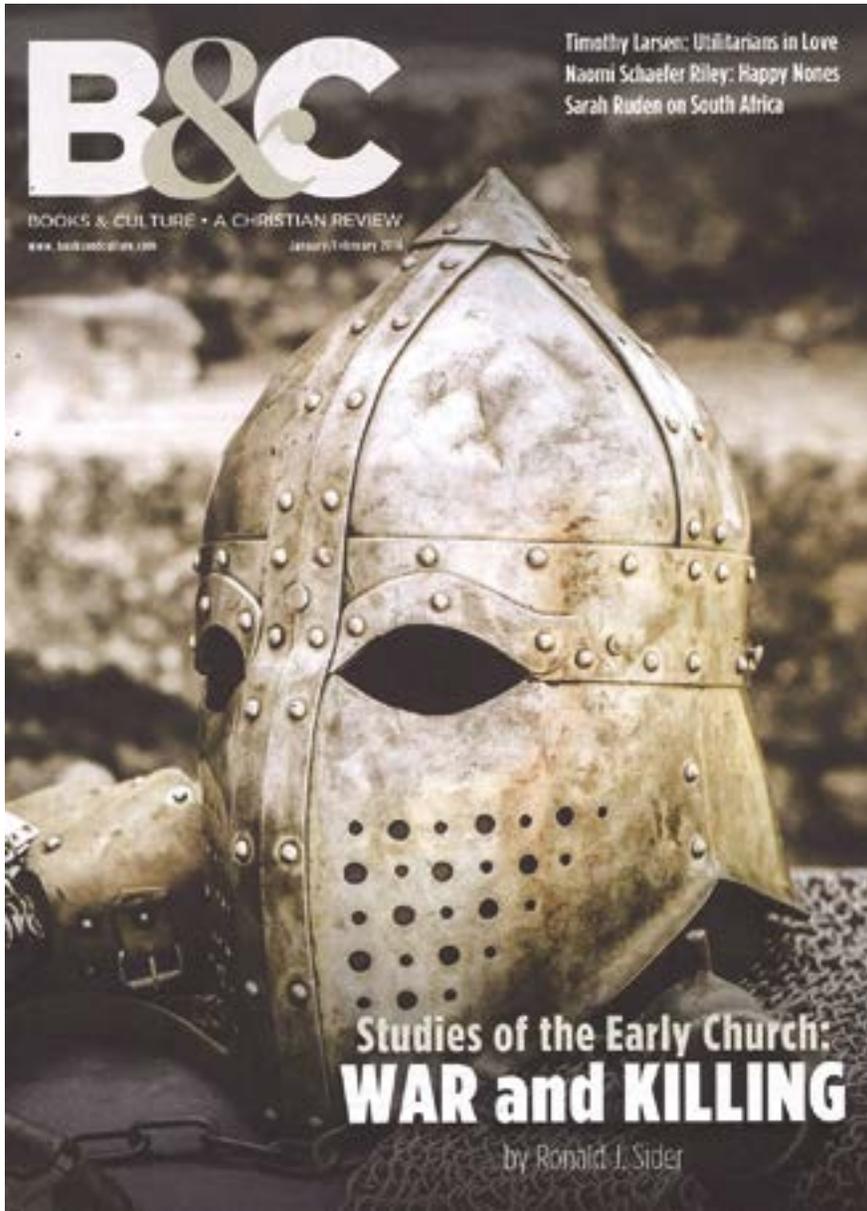
到了 1980 至 1990 年代，皮尤基金会通过在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和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设置项目帮助新教福音派及其他学者从事历史、神学、哲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写作、交流。前面提及诺尔的《福音派思想的困窘》，即是那些年受惠于皮尤基金会支持的著述之一。惠顿和圣母则是诺尔先后执教过的高等教育机构。^{〔14〕}

由此可以看出，皮尤基金会在 1995 年透过与《今日基督教》及诺尔这样的福音派学者合作出资创办《书与文化》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六

但是，若进一步考察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间的情况，会发现皮尤基金会对新教福音派思想界的支持并非是那么必然。

约瑟·牛顿·皮尤的儿子，约翰·霍华德·皮尤（John Howard Pew, 1882—1971），是皮尤基金会创始人之一，也是支持建立《今日基督教》和哥登—康维尔神学院的重要人物。然而，在他于 1971 年去世后，皮尤基金会的赞助方向逐渐发生改变，该组织不再像以往那样热心支持新教福音派。



《书与文化》2016年1-2月刊封面，
<https://www.booksandculture.com/articles/2016/janfeb/>，<https://www.discountmags.com/magazine/books-and-culture>。

皮尤基金会在 1980 至 1990 年代对于新教福音派思想界进行支持，既是传统的某种惯性，也是外界对于该组织传统的某种激活所致。

在此方面，罗伯特·林恩（Robert Lynn，1925—2018）和提摩太·史密斯（Timothy Smith，1924—1997）起到过关键作用。

林恩曾经是利历基金会（Lilly Endowment）负责向信仰领域做赞助评估的官员。史密斯曾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他是近几十年来最早在美国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担任要职的新教福音派学者之一。

1970 年代，林恩在史密斯的介绍下认识了几位当时年轻的新教福音派历史学者。

他们包括：诺尔、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拿单·哈特（Nathan Hatch）、格兰特·瓦克（Grant Wacker）、哈里·斯多特（Harry Stout）、约珥·卡彭特（Joel Carpenter）。

他们在基督信仰与历史研究方面体现出紧密且深入的关联，这让并非福音派的林恩印象深刻。

1979 年，利历基金会出资在惠顿学院召开会议，探讨圣经在美国历史上的位置。会议的成果——《圣经在美国：文化史论集》（*The Bible in America: Essays in Cultural History*），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于 1982 年出版，编著者是哈特和诺尔，其他参与者包括斯多特、马斯登、瓦克。

也是在 1982 年，利历基金会在惠顿建立美国福音派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Evangelicals）。哈特和诺尔是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卡彭特（曾是史密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学生）为首任所长。

正是在此情况下，为了让美国福音派研究所获得更多支持，林恩与当时惠顿的一位副校长去往费城访问皮尤基金会总部。

跟林恩类似，皮尤基金会负责信仰领域资助的官员马丁·特伦布尔（Martin Trimble）也不是来自新教福音派。他对于新教福音派有这样一群年轻有为的学者感到意外。他建议皮尤基金会支持美国福音派研究所，并请哈特策划一个不止于历史研究的项目方案。

另外，皮尤基金会将信仰领域的捐助事务部门提升为相对独立的位置，并聘请卡彭特为官员。在此后皮尤基金会的支持中，美国福音派研究所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集中于哈特在圣母大学开展的新方案。

后者包括赞助圣母大学宗教哲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当时，原先在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现在的加尔文大学，Calvin University）任教的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是该中心主任。普兰丁格也曾是《书与文化》的作者之一。

在皮尤基金会的支持下，圣母大学宗教哲学研究中心及相关项目帮助了一群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哲学家。包括该中心如今的主任米迦勒·莱（Michael Rea，也译为迈克尔·雷），以及布莱恩·来福托（Brian Leftow）、迪恩·齐莫曼（Dean Zimmerman）。^{〔15〕}

七

不过，到了2000年前后，利历和皮尤这两家基金会对于新教福音派思想界的资助开始减弱。在信仰支持方面，利历主要还在于它原本侧重的基督教与品格教育的关系。1996年，卡彭特离开皮尤，就任加尔文学院教务长。对于皮尤基金会来说，捐助新教福音派思想界的基本工作已经完成。^{〔16〕}

此状况可以在如今这两家机构的网站上看到。利历在做自我介绍的主页，引用其联合创始人以利·利历（Eli Lilly，1885—1977，也译为伊莱·利历）的话，该基金会的目的是“帮助改善美国人的品格”。为此目的，这个

从制药业起家的基金会自 1937 年以来大致在社区、教育、信仰三方面进行捐助。^{〈17〉}

而皮尤基金会在简述其使命和价值观的网页上，已经没有与信仰直接相关的字眼。其存在是“受知识力量的驱动，以解决当今最具挑战的问题”。该机构的主要领域是“公众意见研究；艺术与文化；环境、健康、国家和消费者政策倡议”。^{〈18〉}

这与皮尤基金会在 2001 年出版的一本此机构简史中的描述有着显著不同。在那里，对于信仰方面的支持仍然被认为是该基金会的重要领域之一。

其中也提及皮尤家族的信仰背景，并将葛培理（Billy Graham, 1918—2018）称为该家族的老朋友。对于皮尤家族支持建立《今日基督教》和哥登—康维尔神学院，这位曾就读于惠顿的美国新教福音派传道人发挥过关键作用。^{〈19〉}

上述的明显变化，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何“皮尤”这个名字在近十几年的美国及国际舆论界不是以赞助基督教会及其各样机构著称，而是以民意调查及其分析闻名。

此方面的专门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 1996 年初创，2004 年正式建立。不过，信仰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还是其考察的重要方面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皮尤家族传统的信仰维度。^{〈20〉}

八

皮尤和利历这两家基金会，帮助美国新教福音派思想界在 1970 年代末以来有了相当程度的兴起。但是，它们在 21 世纪到来前后的变化，又使得这个思想界在 2010 年代中后期身处缺乏支持的境地。

在《书与文化》于 2016 年宣布停刊之前，惠顿的美国福音派研究所已

经在 2014 年底关闭。^{〈21〉}

此状况体现出，在美国新教福音派思想界，尽管经历了近三十多年的显著生长，却仍然没有培育出更长期并坚实的支持机制。如皮尤和利历这样的基金会与美国新教福音派思想界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多年的合作就变得更加紧密。

在此过程中，既没有福音派内部的基金会成长起来并加入对上述机构的大力支持，也没有福音派以外其它的组织成为皮尤和利历的接替者。这导致美国福音派研究所和《书与文化》失去了在已经有二三十年宝贵积累的基础上获得更进一步生长的可能。

诺尔在《福音派思想的困窘》中，说到北美新教福音派缺乏像《大西洋》（*The Atlantic*）、《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那样既严肃考察世界各领域问题又面对公众的刊物。^{〈22〉}

《书与文化》的问世，初步实现了诺尔及其同道们的愿望。它不仅获得之前提及的《纽约时报》的称赞，作者是该报评论信仰与社会关系的专栏作家彼得·斯丹菲尔斯（Peter Steinfels）。^{〈23〉}

2000 年 10 月，《大西洋》刊登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兰·伍尔夫（Alan Wolfe）撰写题为“福音派思想的打开”（*The Opening of the Evangelical Mind*）的封面文章，其中就有对《书与文化》的欣赏。^{〈24〉}

如果不论具体的立场而是从媒体与人群的角度，《书与文化》之于 1990 年代美国新教福音派学者群落，有些像《大西洋》之于 1850 年代美国新一代文人群体，以及《纽约书评》之于 1960 年代美国思想自由派文人世界。^{〈25〉}

显然，无论《大西洋》还是《纽约书评》，这两家媒体的生长时间都远远超过《书与文化》。《大西洋》创刊于 1857 年「当时及之后大部分时间名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纽约书评》发起于 1963 年，



《大西洋》2016年1-2月刊封面，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toc/2016/01/>。

两者的存在和生长到目前都还在继续。^{〔26〕}

九

《大西洋》和《纽约书评》及其它类似媒体得以长期运转的因素有多种。若以支持机制的角度看，这些媒体所在的群体都相对有着重视各领域研究和创作并在公共平台进行深入讨论的传统，而且此传统与相近的商业社会有着紧密关联。

这使得此种原先相对小众的群体和行业在历史上虽然不乏生存的挑战，却可以在代代相传中逐渐长成可见的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西洋》及《纽约书评》都经历过支持者变迁的情况。在早期，这两家媒体的拥有者基本是杂志的联合创办人或其熟悉的同行，他们本身是编辑或作者或书商。在那之后，拥有者逐渐不再是原先杂志的创建者及其朋友的小圈子，而是外来更大的投资者。

但是总体来说，投资者或出版人与编辑、作者和其它相关从业者之间有着彼此相对尊重并认同的关系。他们各自也基本都是这个群体中比较有传承和经验的专业人士。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杂志的传统和特色。^{〔27〕}

2017年以来，《大西洋》的主要拥有者是一家名叫“爱默生共同体”（Emerson Collective）的组织，由劳伦·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创建于2004年。这位企业家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1955—2011）的遗孀。

此组织名字的来源正是《大西洋》的发起者之一：美国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其对现代美国思想界中的自由派有着深远影响。爱默生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被其同代人视为美国思想界的独立宣言。^{〔28〕}

而从1984年至今,《纽约书评》的拥有者是莱·希德曼(Rea Hederman,也译为雷·希德曼),一位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报业和印刷业家族的继承人。希德曼曾就读于密苏里新闻学院(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他以反对他所在家族的种族主义以及不干涉《纽约书评》的编辑独立而闻名。^{〈29〉}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将《大西洋》与《纽约书评》放在一起做分析,并非是抹杀两者之间的差异。2018年,前者的付费读者接近48万人,后者是13万多。^{〈30〉}

如今的《大西洋》杂志涉及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当初的文学、艺术和政治,也包括科技、商业、家庭、健康、教育,其作者和读者群体也超出当年波士顿及其所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界,其中很多作者是该杂志自己的编辑和记者,也有一些是杂志以外的学者和作家。

《纽约书评》则以篇幅较长的书评为主,也有时事、文化评论。相比当今的《大西洋》杂志,《纽约书评》的作者大多是编辑部以外的作家和学者。《纽约书评》(以半月刊为主)的全部工作人员不到40位,而《大西洋》(月刊,每年十期)的全职编辑记者就有100多人。^{〈31〉}

十

对于看重在公共平台谈论基督信仰与各领域研究的人而言,《大西洋》和《纽约书评》显然不是符合理想的媒体。相当程度上,这两份刊物正是在美国历史上对于传统基督教进行反对或批评而塑造的文化中形成的。总体来说,这是17-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带来的影响之一,尽管启蒙运动本身及其影响都很复杂。

也正是在此文化的塑造过程中,独立于传统基督教会建制的公共空间

**Thomas Piketty:
A New Deal for Europ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5, 2016 / Volume LXIII, Number 3

**Jacob Weisberg:
We're All**



**The Psychologists
Take Over**
by Tamsin Shaw



**Arlene Croce:
The Tap Dance Genius**

**Lorrie Moore:
Wisconsin's Shame on TV**

**Joseph Lelyveld:
Outcast Father Bush**

**Elizabeth Drew:
The US Is Breaking Down**

**The I Ching
Explained!**



逐渐在欧洲和北美成型。这其中就包括注重各领域研究的组织，包括研究型大学、研究型杂志。

在此过程中，注重传统基督信仰的基督徒的活动范围逐渐趋于在教会和神学院之内。许多原先有着传统基督信仰背景的学院逐渐演变为与各学科各领域有紧密关系的研究型大学。在那里，基督教当中的自由派占据主要角色，而各种非基督教的或者反基督教的元素在后来成为主导。

这使得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和媒体界主流不再像之前那样跟传统的基督信仰有着直接关系。在此背景下，也就容易理解，为何比较重视传统基督信仰的新教福音派缺乏自己的研究型大学和面向公众的研究型杂志。

这不意味着《大西洋》和《纽约书评》或近似的媒体就不值得强调传统基督信仰的人借鉴。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就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来说，这样的公共平台在包括编辑、作者、读者、投资者各方面都有着相对长久的积累。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这种在传统教会建制外的现代公共空间形成的积累是基督教的福音派或保守派在总体上欠缺的。福音派或保守派人士考察比如《大西洋》和《纽约书评》在以上诸方面的积累，并非就是认同它们的观点，而是学习如何在现代公共空间进行福音派或保守派的积累。

从制度和组织层面看，在 19 世纪末之前上千年当中的很多时候，西方世界的国家和教会是掌握各种资源的两个彼此有张力也有关联的主要机构。这两大机构塑造并支配了当时西方的公共空间。这使得教会如同拥有地上权势的国家。

启蒙运动期间及之后，新的公共空间逐渐于国家和教会之外扩展开来。虽然这个公共空间与国家和教会并非没有关联，但是此空间更多地富于个人、商业、公民社会的色彩。在被此空间吸引的人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国

家和教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新兴社会成长的阻碍。

对于重视传统基督信仰的人来说，这个变化并非完全对基督启示和基督教会在世界上的传播不利。教会不再像国家那样拥有地上权势，其实有益于人们认识真实的基督启示和基督教会。^{〔32〕}

十一

这不是说个人、商业、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就没有地上权势的问题。基督教的保守派或福音派在此空间进行与研究 and 创作相关的积累时，同样会面对基督启示及教会与各种权力包括教会内部权力的关系问题。

就像西方历史上国家和教会之间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彼此制约，个人、商业、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也是对国家和教会的某种制约。反过来，这个现代公共空间也受到国家和教会的制约。进一步，国家、教会、现代公共空间各自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如此多方之间的制约，有益于减少权力的集中和滥用，以及对于人的崇拜。

在此背景下，对于研究和创作的支持也就容易出现多方分立的状况。在《大西洋》、《纽约书评》以外，西方还有不少与它们在形态上近似但拥有不同支持者的媒体。

在与基督信仰和各领域有关的公共空间，《书与文化》的停刊的确显示出美国新教福音派在此方面的不足。不过，如果从分立的角度看，在与此派别相关的圈子，并非完全没有近似又不同的公共平台。

《刺猬评论》(*The Hedgehog Review*)是其中之一。这份季刊(每年春夏秋三期)建立于1999年，由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文化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Culture)主办。创立者为该校社会学教授雅各·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也译为詹



《刺猬评论》2016年秋季号封面，
<https://iasculture.org/news/hedgehog-review-nominated-ellie-award>。

姆斯·戴维森·亨特)。

亨特曾就读于哥登学院 (Gordon College)，一所美国新教福音派的高等教育机构。哥登—康维尔神学院的前身之一就是哥登学院的神学院。亨特后来在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读博士，导师为奥地利犹太裔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1929—2017)。

亨特于 1995 年创建文化高等研究所的前身，一个关于后现代问题的研究项目。《刺猬评论》是该项目的主要刊物。2002 年，此项目获得皮尤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研究所。^{〔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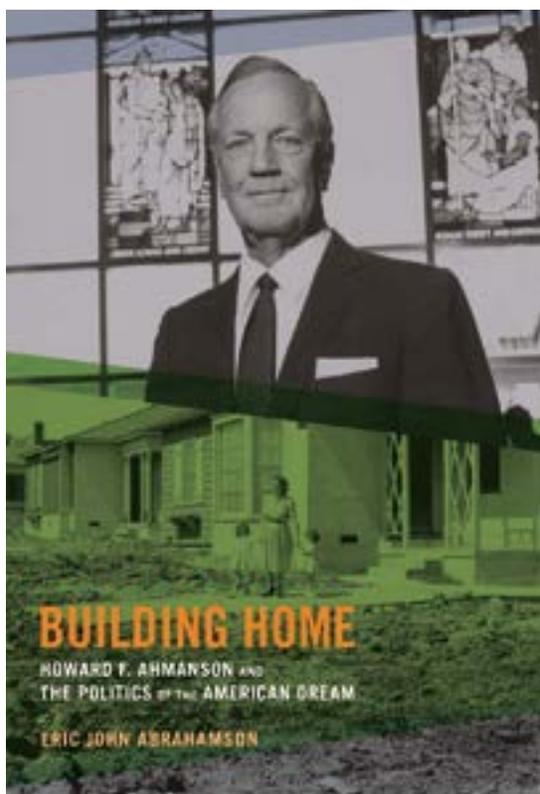
《刺猬评论》及其所在研究所收到的赞助之中还有来自一对美国夫妇的支持。在小霍华德·菲尔斯塔德·阿赫曼森 (Howard Fieldstad Ahmanson, Jr.) 及其妻子罗伯塔·格林·阿赫曼森 (Roberta Green Ahmanson) 看来，亨特建立的这个研究所和杂志是他们支持过的项目中最重要的之一。

这对夫妻很看重基督徒在传统教会建制外的现代公共空间以基督启示和信仰为根基进行关于世界的研究和创作。作为基督徒学者的亨特，在一所并非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型大学，组织同道一起从事此方面的研究和创作，这正符合阿赫曼森夫妇的眼光。^{〔34〕}

阿赫曼森夫妇的私人基金会——菲尔斯特德公司 (Fieldstead and Company) 成立于 1979 年。

那时，小霍华德·菲尔斯塔德·阿赫曼森还是单身。他从老霍华德·菲尔斯塔德·阿赫曼森 (Howard Fieldstad Ahmanson Sr., 1906—1968) 那里继承了丰厚遗产。他父亲曾拥有美国最大的储蓄和信贷公司，在包括洛杉矶在内南加州的商业、文化、政治历史上留下过重要印迹。^{〔35〕}

罗伯塔·格林·阿赫曼森出生于美国中西部艾奥瓦州 (Iowa) 一个保守的浸信会基督徒家庭。她曾就读于大激流域浸信会学院 (Grand Rapids Baptist College, 现在的房角石大学, Cornerstone University)、加尔文学院、



老阿赫曼森传记，

<https://www.amazon.co.uk/Building-Home-Ahmanson-Politics-American/dp/0520273753>。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苏里新闻学院，后来在加州做记者时与其未来的丈夫相识。^{〔36〕}

在美国的基金会世界，菲尔斯泰德显然没有皮尤和利历出名。不过，在近十几年，它逐渐为英语世界的公众所知。

2005年，《时代》（*Time*）选出25名美国最有影响的福音派基督徒，阿赫曼森夫妇位列其中。需要说明的是，该杂志所谓的福音派不限于新教，所选人物不都是美国人，也不止25人，比如夫妇或父子被算作一名。

这份名单中的人不乏争议，他们彼此也并不完全认同。他们当中有更

为世界所知的葛培理（及其儿子），也有参与创办《书与文化》的诺尔。阿赫曼森夫妇是其中唯一以私人基金会的方式对基督信仰与各领域相关的研究和创作进行显著支持的人。^{〔37〕}

除了赞助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督徒从事文化领域的反思，这对夫妇还帮助建立了一个世界基督徒记者交流机构——媒体项目（The Media Project）。

此机构的现任负责人是保罗·格拉德（Paul Glader），一名曾经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他同时是纽约的国王学院（The King's College）麦坎利士·菲利普斯新闻研究所（McCandlish Phillips Journalism Institute）所长。媒体项目是此研究所的重要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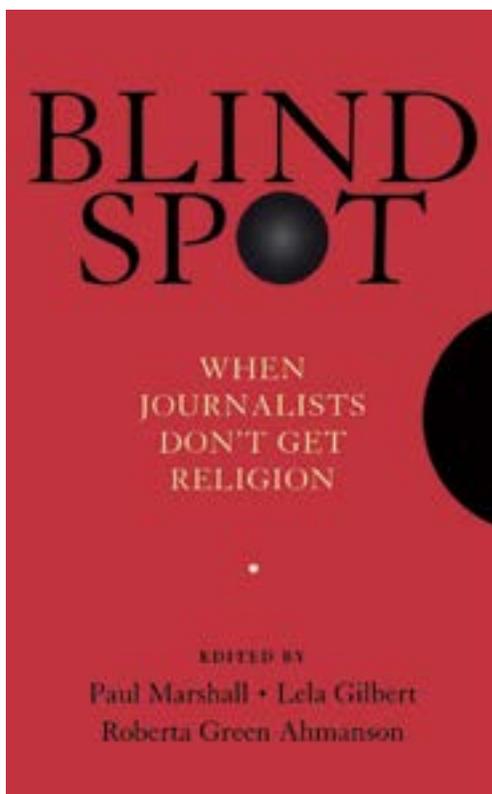
与格拉德类似，约翰·麦坎利士·菲利普斯（John McCandlish Phillips, 1927—2013）也是在大众媒体做过记者的基督徒。在《纽约时报》的不少同事眼中，菲利普斯是这家媒体历史上最具原创写作风格的记者之一。他也因其基督徒与新闻记者的双重身份，以及多方面的与众不同，被他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行们纪念。^{〔38〕}

无论是在研究型大学还是公众媒体或与某个学科或职业相关的研究或交流机构，现代公共空间的具体领域与基督信仰的紧密联结，是阿赫曼森夫妇在近些年所做投入的重要方面。

尽管他们没有将赞助放在比如《书与文化》杂志的延续上，他们在别处所做的却也丰富了基督徒在现代公共空间的探索和因此而积累的资源。

十二

阿赫曼森夫妇对于研究和创作的多样支持，还体现于他们鼓励学者在现代公共空间进行历史典籍的梳理工作。



阿赫曼森夫妇支持并参与的一本反思西方新闻界与信仰的文集,《盲点:当记者不懂信仰》(*Blind Spot: When Journalists Don't Get Religion*), 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年本, <https://www.amazon.com/Blind-Spot-When-Journalists-Religion/dp/0195374363>。

这方面最显著的项目是29卷的《古代基督教圣经注释》(*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以及相应的15卷《古代基督教文本》(*Ancient Christian Texts*)、5卷《古代基督教教义丛书》(*Ancient Christian Doctrine Series*)。

其中不少古代文献是首次译为英语或者是新译。这个系列的主编是阿赫曼森夫妇的朋友——美国神学家多马·欧登(Thomas Oden, 1931—2016, 也译为托马斯·奥登)。⁽³⁹⁾

欧登出生于美国南方的基督徒家庭，年轻时因受当时流行思潮影响而被胡志明（Hồ Chí Minh, 1890—1969）、毛泽东（1893—1976）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吸引。

他后来读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开始反思自己企图革新世界的热情。一位名叫维尔·赫伯格（Will Herberg, 1901—1977）的美国犹太裔社会学家则帮助他走向古典基督教世界。

而让欧登得以着手组织各方挖掘整理并出版古代基督教文献系列的正是阿赫曼森夫妇。在1990年代，这对夫妻的主动邀请和鼓励帮助欧登完成了他晚年最想做的事情。^{〔40〕}

在现代公共空间从事历史典籍的梳理方面，并非只有欧登才收到过阿赫曼森夫妇的支持。另外一个重要事例，是一对英国夫妻学者对于西方政治神学文献的整合工作。

奥利弗·奥多诺万（Oliver O'Donovan）及其妻子约安·洛克伍德·奥多诺万（Joan Lockwood O'Donovan）曾执教于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

他们选编的《从爱任纽到格劳秀斯：基督教政治思想历史读本》（*From Irenaeus to Grotius: A Sourcebook in Christian Political Thought*）初版于1999年。这本近千页的文集是当今英语世界考察西方政治历史资源的重要参考。

在进行该书的选编过程中，两位学者曾因缺乏资金而中断手中的工作。正是阿赫曼森夫妇的菲尔斯泰德基金会的襄助，使得此文集避免了被长期搁置甚至埋没的遭遇。^{〔41〕}

这也表明，类似的历史典籍梳理在西方并非都有充足的支持。在不少情况下，学者需要在其所在的大学或机构外寻找研究和创作的资助。如果学者的研究和创作涉及的范围和观点不是在思想界的主流之内，其所可能

获得的赞助并不容易找到。

菲尔斯泰德或类似基金会的存在为此提供了空间。这使得美国的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有着相对多样的景象。

十三

这种相对多样的景象，也体现在那些比上述所及可能都更富于争议的领域上。

此方面的一个重要事例，是菲尔斯泰德基金会对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资助。

自 1990 年成立于西雅图以来，发现研究所以支持“智能设计”学说（intelligent design）而反对“自然选择”理论（natural selection）为关注自然科学与基督教的人所知。

根据该研究所的自述，其使命之一是“增进对此的理解：人类及自然是智能设计而非盲目并漫无目的之过程的结果”。为此，发现研究所致力于“通过尖端的科学研究”、“培养年轻一代的引领者”、“与公众交流”、“提倡科学家、教师及学生在学术和言论上的自由”而“实现科学和文化的长远变化”。^{〔42〕}

在有些批评者的眼中，这家机构所推行的“智能设计”学说不仅是“伪科学”或“坏科学”，而且是“宗教”。他们指出，“智能设计”论是带有宗教倾向的“创造论”（creationism）的某种新形式。

有些批评者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创造论”的问题在于其倡导者过于简单得将圣经中上帝创世的描写当作具体的自然科学理论。在他们看来，这混淆了圣经与自然科学各自所在的范畴。^{〔43〕}

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世界，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evolution，

或译为演化论)的争执是一个涉及科学、宗教、教育、政治等多领域的显著问题。这里不仅有“创造论”与“进化论”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议,也有各自派别内部的不同声音。其中相关的各方人士通过研究、出版、游说、募款、法律等多种方式传播各自认同的观点。^{〔44〕}

菲尔斯泰德基金会参与支持的发现研究所,是这个还正在展开历史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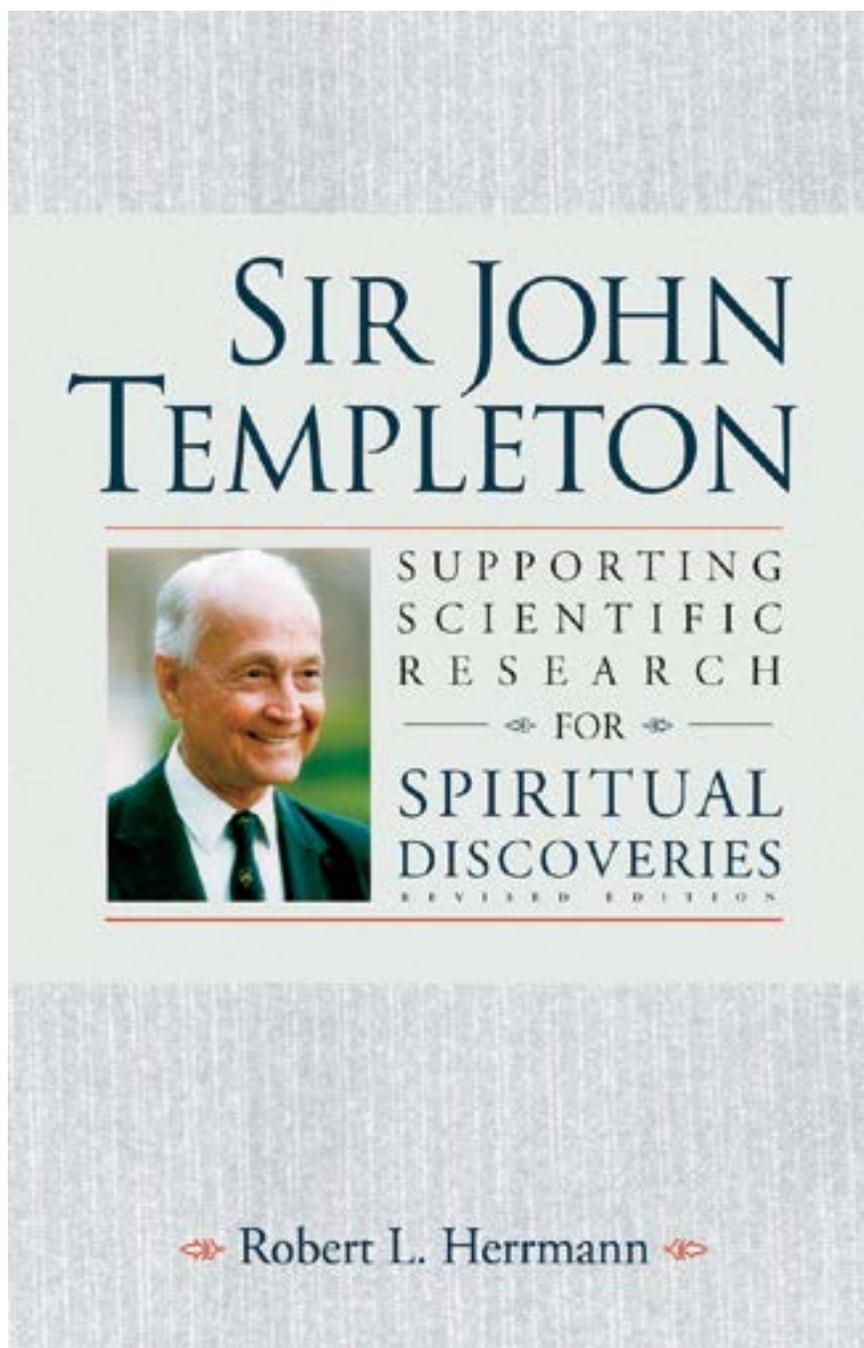
在自然科学与宗教或信仰的关联上,有些研究的支持者采取了看起来更加开放当然也不乏争议的做法。比如约翰·坦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该机构曾因“在寻求回答人类那些最古老问题上”帮助“开拓了新边疆”而于2008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在此奖章评委的描述中,坦普顿基金会是人们“在科学、信仰、哲学方面对于人类最深切问题的探索所做具有开创意义工作的催化剂”。^{〔45〕}

就在此前的2006年,作为《书与文化》创办者之一的诺尔也被授予同一奖项。这两次的颁奖人都是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46〕} 布什以及共和党与福音派的关系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历史的重要现象。当然,这不意味着包括诺尔在内的福音派基督徒都认同或支持布什或共和党其他人的立场和做法。^{〔47〕}

坦普顿基金会并非福音派的某个组织,获其赞助的人也不都是基督徒。不过,此机构在2008年时的总裁兼董事会主席小约翰·坦普顿(John Templeton Jr., 1940—2015)却是新教福音派基督徒。即使如此,小约翰·坦普顿并没有改变其父亲约翰·坦普顿(John Templeton, 1912—2008)建立基金会时的想法。^{〔48〕}

约翰·坦普顿对于自然科学与宗教或信仰关系的看法大约是美国基督教自由派立场的某种新发展。



一本坦普顿传记，<https://www.bibliovault.org/BV.book.epl?ISBN=9781932031683>。

约翰·坦普顿既是美国金融历史上的重要投资家，也曾担任他所在教会的长老以及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董事。坦普顿基金会可以说是有基督教自由派背景的企业家在对自由派在内的美国基督教世界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现象。

对于包括自由派在内的美国基督教世界，坦普顿曾指出，一个显著的问题在于他所认为的固步自封。在他看来，现有的神学研究尽管重要，但缺乏像自然科学那样对未知的探索。同时，他看到近百年来的自然科学界虽然新成果丰富，但缺乏对于信仰或灵魂这样更重要问题的深入探究。

正是对这两种并存状况的不满，坦普顿于1972年设立既类似又不同于且在奖金上高于诺贝尔奖的坦普顿奖，以及于1987年建立坦普顿基金会。这在相当程度上用来奖励或支持被一般神学界和自然科学界所忽视却与这两界相关的从业者。未必跟自然科学有关但与信仰或灵魂相关的传道、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慈善等领域也多有涉及。^{〔49〕}

在过去几十年，坦普顿的做法自然引起各方的争议。基督教福音派的有些人认为其对于信仰的理解过于宽泛，并批评其对于进化论研究的支持。自然科学界的有些人则认为坦普顿的做法混淆了科学与宗教或信仰的不同，是将宗教或信仰的价值观带进科学研究中。^{〔50〕}

然而，福音派或自然科学界也有人理解或欣赏坦普顿的做法。比如，这些坦普顿奖获得者：

《今日基督教》的创立者葛培理、《书与文化》的作者普兰丁格、出生于中国成都的英国神学家多马·托伦斯（Thomas Torrance, 1913—2007, 也译为托马斯·托伦斯）、美国物理学家查尔斯·唐斯（Charles Townes, 1915—2015, 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英国物理学家及神学家约翰·珀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英国天文学家马丁·瑞斯（Martin Rees）、英国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⁵¹⁾

十四

在北美，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远不是本文所及可以涵盖的。这里仅是就一本美国杂志《书与文化》及其所在的环境为例初步梳理培育研究和创作机制的一些方面。

《书与文化》的创办和停刊，是美国新教福音派思想界之中的一些人在现代公共空间进行尝试的一个重要事例。这本涉及艺术、社会、历史、文学、哲学、神学、自然科学的书评杂志运转了 21 年，显示出英语世界那些看重传统基督信仰与各自领域深层关系的人以既是基督徒也是专业人士的双重身份开始显著地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公共交流之中。

他们这种有意识的做法以及做事的质量，引起了商业世界那些跟他们有近似想法之人的注意，进而带来比较有规模的支持。这群人所做的不仅是一本杂志，还有研究机构或项目。

这些加在一起使得近几十年来包括高等教育、媒体、政治在内的美国公共空间有着对于传统基督信仰与各领域深层关系的些许重视。

《书与文化》及相关研究机构或项目的停办，则又显示出美国新教福音派思想界在现代公共空间的尝试方面仍然缺乏长远的支持和积累。

相比之下，诸如《大西洋》、《纽约书评》这样的杂志以及和它们观点近似的一些研究机构或项目，则是美国现代公共空间的思想界形成中的重要部分。

这些组织的长期存在，显然不是依靠一两家基金会或其它机构或某些人的一时帮助，而是基于如下的历史关系：它们的形成与美国现代公共空间的商业界的形成是紧密相连的，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现代公

共空间。

在《书与文化》及相关研究机构或项目以外，近几十年来也有其它与美国新教福音派相关的思想界与商业界合作的重要尝试，比如菲尔斯泰德基金会或坦普顿基金会支持的杂志、研究机构或项目。

对于它们而言，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也在于，这些组织仅仅是一时的现象还是可以长期存在并生长的有机体。就目前来看，就像《书与文化》那样，这些组织在美国新教福音派及其相关的世界中还是个非常小众的现象，传统基督信仰与各领域深层关系仍是个少有人关注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与美国新教福音派相关的思想界和商业界人士于近几十年来所做的尝试至少将传统基督信仰与各领域深层关系的问题在美国现代公共空间提出并讨论开来。这可能为美国新教福音派世界的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的长远生长提供了准备。

十五

在美国新教福音派世界以外，也有人通过创办研究机构或媒体推动传统基督信仰与各领域深层关系问题的探讨。

比如，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 1936—2009）及其同道在1989年、1990年的纽约先后建立信仰与公共生活研究所（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首要之事》（*First Things*）杂志。^{〔52〕}

出生在加拿大的纽豪斯曾是路德宗传道人，后来成为天主教神父。他与葛培理父子、阿赫曼森夫妇同时出现在2005年《时代》杂志25位美国最有影响的福音派基督徒名单上。^{〔53〕}

纽豪斯正是在创办信仰与公共生活研究所及《首要之事》前后从路德宗转向天主教。尽管如此，纽豪斯或者其同道的朋友圈中却有不少如诺尔、



《首要之事》2016年1月刊封面，<https://www.firstthings.com/issue/2016/01/january>。

威尔逊、马斯登、欧登、亨特这样的新教福音派思想者。

如果说《书与文化》比较像《纽约书评》，《首要之事》（月刊，每年十期）则有点像《大西洋》，当然在规模上还无法相比。在创刊将近30年后，《首要之事》没有像《书与文化》那样关闭，前者于2018年的每期发行量接近3万本。

从其最近一年的年报可以看出，《首要之事》有着比较丰富的个人和基金会捐赠，加上杂志的销售和活动收入，使得2018年还有一定的盈余。⁽⁵⁴⁾

《首要之事》与同样是美国天主教背景的圣母大学类似，都明显在各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上比美国新教福音派的杂志和大学获得更多而且比较长期

的支持。在此状况下，也就不乏新教福音派思想者受邀为《首要之事》撰稿或者在圣母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

两者为新教福音派或其他重视传统基督信仰与各领域深层关系的思想者提供了较为宽广而持续的公共空间。在两者之外，一些有着天主教背景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例如，成立于1990年大激流城的阿克顿研究所（Acton Institute）。那里的研究人员有的曾经在比如加尔文神学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这样的新教高等教育机构就读或兼任《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这样的新教媒体的编辑。^{〈55〉}

这些天主教背景的研究机构与新教背景的基金会也有着密切联系。阿克顿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莫伦（Kris Mauren）既是该机构的执行总监，也是坦普顿基金会董事会成员。^{〈56〉}

这不意味着不同背景的人在如此的环境中意见就变得一致。即使同一背景的人，在此状况中也仍然会有相异的想法。《首要之事》、圣母大学、阿克顿研究所的历史上不乏异议。从鼓励研究和创作的角度来看，这有益于原先习惯于在同一背景下生活的人学习在有着各样背景和观点的空间中进行交流。^{〈57〉}

十六

而在与美国新教福音派和天主教相关的机构之外，还有人在包括《大西洋》、《纽约书评》、《纽约时报》、现代研究型大学或研究所这样的以思想自由派为主流的西方现代公共空间从事涉及传统基督信仰和各领域关系的工作。

之前提及在《大西洋》、《纽约时报》评介《书与文化》及其所在美国

新教福音派思想界的作者、向基金会推荐新教福音派学者的历史学家、《刺猬评论》的创立者、获得坦普顿奖的多位自然科学家就属于此种情况。

他们得到支持的来源既有西方现代公共空间的主流，也有与新教福音派或自由派或天主教相关的世界。他们的存在，显示传统基督信仰和各领域关系的问题在塑造西方现代公共空间的重要机构中并非被完全排除在外。

考虑到具有多重层面和意义的基督教在过去一千多年对于西方世界广泛而细致的影响，此种现象的存在也就不奇怪。基督教在世界各地从来都不乏问题，其在近两百年又经历显著的反派浪潮，但是这并没有让西方完全脱去基督教的印记，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或是混杂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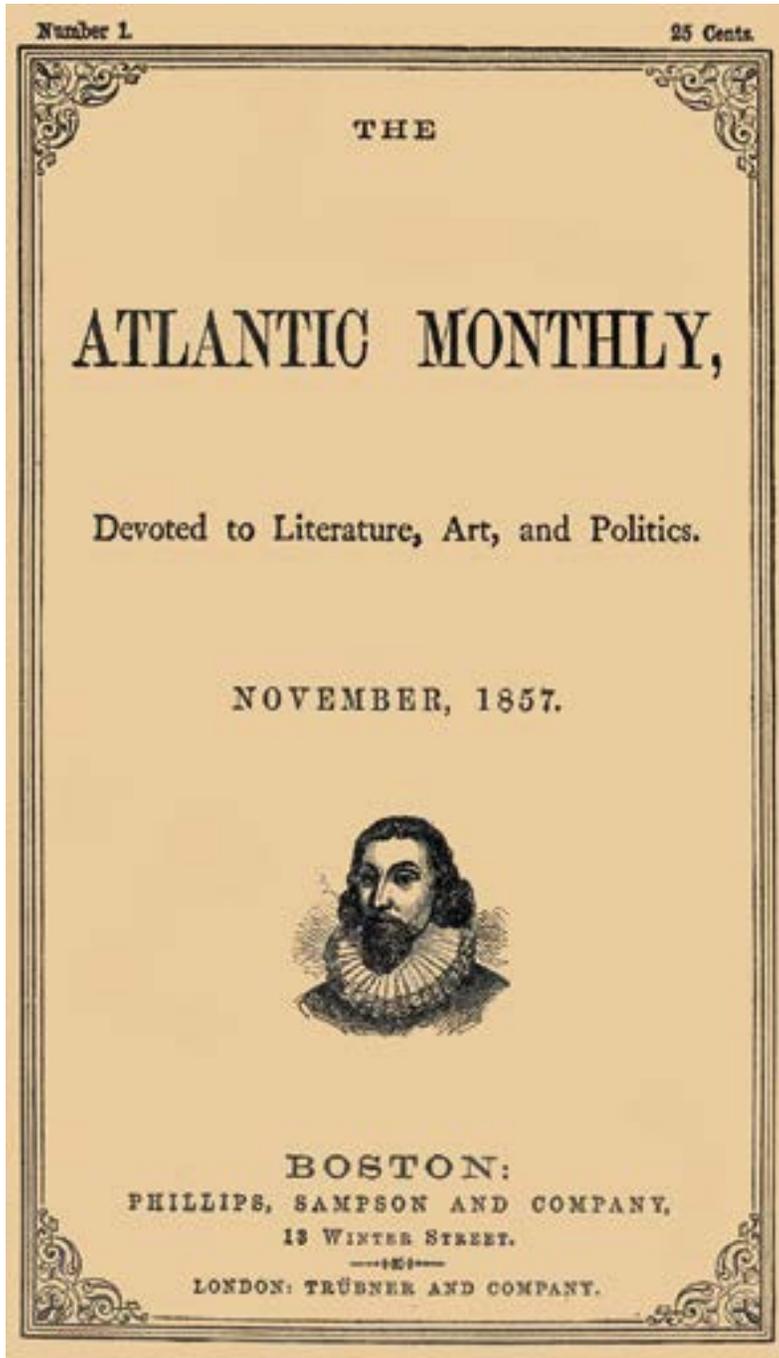
关注传统基督信仰与各领域关系的人散落在西方现代公共空间的各处，是如此印记的一种表现。这就像《大西洋》虽然是由包括爱默生在内的一群对于当时美国基督教多有批评的人建立，此杂志创刊号封面上却印有清教徒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 1588—1649）的肖像。^{〔58〕}

温斯洛普是新英格兰波士顿一带殖民地的创立者之一。他对于圣经《马太福音》“山上之城”（a city upon a hill）说法的借用，后来辗转成为现代美国政治中对于美国定位的重要修辞手法。^{〔59〕}

按照《大西洋》曾经的主编爱乐瑞·赛吉威克（Ellery Sedgwick, 1872—1960）的解释，该杂志首期封面选用温斯洛普肖像，是意在向读者传递新英格兰人在道德上的诚挚以及此杂志具有的并非为了取悦读者的某种尊严。^{〔60〕}

显然，这种印记不是都体现了既超越又临在的基督教。美国现代公共空间中的基督教印记时常被某种意义上的道德观或公民宗教所代表，基督启示会被简单地跟某个国家或某个派别或某个人直接关联起来，基督信仰与各领域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探讨。

这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诸如《书与文化》的建立者和一些作者们面临的



《大西洋月刊》首期封面，<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toc/1857/11/>。

现象。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让《书与文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杂志，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即使这样会失去不少多样资源上的赞助，即使杂志会因缺乏足够的支持而停刊。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印记依然重要。从研究和创作的支持机制看，此种印记在各处的存在使得人们在现代公共空间谈论基督信仰与各领域关系时有着广阔而具体的相关背景。人们不是在一个与基督教传统完全割断的自给自足的世界内随意地进行评论。这些印记也为一代又一代的研究和创作者在成长的过程中预备了随处可见或值得挖掘的素材。

十七

在中国大陆，《书与文化》及其历史环境中涉及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的诸多方面可能都是让人感到陌生的。中国大陆的研究和创作支持环境与美国的有很多不同。但是，就像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于各方面都不乏向西方寻求借鉴，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的问题也在其中。

在国家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占主导的中国大陆，自1970年代末的部分开放以来，在近些年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之中，个人或群体有可能进行或支持相对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创作。不过，这样部分开放空间的存活却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考察中国的过往和现状，会发现培育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创作机制差不多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最困难且薄弱的环节之一。而在其中，涉及基督信仰和各领域深层关系的研究及创作机制或许是更为困难和薄弱的，因为这不仅需要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还需要独立于流行思潮。

然而，这个环节的学习却也可能是最触及西方及人之根基的层面之一。

一本美国杂志及其生长环境不过是此层面的一个片段，却也许提供了长远学习的初步线索。●

-
- 〈1〉 Harold B. Smith, "Note to Our Readers", *Books & Culture*, November/December 2016 issue, October 17, 2016, <https://www.book-and-culture.com/articles/2016/novdec/note-to-our-readers.html>.
John Schmalzbau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Evangelicalism's Little Magazine", *Comment*, January 12, 2017, <https://www.cardus.ca/comment/article/the-life-and-death-of-evangelicalisms-little-magazine/>.
- 〈2〉 Sarah Pulliam Bailey, "As publications struggle, Christian literary magazine Books & Culture could shut down", *Religion News Service*, September 6, 2013, <https://religionnews.com/2013/09/06/as-publications-struggle-christian-literary-magazine-books-culture-could-shut-down/>.《书与文化》2009-2010年的付费读者为12000人，详见：<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408020936/http://www.ctiadvertising.com/print/books-culture/>.
- 〈3〉 William C. Placher, "Helping Theology Matter: A Challenge for the Mainline", *Christian Century*, October 28, 1998, 994-998, <https://www.religion-online.org/article/helping-theology-matter-a-challenge-for-the-mainline/>.
- 〈4〉 Peter Steinfels, "Belief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 1996, <https://www.nytimes.com/1996/01/13/us/beliefs-064661.html>.
Peter Steinfels, "Provocative and Open-minded, Evangelical Journal Celebrates 10 Years of Breaking Stereotyp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005, https://www.nytimes.com/2005/09/03/us/provocative-and-openminded-evangelical-journal-celebrates-10-years-of.html?_r=0.
- 〈5〉 CT Editors, "Should Evangelical Intellectuals Despair 'Books and Culture's' Demise? Editor John Wilson and historian Mark Noll on the publication's two-decad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of Christian thought.",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0, 2016,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6/october-web-only/should-evangelical-intellectuals-despair-books-and-cultures.html>.

- 〈6〉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94), 3-27.
- 〈7〉 Mark A. Noll, “Evangelical Intellectual Life: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The State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Todd C. Ream, Jerry A. Pattengale, and Christopher J. Dever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18), 15-36.
- 〈8〉 CT Editors, “Should Evangelical Intellectuals Despair ‘Books and Culture’s’ Demise? Editor John Wilson and historian Mark Noll on the publication’s two-decad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of Christian thought.”,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0, 2016.
- 〈9〉 Richard J. Mouw, “Foreword”, *The State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Todd C. Ream, Jerry A. Pattengale, and Christopher J. Dever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18), ix-xi.
- 〈10〉 关于此次研讨会，详见：<http://iwulumen.org/2017-symposium/>。
- 〈11〉 Joel L. Fleishman, *The Foundation: A Great American Secret—How Private Weal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9), 59-60.
- 〈12〉 Joel R. Gardner, *Sustaining the legacy: A History of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updated by Sue Rardin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1012180703/http://www.pewtrusts.org/uploadedFiles/wwwpewtrustsorg/Static_Pages/About_Us/History.pdf. “Pew Legacy”, History, Grove City College, <http://www.gcc.edu/Home/Our-Story/History/Pew-Legacy>. Joseph C. Kiger, *Philanthropists and Foundation Globaliza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8), 104-107. <https://www.princetonreview.com/college-rankings?rankings=most-conservative-students>; <https://thebestschools.org/rankings/20-best-conservative-colleges-america/>.
- 〈13〉 Darren E. Grem, *The Blessings of Business: How Corporations Shaped Conservative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70-81. Billy Graham, *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288. <https://gordonconwell.edu/about/history/>.
- 〈14〉 Steven P. Miller, *The Age of Evangelicalism: America’s Born-Aga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8-101. Mark A. Noll, “Evangelical Intellectual Life: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The State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edited by Todd C. Ream, Jerry A. Pattengale, and Christopher J. Dever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18),

- 15-36.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94), 255.
- 〈15〉 Michael S. Hamilton, Johanna Yngvason, “Patrons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8, 2002,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2/july8/3.42.html>. D. Michael Lindsay, *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 How Evangelicals Joined the American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1-83. Michael S. Hamilton, “Philanthropic Funding, the ISAE, and Evangelical Scholarship”, *Evangelical Studies Bulletin* 88 (Fall 2014 issue), 6-8, <http://www.faithand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Hamilton-on-ISAE.pdf>. “Historian Smith, 72, Dies”,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7, 1997,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1997/april7/1997-04-07-obituary-historian-smith-72-dies.html>. Celeste Kennel-Shank, “Robert Wood Lynn, leader in religion scholarship, dies at age 93”, *The Christian Century*, October 18, 2018, <https://www.christiancentury.org/article/people/robert-wood-lynn-leader-religion-scholarship-dies-age-93>. *The Bible in America: Essays in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Nathan O. Hatch and Mark A. No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Kate Shellnutt, “Templeton Prize Winner: Alvin Plantinga, Who Proved God’s Not Dead in Academia”,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5, 2017,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news/2017/april/templeton-prize-alvin-plantinga-philosophy-gods-not-dead.html>.
- 〈16〉 Michael S. Hamilton, “Philanthropic Funding, the ISAE, and Evangelical Scholarship”, *Evangelical Studies Bulletin* 88 (Fall 2014 issue), 6-8. Michael S. Hamilton, Johanna Yngvason, “Patrons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8, 2002.
- 〈17〉 <https://lillyendowment.org/>; <https://lillyendowment.org/our-work/>.
- 〈18〉 <https://www.pewtrusts.org/en/about/mission-and-values>.
- 〈19〉 Joel R. Gardner, *Sustaining the legacy: A History of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updated by Sue Rardin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2001). Billy Graham, *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288. James Menzies,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Evangelical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ligious Culture*, edited by Timothy J. Demy and Paul R. Shockle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17), 184-186.
- 〈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about/our-history/>.
- 〈21〉 Joshua Doty,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Evangelicals closes”, <http://www.wheatonrecord.com/news/the-institute-for-the-study-of-american-evangelicals-closed/>.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 of American Evangelicals”, <https://www.wheaton.edu/academics/academic-centers/isae/>.
- ⟨22⟩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94), 15-16.
- ⟨23⟩ Peter Steinfeld, “Belief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 1996. Peter Steinfeld, “Provocative and Open-minded, Evangelical Journal Celebrates 10 Years of Breaking Stereotyp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005.
- ⟨24⟩ Alan Wolfe, “The Opening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The Atlantic*, October 2000 issue,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0/10/the-opening-of-the-evangelical-mind/378388/>.
- ⟨25⟩ Ellery Sedgwick,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Monthly, 1857-1909: Yankee Humanism at High Tide and Ebb*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1-19. Susan Goodman, *Republic of Words: The Atlantic Monthly and Its Writers, 1857-1925* (Lebano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1), ix-15. Jason Epstein, *Book Business: Publish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117-119. Tom Wolfe, *Radical Chic and Mau-Mauing the Flak Catchers* (New York: Picador, 2009), 74. Roger Kimball, *The Long March: Ho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1960s Changed America*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0), 225-246. John Schmalzbau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Evangelicalism’s Little Magazine”, *Comment*, January 12, 2017.
- ⟨26⟩ Ellery Sedgwick,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Monthly, 1857-1909: Yankee Humanism at High Tide and Ebb*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30-31. “The Atlantic”,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revised and updated by Adam Augustyn,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The-Atlantic-Monthly>. Jason Epstein, “A Strike and a Start: Founding The New York Review”,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6, 2013, <https://www.nybooks.com/daily/2013/03/16/strike-start-founding-new-york-review/>.
- ⟨27⟩ Ellery Sedgwick,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Monthly, 1857-1909: Yankee Humanism at High Tide and Ebb*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3, 30-31, 34-43, 64-112.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Encyclopedia*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Merriam-Webster, 2000), 107. Jason Epstein, *Book Business: Publish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111-124.
- ⟨28⟩ Gillian B. White, “Emerson Collective Acquires Majority Stake in The Atlantic”, *The Atlantic*, July 28,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7/07/emerson-collective-atlantic-coalition/535215/>. Erik Wemple, “Laurene Powell Jobs’s

- Emerson Collective to purchase majority stake in the Atlantic”,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8,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erik-wemple/wp/2017/07/28/laurene-powell-jobss-emerson-collective-to-purchase-majority-stake-in-the-atlantic/?utm_term=.8058c065bcf0. Oliver Wendell Holmes, *Ralph Waldo Emer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86), 115.
- 〈29〉 Sheelah Kolhatkar, “Rea! Genius Loves Company”, *Observer*, September 25, 2006, <https://observer.com/2006/09/rea-genius-loves-company/>. Edwin McDowell, “The Review of Books Is Sold for \$5 Milli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84, <https://www.nytimes.com/1984/12/18/arts/the-review-of-books-is-sold-for-5-million.html>. Peter Osnos, “The Phenomena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The Atlantic*, December 13, 2011, <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1/12/the-phenomenal-new-york-review-of-books/249912/>. Kathleen Woodruff Wickham, “Hederman Family”, *Mississippi Encyclopedia*, July 11, 2017, <https://mississippiencyclopedia.org/entries/hederman-family/>. Jason McLure and Ilenia Caia, “Fired by family, Hederman made New York Review second act”, January 11, 2016, *Global Journalist*, <https://globaljournalist.org/2016/01/fired-by-family-hederman-makes-new-york-review-second-act/>.
- 〈30〉 <http://abcas3.auditedmedia.com/ecirc/magtitlesearch.asp>.
- 〈31〉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backissues/>;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sthead/>; <https://www.nybooks.com/issues/>; <https://www.nybooks.com/about/masthead/>.
- 〈32〉 关于此部分论述，详见《世代》(www.kosmoschina.org) 以往对教育、中产阶级、文学、启蒙运动的考察及其参考文献。
- 〈33〉 关于《刺猬评论》及文化高等研究所，详见：<https://hedgohogreview.com/about> ; <https://iasculture.org/about/history> ; <https://iasculture.org/scholars/profiles/james-davison-hunter>。
- 〈34〉 Michael S. Hamilton, Johanna Yngvason, “Patrons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8, 2002. D. Michael Lindsay, *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 How Evangelicals Joined the American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5.
- 〈35〉 <https://howardahmansonjr.com/about-howard-ahmanson/>. 关于老霍华德·菲尔斯塔德·阿赫曼森，详参其传记：Eric John Abrahamson, *Building Home: Howard F. Ahma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 〈36〉 Gregory Wolfe, “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a Ahmanson”, *Image*, Issue 83, <https://imagejournal.org/article/a-conversation-with-roberta-ahmanson/>. Marvin Olasky, “Wealth effects: Roberta Green

- Ahmanson on poverty, affluence, faith, art, and journalism”, *World*, March 28, 2009, https://world.wng.org/2009/03/wealth_effects. <https://www.fieldstead.com/ahmansons/>. Roberta Green Ahmanson, Jamie Smith, “The End of Patronage?”, *Comment*, December 1, 2013, <https://www.cardus.ca/comment/article/the-end-of-patronage/>.
- 〈37〉 “Howard and Roberta Ahmanson”, “The 25 Most Influential Evangelicals in America”, *Time*, February 7, 2005, http://content.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93235_1993243_1993260,00.html. <https://www.fieldstead.com/ahmansons/>. Christine A. Scheller, “Connoisseur for Christ: Roberta Green Ahmanson”,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9, 2011,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1/january/art-roberta-green-ahmanson.html>.
- 〈38〉 Ken Auletta, “The Man Who Disappeared”,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29, 1996, January 6, 1997 Issue,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1997/01/06/the-man-who-disappeared>. Margalit Fox, “McCandlish Phillips, Who Exposed a Jewish Klansman, Is Dead at 85”,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9,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4/10/business/media/mccandlish-phillips-times-reporter-dies-at-85.html>. Tony Carnes, “John McCandlish Phillips: Bright Light for Christ in the Big Apple”, *Christianity Today*,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3/april-web-only/john-mccandlish-phillips-bright-light-for-christ-in-big-app.html>. Tony Carnes, “Remembering John McCandlish Phillips”, *First Things*, April 25, 2013,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3/04/remembering-john-mccandlish-phillips>. Terry Mattingly,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McCandlish Phillips”, *Patheos*, April 22, 2013, <https://www.patheos.com/blogs/tmatt/2013/04/the-life-and-times-of-john-mccandlish-phillips/>. <http://www.phillips-journalism.org/about-1>.
- 〈39〉 关于古代基督教文献系列，详见：<https://www.ivpress.com/ancient-christian-commentary-on-scripture>；<https://www.ivpress.com/ancient-christian-texts>；<https://www.ivpress.com/ancient-christian-doctrine-series>。
- 〈40〉 Thomas C. Oden, *A Change of Heart: A Personal and Theological Memoir*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4), 42-43, 67, 118, 133-145, 156, 212-213, 238, 242-254. D. Michael Lindsay, *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 How Evangelicals Joined the American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4.
- 〈41〉 *From Irenaeus to Grotius: A Sourcebook in Christian Political*

- Thought*, edited by Oliver O'Donovan and Joan Lockwood O'Donovan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99), ix.
- 〈42〉 <https://www.discovery.org/about/board-of-directors/>; <https://www.discovery.org/id/about/>.
- 〈43〉 Nina Shapiro, "The New Creationists: Seattle's Discovery Institute leads a national movement challenging Darwinism", *Seattle Weekly*, October 9, 2006, <https://www.seattleweekly.com/news/the-new-creationists/>. Zack Kopplin, "Creationism Whistleblower: 'Academic Freedom' Is Sneak Attack on Evolution", *The Daily Beast*, December 28, 2015,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creationism-whistleblower-academic-freedom-is-sneak-attack-on-evolution?ref=scroll>. Barbara Bradley Hagerty, "Intelligent Design and Academic Freedom", *NPR*, November 10, 2005,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007508>. Stephen Bates, "Archbishop: stop teaching creationism", *The Guardian*, Mar 21,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2006/mar/21/religion.topstories3>. Elisabeth Bumiller, "Bush Remarks Roil Debate on Teaching of Evolutio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 2005, <https://www.nytimes.com/2005/08/03/politics/bush-remarks-roil-debateon-teaching-of-evolution.html>.
- 〈44〉 关于现代西方的“创造论”和“进化论”历史，详参：Ronald Numbers, *The Creationists: From Scientific Creationism to Intelligent Des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Edward J. Larson, *Evolution: The Remarkabl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The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4).
- 〈45〉 "President Bush Awards 2008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s", Press Releas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ovember 17, 2008, <https://www.neh.gov/news/press-release/2008-11-17>.
- 〈46〉 "President Bush Awards the 2006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s", Press Releas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ovember 8, 2006, <https://www.neh.gov/news/press-release/2006-11-08>. MR, "Mark Noll,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 2006",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https://www.neh.gov/about/awards/national-humanities-medals/mark-noll>.
- 〈47〉 关于福音派与美国政治历史，有相当多的文献可以参考，新近的一本是：Frances FitzGerald, *The Evangelicals: The Struggle to Shape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7).
- 〈48〉 Timothy C. Morgan, "Died: John 'Jack' Templeton Jr., Foundation President Who Backed Science-Religion Research",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9, 2015,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news/2015/may/died-john-jack-templeton-jr-billionaire-philanthro>

- pist-who-.html. Tony Carnes, “The \$1 Billion Handoff”,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9, 2005,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september/7.88.html?share=10NtyEW%2bZMKId66ieb-7wEkKxj7D%2bS6lm>.
- <49> Robert L. Herrmann, *Sir John Templeton: Suppor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Spiritual Discoveries* (Radnor, PA: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2004), 65-67, 83-84, 128, 147-150. <https://www.templeton.org/about>; <https://www.templeton.org/about/sir-john>; <https://www.templeton.org/about/vision-mission-impact>.
- <50> Marvin Olasky, “Honoring his father: Jack Templeton, CEO of a wealthy foundation, has a rare commitment to donor intent”, *World*, November 19, 2010, https://world.wng.org/2010/11/honoring_his_father?. M. Mitchell Waldrop, “Religion: Faith in science”, *Nature*, February 16, 2011, https://www.nature.com/news/2011/110216/full/470323a.html?WT.ec_id=NATURE-20110217. Nathan Schneider, “God, Science and Philanthropy”, *The Nation*, June 3, 2010,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god-science-and-philanthropy/>. Libby A. Nelson, “Where Philosophy Meets Theology”, *Inside Higher Ed*, May 21, 2013,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3/05/21/some-philosophy-scholars-raise-concerns-about-templeton-funding>.
- <51> Michael S. Hamilton, Johanna Yngvason, “Patrons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8, 2002. <http://templetonprize.org/previouswinner.html>, <http://templetonprize.org/currentwinner.html>.
- <52> Richard John Neuhaus, *The Best of “The Public Square”, Book Two*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2001), 36-37. <https://www.firstthings.com/about>.
- <53> “Richard John Neuhaus”, “The 25 Most Influential Evangelicals in America”, *Time*, February 7, 2005, http://content.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93235_1993243_1993306,00.html.
- <54> *First Things 2018 Annual Report*,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20-27, 29, <https://s3.amazonaws.com/first-things-resources/uploads/First+Things+Annual+Report+2018.pdf>.
- <55> <https://acton.org/about>, <https://acton.org/about/our-team>.
- <56> <https://acton.org/about/staff/kris-alan-mauren>, <https://www.templeton.org/about/our-board>.
- <57> Alan Jacobs, “Richard John Neuhaus, 1936-2009”, *The American Scene*, January 8, 2009, <http://theamericanscene.com/2009/01/08/richard-john-neuhaus-1936-2009>. Ross Douthat, “Richard John

- Neuhaus, RIP”, *The Atlantic*, January 8, 2009, <https://www.theatlantic.com/personal/archive/2009/01/richard-john-neuhaus-rip/55902/>. Mark A. Noll and James Turner, *The Future of Christian Learning: An Evangelical and Catholic Dialogue*, edited by Thomas Albert Howard (Grand Rapids: Brazos Press, 2008), 16-17, 81-82, 93-94. Mark A. Noll, *From Every Tribe and Nation: A Historian’s Discovery of the Global Christian Story*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4), 176-177.
- 〈58〉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toc/1857/11/>.
- 〈59〉 《马太福音》5:14。Francis J. Bremer, *John Winthrop: America’s Forgotten Founding Fath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xv, 179-182. Richard M. Gamble, *In Search of the City on a Hill: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merican Myth*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1-14. Daniel T. Rodgers, *As a City on a Hill: The Story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Lay Serm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2, 289-308.
- 〈60〉 Ellery Sedgwick,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Monthly, 1857-1909: Yankee Humanism at High Tide and Ebb*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35.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

文 / 丁祖潘

引言

1921年9月19日深夜，忙碌了一整天的胡适（1891—1962）终于得空坐在书桌前，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三时，到协和医学院，代表北大，参与正式开幕典礼。是日典礼极严肃，颇似欧美大学行毕业式时。是日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大多数皆博士服，欧洲各大学之博士服更浓丽壮观。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古代朝服上朝，不知视此如何？）行礼时，颜惠庆代表徐世昌演说，尚可听；齐耀珊（内务）、马邻翼（教育）就不成话了。顾临（R. S. Greene）代表罗克斐洛医社演说，最后罗克斐洛（Rockefeller, J. D. Jr.）演说。罗氏演说甚好，演说词大概是此间有人代他做的。”⁽¹⁾

日记中提到的“罗克斐洛”正是石油大亨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Sr., 1839—1937）的独子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 1874—1960）。小洛克菲勒的发言，同

样给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颜惠庆（1877—1950）留下深刻印象。颜此前会见小洛克菲勒，评价他是“一位举止文雅的人”，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他和顾临（Roger S. Greene, 1881—1947）“作了很好的讲话”。^{〔2〕}

小洛克菲勒代表父亲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幕典礼，在演讲开头宣读了父亲刚发来的贺电：

“我对即将开幕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抱有极高的期待。但愿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充满服务和牺牲的精神。但愿在促进中华民族身心灵福祉方面，医学院能发挥日益广泛的影响力。”^{〔3〕}

洛克菲勒的期待需要时间来实现，而他的慷慨却在几年后协和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那里得到宣扬。1924年，协和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际，创办了一份题为《协医年刊》的杂志。该杂志的扉页印有黎元洪（1864—1928）担任民国大总统期间亲笔题写的刊名，并附加总统印章，显示出这份刊物以及它背后的协和医学院的分量。毕业生们将这一刊物题献给洛克菲勒。在洛克菲勒肖像画的右侧一页，题词如下：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众学生，怀着感激与恭敬，将《协医年刊》创刊号献给洛克菲勒先生。因着您的慷慨和仁慈，医学院才得以建立。”^{〔4〕}

确实，学生们有理由感谢洛克菲勒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若无资金雄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支持，这座当时耗资 8,283,000 美元（相当于如今的一亿多美元）建成的现代化医学院不可能横空出世^{〔5〕}，自然也就谈不上胡适、颜惠庆参加开幕典礼了。

一 白手起家

1839年7月8日晚，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北部一个名叫里奇福德（Richford）的小镇，是六个孩子中的长子。



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董事会合影，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幕典礼，1921年9月。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hina Medical Board, "Dedication ceremony at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 Years: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cessed August 23, 2019, https://rockfound.rockarch.org/digital-library-listing/-/asset_publisher/yYxpQfeI4W8N/content/dedication-ceremony-at-the-pekings-union-medical-college.

19世纪30年代出生的，还有其他几位商业巨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杰·古尔德（Jay Gould, 1836—1892）、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1837—1913）。

由于父亲浪荡不羁，常年在外，又无正当职业，洛克菲勒童年家境清贫。一位邻居提及这群孩子时说到：“我不记得曾见过比他们更被可怜地忽视的孩子了。他们衣衫褴褛，看起来又脏又饿。”^{〔6〕}难得的是，母亲伊丽莎·戴维森（Eliza Davison, 1813—1889）是一个虔诚的乡村妇女，依然忠于婚姻，勤俭持家，艰辛度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洛克菲勒从小就学会帮助母亲干活。洛克菲勒晚年回忆儿时生活时，不无得意地谈到自己七八岁时就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挤奶牛，八岁学会骑马，十岁独自外出购置柴火，再大一点儿就能独自张罗给家里盖新房。这些早年经历让他逐渐建立起对生活的自信。^{〔7〕}

在别人眼中，洛克菲勒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似乎经常在思考”^{〔8〕}，但在许多方面并未有过人之处，唯独从小便显示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特质。

据说他还是个小孩时，买了一磅糖果，分成小份出售给兄弟姐妹，小赚了一笔。七岁时，洛克菲勒在母亲的支持下做成了第一笔买卖：他卖掉从外面捕获并养大的一群小火鸡，然后将这笔买卖的收支情况仔细记录在他著名的“账簿A”（Ledger A）中，发现尽是利润，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支出。^{〔9〕}直到晚年，洛克菲勒仍觉得“非常享受这种小生意。直到今天，闭上眼时我仍可以看到那群优雅而高贵的火鸡沿着小溪静静踱步，穿过丛林，溜回自己的窝”。^{〔10〕}

后来，洛克菲勒把这种记账的习惯带进他建立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以便清楚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从一开始，标准石油公司的管理者就清楚而准确地记账，我们知道自己赚了多少钱，在哪里赚的，

哪里赔的。我们不自欺欺人。”^{〈11〉}

另一个影响洛克菲勒的因素是基督信仰。就在洛克菲勒出生前几年，北美基督教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达到高潮。这场宗教复兴于18世纪末发端于新英格兰和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持续到1830年代末。在此期间，循道宗和浸信会积极传福音，到了19世纪中叶俨然成为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该运动并未局限在精英阶层，反而吸引了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和穷人。一些旨在推广福音的协会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1810年创建的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以及1816年成立的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觉醒诞生了一些从事社会事业的协会，比如1816年成立的致力于废奴运动的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1826年建立的美国禁酒促进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emperance）。^{〈12〉}在1820年代，受这次宗教运动影响的纽约州罗彻斯特（Rochester）福音派信徒主张较为严格的道德规范和宗教教义，反对吸烟、跳舞、玩牌、打台球、上剧院，抵制在星期天营业的商铺。

洛克菲勒大约从六岁开始随母亲伊丽莎到当地一间浸信会教会做礼拜。伊丽莎是一个虔诚的浸信会信徒，自然也让这场宗教运动在儿子身上打下了印记。洛克菲勒早期的照片显示，他面容冷漠，毫无表情，缺乏男孩子的活力，皮肤苍白，眼神无力。^{〈13〉}“回顾我早年的商业事业期和童年，我所认识的浸信会信徒听从他们的良心和宗教教导，不但不在公众场合跳舞，也不在任何地方跳舞，甚至不承认跳舞是件好事……剧院被认为是堕落的根源，应为虔诚的基督徒所远离。”^{〈14〉}

严格道德生活的另一面是对教会的委身，乐于捐献。只要带孩子们去教堂做礼拜，伊丽莎往往会鼓励他们往奉献箱捐钱。就在16岁那年，洛克菲勒拿到人生第一份工作首笔月薪6美元，便将其中的6%捐给教会主日

学和其他宗教活动。^{〔15〕}

洛克菲勒后来把他慈善事业的起源归到母亲对他的宗教影响：“我从一开始就被培养要工作，也要攒钱。我一直以来认为，尽一切可能诚实地赚钱，然后再尽可能把钱捐出去，是一项宗教义务。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教会里的牧师就这样教导我。”^{〔16〕}谈起早年受到的教育，他充满感激：年轻人被教导要定期捐赠自己挣到的钱，“让小孩子早早意识到帮助别人是一件好事，更是一种义务”。^{〔17〕}

此外，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明确将个人归信和社区改革联系起来，启发洛克菲勒日后关注更大的社会问题，最终影响他后来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慈善事业。

1855年，16岁的洛克菲勒因为父亲再婚，不得不中途辍学，放弃读大学的计划。本来，在母亲的支持下，他打算读完大学，为将来当一名浸信会牧师做预备。然而，父亲的决定粉碎了洛克菲勒的牧师梦。“父亲（的信）……告知我上不了大学。于是我认为我必须去工作，谋份差事。”^{〔18〕}这样，洛克菲勒在一间商业学校读了两三个月后便四处找工作。养家的担子落在了他肩头上。尽管当时找工作不容易，幸运的是，洛克菲勒很快在克里夫兰（Cleveland）一家货运委托公司找到一份助理簿记员的工作，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学徒生涯。洛克菲勒喜欢这份工作，加上早年的训练和商业学校学到的知识，他很快便热情地投入工作中。一年三个月后，因人事变动，洛克菲勒接任簿记员一职，年薪500美元。这份工作让他学会与不同人打交道，也因此让他学到不少谈判技巧。由于对工作尽心尽责，勤奋好学，第二年，他的年薪涨到700美元，但这时有一个做生意的好机会，19岁的洛克菲勒便离职与别人合伙创办了克拉克—洛克菲勒公司（Clark & Rockefeller），注册资金4000美元，主营货物运输。洛克菲勒负责融资和记账。随着生意做大，资金问题越发急迫，好在洛克菲勒赢得银行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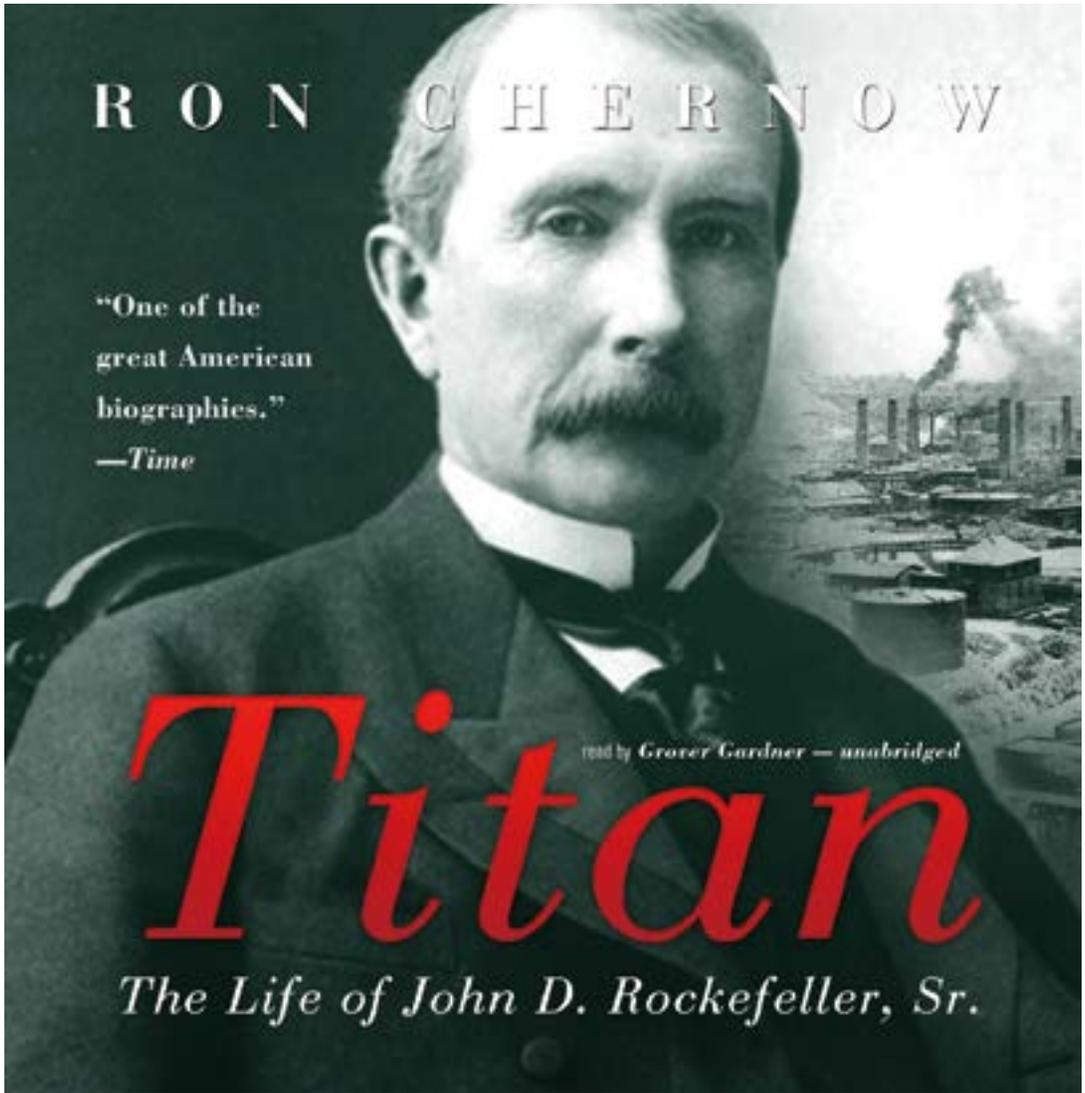
很快得到贷款。公司成立第一年，销售额就达到 50 万美元。^{〈19〉}

随着内战结束，美国的经济开始起飞。西部出现大规模开发的浪潮，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修建，将美国东西部迅速连在一起，刺激移民们源源不断地向西部迁徙。新能源的发现和运用，新机器、新材料、新工艺的发明和推广，特别是炼钢、石油冶炼等领域的技术革新，加之科学管理的应用和垄断资本的兴起，使得美国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美国战后的经济腾飞。^{〈20〉}洛克菲勒抓住这一机会，开始进军石油行业。

早在 1860 年代初，洛克菲勒与合伙人组建了一家公司，炼制和出售石油，尝试进入石油行业。1865 年，公司解散拍卖，洛克菲勒在激烈的竞标中以 72,500 美元的高价竞拍成功，成立了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 (Rockefeller & Andrews)，正式涉足石油行业。洛克菲勒投身于此约 30 年，直到 56 岁退休。^{〈21〉}1870 年，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又与其他公司联合，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招募优秀人才，提高炼制工艺，并购大型炼油厂形成规模效应，开拓海外市场，洛克菲勒的新公司不断壮大，发展迅猛，由最初俄亥俄州的一家合营企业，发展成一家由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组成的大型企业。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洛克菲勒在石油工业中已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了全美国 90% 的石油生产。^{〈22〉}

截止 1909 年洛克菲勒写回忆录时，标准石油公司已有 6 万名员工，3,000 辆油罐车，其经营范围除了覆盖美国全境，还包括将美国石油输送到欧洲、日本、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每周为美国创造 100 多万美元的财富。^{〈23〉}此外，洛克菲勒还投资许多不同的行业，如采矿业、铁路、造船等等，成为 20 世纪初美国数一数二的商业巨头。

晚年的洛克菲勒在一次基督徒查经聚会上，回顾一生的商业生涯时，将他商业成功的起点归于教会主日学和基督教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对他的影响。“在我十四岁时，我在教会



一本老洛克菲勒传记，<https://www.amazon.in/Titan-Life-John-Rockefeller-Sr/dp/1470882167>。

和学校与一些善良的成年人，还有一些优秀的青年来往。我在教会、主日学、青年会的来往活动，极大地帮助我开展持续一生之久的事业。”⁽²⁴⁾

二 得力助手

面对每年不断增长滚滚而来的财富，洛克菲勒几乎要被淹没。后来成为洛克菲勒得力助手的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 1853—1929）在1905年夏给洛克菲勒的信中说到：“你的财富如雪崩一样排山倒海而来，你一定要跟上，你的财富要散得比长得快才行。否则，它将碾碎你、你的孩子和孩子的子孙后代。”⁽²⁵⁾ 盖茨的劝告或许多余，因为如前所述，洛克菲勒早年就培养了捐赠的习惯。仅在1865年，26岁的洛克菲勒就捐出1,012.35美元，1869年达到6,000美元，并且从始至终捐赠的对象跨越宗派、国籍和肤色。⁽²⁶⁾

其实，在19世纪末美国产生的一批亿万富翁中，洛克菲勒不乏同类。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了惊人的财富。据估计，美国的百万富翁从1880年的100人增加到1916年的4万人。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 1834—1906）的个人财富估计达到1.5亿美元，卡内基将其钢铁公司卖给摩根后仍拥有3亿美元。1913年摩根去世后，其净资产达6800万美元，而同一年，洛克菲勒的个人财富据说高达9亿美元。⁽²⁷⁾ 他们的影响力表现在，洛克菲勒于1870年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很快几乎控制了美国整个石油冶炼行业。摩根甚至几次出手帮助美国财政部应对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工业化辉煌成就的背后是贫富差距悬殊，特别是大量移民涌入城镇，导致城镇住房、教育、交通和市镇服务紧张，尤其是卫生条件恶化，疾病蔓延。1893—1897年严重的经济衰退更是造成严重后果，以至于在芝加哥，绝望的人们不得不到垃圾场中寻找食物。到了1900年，尽管

经历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扩张，美国仍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28〕}

这些亿万富翁们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大显身手，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为如何花掉巨额财富感到头疼。从1900—1925年间，这些商业巨头为美国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大学、基金会、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机构，极大丰富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他们从事公益的动机多种多样，或是真正为社会福祉考虑，或是出于宗教信仰，或是想得到社会认可，或是想青史留名。至于洛克菲勒，除了早年的宗教信仰之外，卡内基的“财富福音”格言在他内心产生共鸣：死时富有的人死得并不光彩。在给卡内基的一封信中，洛克菲勒写到：“我希望看到更多富人做你用金钱正在做的事……但我确信，你的榜样会结出果实，这一刻将会到来，那时，富人会更乐意为他人的益处使用钱财。”^{〔29〕}

毫无疑问，洛克菲勒正属于他所说的富人。然而，洛克菲勒的问题不在于能否为了他人的益处慷慨解囊，而是如何有效而又智慧地捐赠？他厌恶不加区别地随处捐赠，唯恐自己捐出去的钱让受捐者不必自食其力，反而变得具有依赖性。他相信“花钱所投入的精力至少要与挣钱所投入的精力一样多”^{〔30〕}，问题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正当洛克菲勒苦于被各种捐赠申请缠身无法自拔时，盖茨的出现，正好帮了他的忙。

随着收入剧增，洛克菲勒的捐赠越来越多，每天向他申请资助和捐赠的信件如同雪花般纷至沓来。洛克菲勒回忆说：“大约在1890年，我的捐赠仍然缺乏计划，一有资助申请，我就到处给予。”^{〔31〕}这种几乎有求必应的给予占据了洛克菲勒大部分时间，严重损害他的健康，若不改变，他很可能不是被滚滚而来的财富淹没，而是被如雪花般飞来的信件窒息。洛克菲勒一直在细心观察，物色替他分忧的人选，终于，明尼苏达州浸信会牧师盖茨进入他的视线。

早在 1880 年代后期，盖茨为争取洛克菲勒资助在芝加哥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就与洛克菲勒结识。经过几次考验，特别是在帮助洛克菲勒创建芝加哥大学的过程中，盖茨的言谈应对给洛克菲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快发现盖茨具有出色的调查研究能力，能在投资方面给他很好的建议。而与此同时，盖茨也在用心观察眼前的这位富豪。他很快就为洛克菲勒倾倒。盖茨写信给他的父母，充满热情地夸赞洛克菲勒：“这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他视野极广，头脑极为清晰，最富于同情心，又十分冷静，对他认为的责任极为重视，且不易受权威和地位左右。”^{〈32〉}

终于，1891 年 3 月，洛克菲勒在位于纽约百老汇 26 号标准石油公司大楼的办公室，向盖茨发出正式邀请，希望他来帮助自己料理慈善事业：

“盖茨先生，我有麻烦了。这些资助申请给我的压力越来越大，难以承受。加上繁重的商业责任，我已经没有时间精力很好地处理这些需求。我不能随意给钱，除非我仔细研究它们是否值得。可是，这些调查正在耗费我越来越多的精力，超过照料标准石油公司……我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选。我想让你来纽约开一间办公室，帮助我做捐赠。你可以做采访、调查，把结果告诉我，以便采取行动。”^{〈33〉}

盖茨接受了洛克菲勒的邀请，于当年 9 月搬进洛克菲勒在纽约的私人办公室。从前，洛克菲勒犹如一只“被追猎的野兽”，如今，盖茨成为他的盾牌。两人性格差异极大，盖茨性格鲜明，心直口快，雄辩而冲动，与此相反，洛克菲勒滴水不漏，冷静内敛，沉默寡言，做事谨慎而有耐心。^{〈34〉}盖茨做事极有主见，即便与洛克菲勒共事，也“有意识地丝毫不让他预期的观点控制或者更改我的观点。相反，当我知道会产生冲突时，我总是努力加强我的观点，而不是放弃或隐藏”。^{〈35〉}当然，盖茨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开诚相见而不乏礼节。而洛克菲勒所要的，正是这种坦诚布公。多年后，洛克菲勒写信给盖茨，认为他们能走在一起亲密共事，其中有上帝的旨意

(Providence)。^{〔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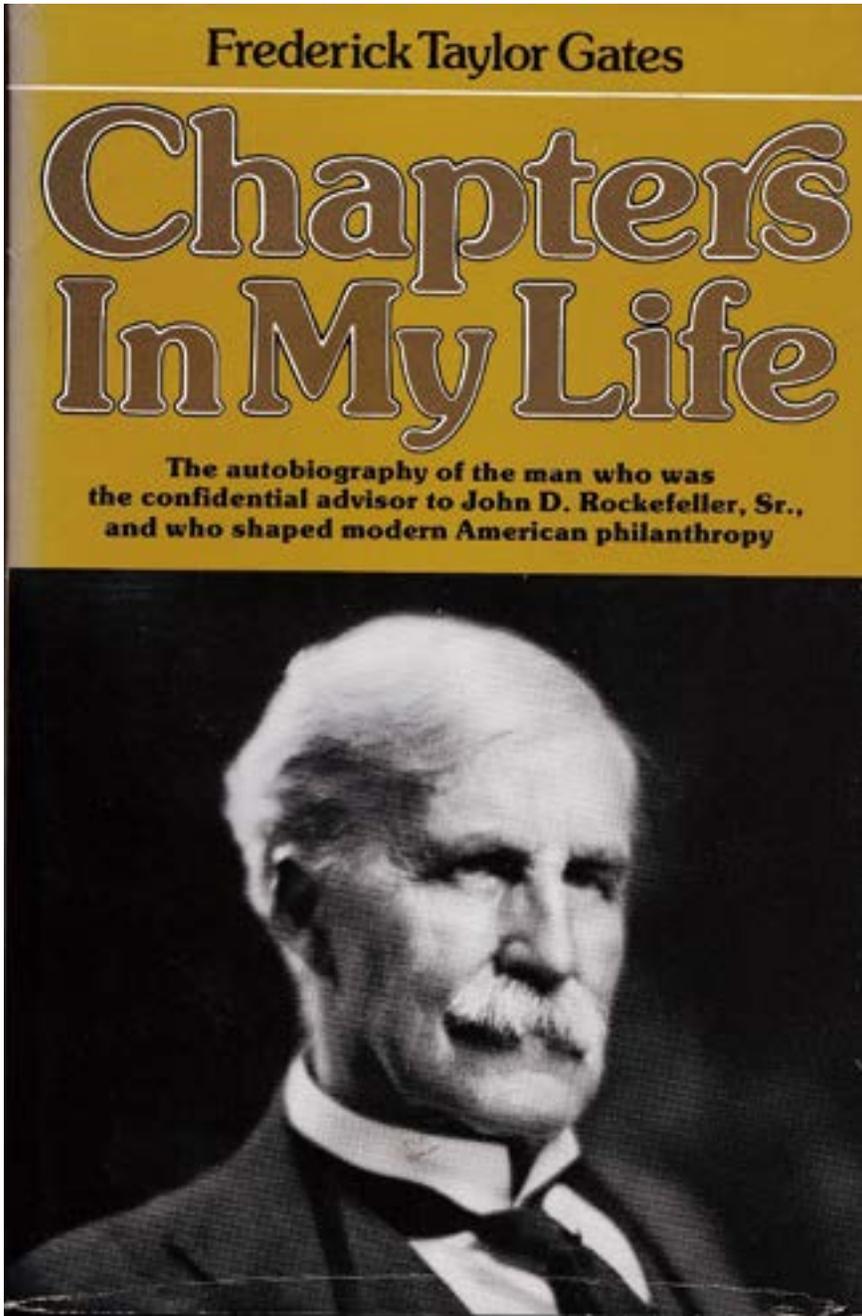
盖茨组建了一个团队，专门处理每天办公室接到的大量资助申请，因为“阅读办公室每天收到的几百封申请信，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能力”^{〔37〕}，何况，这些申请信若要有效，申请人在信中势必详尽阐述，篇幅定然不小。团队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分类和调查信件。不久，盖茨就感到洛克菲勒此前的捐赠方式必须改变。

“令我担忧的并非是公众对洛克菲勒的无理偏见，而是他本人的巨额财富最终的归宿。它会像其他富翁做的那样留给子孙后代，同时伴随各种丑闻和堕落吗？在我看来，洛氏及其子孙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立一系列大型的企业慈善，以推动这个国家乃至全球的文明。如果可能的话，慈善，在时间和数量方面应是无限的，范围广泛，且是永久存在的。”^{〔38〕}

三 科学慈善

盖茨所带来的，就是在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中引进和发展科学赠予 (scientific giving) 的原则，让洛克菲勒放弃“零售赠予” (retail giving)，转向“批发慈善” (wholesale philanthropy)，后者指的是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捐赠。^{〔39〕}他要启动的批发式慈善，以科学慈善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为宗旨，将社会改造与慈善紧密联系起来。

盖茨的慈善理念并非独创。“以科学服务社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金会创立者包括卡耐基在内的共识。理性既是创立转移财富的慈善基金会之主导原则，又是基金会开展捐赠事业时的工作原则。^{〔40〕}基金会所资助的项目，将是“根本性的、永久性的和普遍性的，而非地方性的、临时性的和肤浅的”。^{〔41〕}为了说明这一点，盖茨以洛克菲勒对浸信会海外宣教士的捐赠为例：



盖茨自传，<https://www.amazon.ca/Chapters-My-Life-Frederick-Gates/dp/0029113504>。

“他（按：指洛克菲勒）每天都收到个别浸信会宣教士的请求……他的办公室、住所、餐桌旁围绕着从宣教禾场返回的宣教士。其中每个人除了自己的领域外对其他领域都相当无知……我们切断了每一个个别宣教士的请求。我们让每个申请者直接向波士顿的宣教机构申请……此后，洛克菲勒先生不再像过去那样捐赠数千美元，而是成千上万美元，其中每一块钱都让经验丰富的董事会花掉。”^{〔42〕}

受盖茨影响，洛克菲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慈善理念。他认为最好的慈善（philanthropy），“就是能提供最大的帮助，造成最小的损害。这样的帮助能够从根本上滋养人类文明，最广泛地传播健康、正义和幸福。这样的帮助不是通常所说的慈善（charity）”。^{〔43〕}若换成另一种表述，洛克菲勒认为最好的慈善，在于“持续不断地探索终极性，尝试从源头上根除罪恶”。^{〔44〕}要靠慈善根除几千年来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罪恶，进而改造社会，或许再也没有比这更乐观也更崇高的理想了。

洛克菲勒根据历史学家威廉·莫雷（William C. Morey, 1843—1925）对人类文明的概括，在此基础上将文明的要素总结为六方面：生活资料、政府与法律、语言与文学、哲学与科学、艺术与品味、道德与宗教。盖茨在最后另添两项：健康与卫生、生殖与优生。这样，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主要是针对人类文明的上述八个领域。洛克菲勒相信高等教育可以促进上述第2—4方面的进步。这样就不难理解，洛克菲勒在医学院及高等教育方面的巨额捐赠了。^{〔45〕}

明确慈善原则和捐赠领域之后，盖茨帮助洛克菲勒接受用商业合作的方式来办慈善，成立慈善信托机构（Benevolent Trusts）。用洛克菲勒的话来说，慈善信托机构将提升慈善的标准，考查事物的真相，鼓励与支持高效的员工和机构，在帮助所有人自助的同时，提升慈善的理解标准。^{〔46〕}这一理念建立起来的慈善机构，需要掌握商业技能的专业人士通过科学方法

妥善而高效地管理捐赠者捐给社会的基金，目的是让每一分钱发挥的效用最大化。^{〔47〕}换言之，就是用商业模式来做慈善。

洛克菲勒没有看错盖茨，很快，盖茨成为多家企业的总裁，用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是充满智慧的商人”。^{〔48〕}

1897年夏天，盖茨在休假时被一本名叫《医学的原则和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的书吸引，作者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创院教授、有着“现代医学之父”美誉的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 1849—1919）。他利用休假的两个月时间将这部五年前出版、一千多页的大部头著作一字不落读完。这本书让他发现，自然科学科系中，天文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在大学和学院收到许多捐赠，而因为商业运作的关系，医学院得到的捐赠则很少，科研只能靠个人力量，而且缺乏相应的实验设备。^{〔49〕}盖茨清楚地认识到，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得到大量捐赠，使有能力的人有条件全身心且不受干扰地学习和研究。他们要能得到丰厚的薪酬，完全不必为了谋生而行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一家医学研究机构应该在美国建立起来。盖茨敏锐地意识到，这对洛克菲勒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为他的国家甚至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50〕}

很快，盖茨给在克里夫兰度假的洛克菲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极力劝说洛克菲勒在美国建立一所与德法比肩的研究机构，该机构专注于科学医学研究（scientific medical research）。洛克菲勒对此颇感兴趣，但鼓励盖茨进一步深入调查。不久，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在位于纽约莱克星敦大道的一处高楼建立起来，洛克菲勒允诺每年为此捐赠两万美元，为期十年。他还将一批当时在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的权威人士延至麾下，比如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韦尔奇（William Welch, 1850—1934）担任研究所所长，说服原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学教授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 1863—1946）加入教

授团队，由此建立起一家世界级的医学研究中心，同时也开启了洛克菲勒对医学教育的持续捐赠。

191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盖茨在演讲中提出他相当有趣当然也不乏争议的“医学神学观”，把研究所比作神学院，甚至是“现代版的耶和华圣殿”，因为医学研究的价值是普世的，它的果效超越国界、身份等一切障碍，“其价值有如上帝之爱那样普遍”，造福世人。盖茨甚至称呼弗莱克斯纳为神学博士（D.D.），实验室好比圣地。上帝正在向研究人员揭开奥秘。盖茨相信，医学研究将帮助人们发现新的道德律和社会规律，重新定义人际关系中的是与非。医学人员将扮演传教士的角色，医学研究对于人类社会乃至宗教意义重大，“科学研究正在服务于人类。这些服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建，而神学正在根据科学而重建。”^{〔51〕}

与此同时，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也在其他领域展开。在盖茨的主导下，洛克菲勒于1902年成立普遍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 GEB），调查美国南方教育现状，并选择最有影响力的领域为捐赠对象，进而推动了美国南方中小学的教育改革。洛氏为高等教育捐赠给普遍教育委员会的1亿4千万美元中，其中有两千万投入医学领域。1909年，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Rockefeller Sanitary Commission）成立，致力于消除美国南方州的钩虫病并取得成功。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 1834—1926）在给盖茨的信中称赞到：“这一切显示，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抵制钩虫病是最为有效的运动，其中医学科学和慈善联合起来。”^{〔52〕}

四 建立基金会

从建立上述慈善信托机构进而取得的成就中，洛克菲勒似乎找到了经

营慈善事业最为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将资金交给独立的信托董事会来处理，董事会成员由他能找到的经验最为丰富的人组成。董事会成员有权自行挑选行政人员。洛克菲勒本人并不参加这些董事会，即便后来曾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也没有出席过一次会议。他信任专业人士，看自己是门外汉。

早在 1905 年 6 月 3 日，盖茨在写给洛克菲勒的信中，就建议洛克菲勒考虑设立一系列独立的基金，这些基金目标各有不同，或为促进全世界的医学研究，或为推动全球基督教伦理和文化，或是致力于在国内发展高等教育，丰富乡村生活等等。^{〈53〉}经过多次商讨，洛克菲勒于 1909 年 6 月 29 日签署一项信托契约，将标准石油公司 72569 支股份市值 5 千万美元，交给小洛克菲勒、女婿哈罗德·麦考密克（Harold McCormick, 1872—1941）和盖茨，这一信托机构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的目的是“促进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外民众的福祉及文明进步，获取知识并加以传播，防止并且纾解苦难，推动人类进步的各项要素”。^{〈54〉}等到 1913 年 5 月 14 日基金会于纽约州正式注册取得纽约法院发给的经营执照时，以上表述被简化为“促进全人类的福祉”。^{〈55〉}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出制定者盖茨那“超越国界的同情心”，将自己与全人类连在一起。

1913 年 5 月 22 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章程及附则，选举小洛克菲勒担任基金会主席，传教士的儿子、生于日本的哲罗姆·格林（Jerome Greene, 1874—1959）为秘书长，收藏家路易斯·梅尔斯（Louis Myers, 1874—1932）为财政主管。^{〈56〉}新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根据以往经营慈善事业取得的经验，设定了一些工作框架，比如将个人性的慈善和救济排除在外，选择资助能够在当地形成示范效应的机构，与当地社区合作分担经费，以免损害受资助方的独立性。在资助福

利院，减轻孤儿、盲人和残障人士的痛苦与根除个人及社会弊病之间，基金会优先考虑后者。^{〔57〕}洛克菲勒基金会后来考虑在北京建立协和医学院时，大体上遵循了这一框架。

这样，一个与以往慈善机构不同的现代基金会在20世纪初建立起来。按照现代基金会的一般定义，它是非政府、非盈利组织，有自己的主要基金，由董事会管理，旨在维持和资助社会、教育、慈善、宗教及其他服务于公共福利的活动。依据这一标准，仅1915年，美国就已有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27家现代基金会。这一数量在2008年达到11.2万，其总资产高达6270亿美元，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即便在如今，相较于欧洲和亚洲，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首屈一指。^{〔58〕}

然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甫一建立，就因科罗拉多屠杀（Colorado Massacre）一案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经受严峻考验。从1893年的经济恐慌到一战前，美国劳工联合起来发起了第一波争取工业化民主的运动。1902年，洛克菲勒出资600万美元购得科罗拉多燃料和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and Iron Company, CFI）40%的股份和43%的债券，取得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1903—1904年，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 UMW）举行反对洛克菲勒科罗拉多燃料和铁矿公司的罢工运动，结果失败，许多罢工工人被解散。十年后的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卷土重来，这一次，州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镇压，于1914年4月20日攻击并烧毁勒德洛（Ludlow）一处罢工工人临时搭建的帐篷营地，导致包括11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内的多人丧生，故此科罗拉多屠杀又被称为勒德洛屠杀。这场屠杀及其引发的州境“内战”，震惊全美，国会委员会和工业关系委员会（Industrial Relations Commission）介入调查，引发一波对罢工工人的同情。^{〔59〕}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有理由怀疑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其他慈善基金会

一样，其目的不过是强化这些工业大亨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相较于美国劳工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地位。这些新成立的基金会，能否像它声称的那样，无私地资助个人、机构？尤其是在涉及可能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研究时，基金会真能保持不偏不倚吗？

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方面成立调查团彻查该惨案发生的原因，“不是去判断任何特定争议的是非曲直，而是以完全客观的方式和科学方面的精确，收集本国和他国的经验，以阐述现代工业中固有的恶和成功或有希望的试验”^{〔60〕}，一方面配合出席来自政府和国会的调查听证会。小洛克菲勒在接受国会成立的弗兰克·华尔士（Frank Walsh, 1864—1939）委员会问讯时为基金会的存在、独立性辩护。当被问到如果洛克菲勒将这些钱直接发给工人而不是捐赠给基金会，是否会做成更多的公共服务时，小洛克菲勒回答说：

“主席先生，我想我的父亲常常想到这一点。我同样也真心认为，慈善的最佳形式之一就是把钱投资在建立生产性的产业上。同时，我认为我父亲看到，捐钱给其他组织、教育、慈善等领域，从而很好地做成某些事，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使用金钱最高且最富于生产性的方式之一。”^{〔61〕}

洛克菲勒父子均认为，公众舆论监督加上法院有权撤销和更改任一公司的执照，能有效防止基金会滥用权力。出席听证会的前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认为基金会是用“企业的方式使用巨额资金，以促进人类的福利”^{〔62〕}，并不会威胁到美国人的福利或者自由。在结束发言时，艾略特作证总结说：

“它（按：指洛克菲勒基金会）致力于全人类的益处，无论种族、外表或宗教信仰。我担任董事会成员不到一年，虽然不是创始会员，但就我所见，我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我所知最令人钦佩（admirable）的慈善机构。我所指的‘令人钦佩’，意思是其目标和组织效率方面的智慧。”^{〔63〕}

好在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发起的对基金会的调查结果，并未限制基金会的发展。从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注册到1927年，洛克菲勒在此期间陆陆续续向基金会共计捐赠182,851,480.9美元。^{〔64〕}在处理如此庞大的巨额财富时，盖茨将基金会的工作当作一项神圣使命，在1923年作为基金会董事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盖茨做了一次告别演讲：

“当你离世，来到全能上帝的审判台前，你觉得上帝对你有何要求呢？你会不假思索地以为上帝会查究你那些无关紧要的失败或者微不足道的美德吗？不！他只会问一个问题：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名董事，你都做了些什么？”^{〔65〕}

这样，盖茨将宗教、慈善、商业以他认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晚年的洛克菲勒对盖茨评价甚高：“他拥有罕见的商业能力，经验丰富，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完成对人类社会具有伟大和持久益处的事业。”^{〔66〕}

五 转向东方

在盖茨的推动下，公共卫生成为基金会最优先考虑的领域。盖茨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说到：“如果科学和教育是文明体系的大脑和神经，那么卫生就是心脏。正是这一器官将不可或缺的血液送往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使得每个器官能发挥作用……疾病是人类生活最大的不幸，它是几乎所有其他人类不幸——贫穷、犯罪、无知、邪恶、无能、遗传性疾病、败坏和其他罪恶的主要原因。”^{〔67〕}

基金会计划将先前在美国南方消除钩虫病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世界，成立国际卫生委员会(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在消除钩虫病的同时，“促进公共卫生，传播科学医学的知识”。^{〔6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将目光转向了东方。

洛克菲勒一直以来对教会向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宣教有兴趣。他本人与来华宣教士保持通信，常给宣教士捐赠。基督教青年会的拓展者和学生自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领袖约翰·穆德（John R. Mott, 1865—1955），据说与洛克菲勒联系频密。莫特在194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896年，他的首次来华就是受洛克菲勒资助。^{〔69〕}从20世纪初开始，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就不再参与其父的石油业和其他企业的管理，全力投入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小洛克菲勒还曾赞助过纽约一家中国人主日学。而盖茨曾在美国内战结束不久短期修读过大学有关亚洲的课程，或多或少对中国也有些兴趣。^{〔70〕}

1905年1月31日，盖茨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长信，力劝洛克菲勒将目光转向外部世界，特别是远东地区。他急切地解释说：“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这为我们英语国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业提供了自由的土壤。”换言之，远东地区对美国的未来十分重要。盖茨建议洛克菲勒向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捐赠10万美元。那年4月17日，《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发表了盖茨的这封信，向公众表明洛克菲勒在远东发展慈善事业的愿望。^{〔71〕}这封信预示了洛克菲勒介入改变中国的开端。

在三次派遣考察团来华了解中国医学教育情况之后（分别为1908年东方教育考察团、1914年第一次医学考察团和1915年第二次医学考察团）^{〔72〕}，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购买原北京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Peking）的教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所新的协和医学院，从而开启了西医在华发展影响深远的一页。^{〔73〕}洛克菲勒的名字也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连在一起，在当时协和毕业生刘绍光（1897—1990）的眼中，美轮美奂的协和医学院，正是洛克菲勒和他建立的基金会给中国的赠礼：

“白发老人救世情，隔洲渡海创金城。铁梁铜柱三千壮，画阁楼台

百万赢。荟集美欧医国土，聘来华夏济苍生。修成镜殿无尘染，满地云腾欢颂声。”^{〔74〕}●

-
- 〈1〉 《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1921～1922），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17页。
- 〈2〉 《颜惠庆日记》（一九二一——一九三六）第二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71—72页。有关颜惠庆的生平，参见其英文自传 W.W.Yen, *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4: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4)。小洛克菲勒的传记，见 Raymond B. Fosdick, *John D. Rockefeller, Jr., A Portrai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6)。有关洛克菲勒的生平，见其自传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09)，以及两本传记：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Allan Nevins, *Study in Power: John D. Rockefeller, Industrialist and Philanthropist*, 2 vo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有关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幕典礼的记录，包括日程安排和嘉宾发言稿，见 *Addresses & Papers, Dedi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eptember 15-22, 1921* (Concord: Rumford Press, 1922)。对中国代表、顾临、小洛克菲勒发言的比较和评价，参见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17-23。
- 〈3〉 John D. Rockefeller, Jr., "Response for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Addresses & Papers, Dedi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eptember 15-22, 1921*, 57。
- 〈4〉 原文为英文：“To Mr. John D. Rockefeller, through whose generosity and benevolence, the existence of the institution is made possible, this first volume of *The Unison* is gratefully and respectfully dedicated by the students of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北京协和医学院编，《协医年刊》，1924年。（中国国

家图书馆缩微文献，索引号 MGTS/094828)

- 〈5〉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86. 该书最初由哈珀兄弟 (Harper & Brothers) 于 1952 年出版。根据此书, 北京协和医学院竣工于 1921 年, 花费 8,283,000 美元, 这相当于 2019 年的 118,725,005.20 美元, 参见: <http://www.in2013dollars.com/us/inflation/1921?amount=8283000>。
- 〈6〉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12.
- 〈7〉 J. D. Rockefeller, Sr., *Early experiences of a young business man* (1905), 4-5, <https://archive.org/details/earlyexperiences00rock/page/n9>.
- 〈8〉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17.
- 〈9〉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33;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17.
- 〈10〉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34.
- 〈11〉 同上, 第 73—74 页。
- 〈12〉 胡斯托·L·冈萨雷斯著, 赵城艺译, 《基督教史》(下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 第 297—300 页。
- 〈13〉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17. 照片见该书第 14 页。
- 〈14〉 同上, 第 20 页。
- 〈15〉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4.
- 〈16〉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19.
- 〈17〉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75.
- 〈18〉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43.
- 〈19〉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35-46.
- 〈20〉 张津瑞、林广:《地图上的美国史》(第二版),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年, 第 107—111 页。
- 〈21〉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79-81.
- 〈22〉 艾伦·布林克利著, 陈志杰等译, 《美国史》II,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第 716 页。
- 〈23〉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57, 59, 61.
- 〈24〉 J. D. Rockefeller, Sr., *Early experiences of a young business man* (1905), 3-4.
- 〈25〉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3. 盖茨的自传, 见 Frederick Taylor Gates, *Chapters in My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以及回忆文章: Frederick T. Gates,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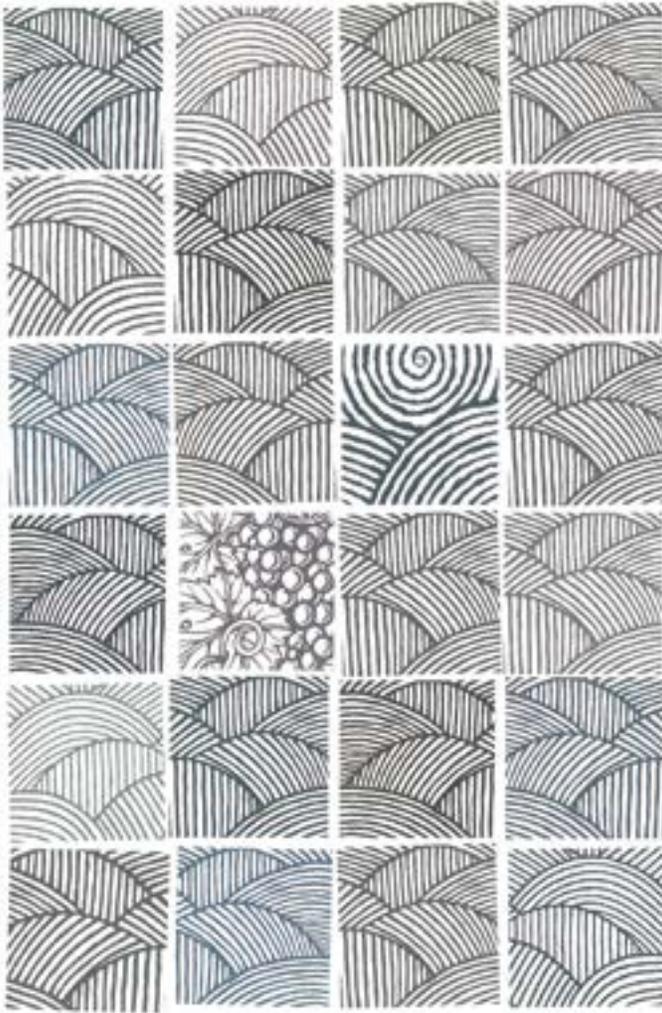
-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in *American Heritage*, 1955, 66.
- 〈26〉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4-5.
- 〈27〉 Barbara Howe,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1900—1920: Origins, Issues, and Outcomes," in *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 Found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Robert F. Arno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6.
- 〈28〉 保罗·S·博耶著, 陈岷斌译, 《美国简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年, 第233、241页。
- 〈29〉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5-6.
- 〈30〉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67.
- 〈31〉 同上, 第156页。
- 〈32〉 Allan Nevins, "Frederick T. Gates and John D. Rockefeller, An Introduction," in *American Heritage*, 1955, 66.
- 〈33〉 同上, 第68页。
- 〈34〉 Allan Nevins, "A postscript", in *American Heritage*, 1955,86;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
- 〈35〉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3.
- 〈36〉 洛克菲勒于1913年7月25日写给盖茨的信, 转引自 Allan Nevins, "A postscript," in *American Heritage*, 1955, 86。
- 〈37〉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70.
- 〈38〉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80.
- 〈39〉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7.
- 〈40〉 Barbara Howe,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1900—1920: Origins, Issues, and Outcomes," in *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 Found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Robert F. Arno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33.
- 〈41〉 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38页。
- 〈42〉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7.
- 〈43〉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41-142.
- 〈44〉 同上, 第177页。
- 〈45〉 William C. Morey, *Outlines of Ancient History* (New York, Cincinnati, Chicago: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06), 9;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58, 160;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81.
- 〈46〉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86.
- 〈47〉 同上, 第184页。
- 〈48〉 同上, 第122页。

- 〈49〉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72.
- 〈50〉 同上。
- 〈51〉 Frederick T. Gates, "Address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1911)," in *Mak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ader*, edited by David C. Hammack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1-328;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74.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8.
- 〈52〉 Frederick T. Gates, "The Memoirs of Frederick T. Gates", 82.
- 〈53〉 Allan Nevins, *Study in Power: John D. Rockefeller, Industrialist and philanthropist*, Vol. II (New York and 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387.
- 〈54〉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5.
- 〈55〉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13-14), 7;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0.
- 〈56〉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13-14), 9.
- 〈57〉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2-23.
- 〈58〉 *The Foundation Directory*, Edition 1, edited by Ann D. Walton and F. Emerson Andrew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0), IX-X; David C. Hammack, Helmut K. Anheier, "American Foundations: Their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in *American Foundations: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edited by Helmut K. Anheier, David C. Hammack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3-27, 特别见第 4—5 页。
- 〈59〉 有关该案的一般性叙述, 见 Arthur S. Link,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60-61。较为深入的分析, 可参考 Graham Adams, Jr., *Age of Industrial Violence, 1910-191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146-175; Ron Chernow, *Titan: 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Sr.*, 571-590.
- 〈60〉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13-14), 18.
- 〈61〉 "Industrial Relations: Final report and testimony submitted to Congress by th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created by the Act of August 23, 1912, Vol. VIII in *Senate Document*, No. 415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6), 7850.
- 〈62〉 同上, 第 7982 页。
- 〈63〉 同上, 第 7983 页。
- 〈64〉 Raymond B. Fosdick,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1.
- 〈65〉 同上, 第 1 页。
- 〈66〉 John D. Rockefeller,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 117.

- 〈67〉 Fosdick, *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23-24.
- 〈68〉 同上, 第 24 页。
- 〈69〉 Shirley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A., 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5, 87. “John R. Mott, Biographical”, *The Nobel Prize*,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1946/mott/biographical/>.
- 〈70〉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1.
- 〈71〉 马秋莎:《改变中国》, 第 4、139 页。
- 〈72〉 *Addresses & Papers, Dedi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eptember 15-22, 1921*, 3.
- 〈73〉 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经过的一般记载, 可参见顾临, “History of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协和年刊》(1924 年), 第 9—14 页, 以及邓家栋 (1906—2004): “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 见《话说老协和》,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第 16—25 页; 胡传揆 (1901—1986):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办概况”,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第 129—150 页。
- 〈74〉 刘绍光: “本校开幕”, 见《协医年刊》, 第 167 页。

高静宁 主编

田野万象



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报告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丛书 第八种

《田野万象——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报告》，
https://www.vwlink.net/book_details?pkey=30705。

工商团契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及影响

文 / 曹志

一、导言：作为宗教现象的工商团契

从200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内地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工商团契」或「企业家团契」。「团契」一词，对应的英语词为“fellowship”（伙伴关系），源于圣经，为基督教所专用，指称特定群体基督徒的聚会。

本项研究将团契看做是基督徒结社形成的一种组织，我们的研究对象「工商团契」是由工商界的基督徒，尤其是企业家创建和参与的组织。「工商团契」这个词不仅被基督徒企业家冠为组织名称，而且其组织活动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从名称、成员身份、组织形态、活动方式、活动内容特别是使命而言，工商团契的动力不是营利、慈善或公益，而是基督教信仰。这是工商团契在内地被视作新式组织的基本原因。不管是投身其中的基督徒企业家还是初次参加的非基督徒企业家，工商团契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奇的宗教生活。

进入 2010 年代以来，基督徒工商界人士这种结社现象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如 2013 年《财经天下》最后一期刊登专题报道〈中国基督徒商人〉，⁽¹⁾立刻引发其他媒体评论：《时代周报》之〈中国基督徒商人，真有那么美？〉、⁽²⁾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办刊物《天风》的〈基督徒工商团契，如何才能美？〉。⁽³⁾

事实上从基督教入华开始就有基督徒商人，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徒成为商人、或商人成为基督徒也不足为奇。但是，工商团契作为一种新式组织，它的「新」具体体现为哪些内涵？这种组织为什么产生？它满足了其核心成员即基督徒企业家哪些需求，以何种方式对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是本项研究的出发点。

我们或许还无法将「工商团契」及其兴起看作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理由很简单：经济文化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内，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经济行为间的大量联系，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集合，该集合以特定的经济特性、结果以及重叠的社会价值观为特征」。⁽⁴⁾这个概念描述该地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与经济行为模式如企业组织模式的互动是持续稳定的：价值观解释了经济行为模式形成的原因，但经济因素的市场影响本身也得到承认。

然而，不管是基督教教会还是工商界，对基督徒企业家及其企业（经营）的影响，都未达到持续稳定的程度，更没有在其所在地域形成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所以，我们并不将工商团契定位为经济文化现象，由此也不使用经济文化概念作为分析工商团契现象的工具。

我们认为，工商团契是一种宗教现象：其本身是中国基督教发展带来的产物。中国基督教在 2000 年代得到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一批批企业家或工商界人士信基督进教会、创立或加入工商团契。所以，工商团契与教会及其神学的关系在现实中是怎样的，是本课题贯穿始终的问题。

本项研究选定北京市工商团契为调研对象。笔者了解到该市的十二个工商团契，采用的调研方法首先是田野观察：参加十九次基督徒企业家主导的活动，包括八个工商团契的十一次活动，⁽⁵⁾基督徒企业家的四次工商管理培训，两个基督徒企业的内部会议各一次，另外还有两次基督徒企业家策划的「资本沙龙」。其次，笔者对十五位人士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其中包括九位企业家，其中八位都创建或较深参与工商团契；三位牧师，其中一位牧师和一位长老（负责教会行政管理者）分别创建工商团契；一位经常参加工商团契活动的学者；基督徒企业家工商管理培训机构的一位负责人。除此之外，笔者还收集了各个团契各种活动的新闻、活动记录及相关评论。

二、中国工商团契的兴起

工商团契，也称企业家团契，参加这类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基督徒企业家或商人，也包括企业管理人员、企业培训师、会计师、律师等工商界人士。不管是否属于特定教会、是否定期活动，只要是呈现一定组织形态的存在，活动时使用「工商团契」或「企业家团契」名称，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1、孕育期（1980–2000年）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截至2001年底，民营企业数量达到202万户，出资人达到461万人；1978至1999年，民营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从0.2%上升到33%。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证明民营经济日趋重要的地位。

上述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造就出为人瞩目的企业家阶层。1980年代改革开放,一批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人士投身于创业浪潮,是谓第一代企业家。1990年代初尤其是1992年,标志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创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出台后,一批体制内人士「下海」经商,被称为「92派企业家」。1998年前后,随着国企改革、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及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改制与海归派」企业家出现。^{〈6〉}

改革开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自1949年以来的最佳时机。以各种名义进入内地的宣教机构或宣教士,各国尤其是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从事各种职业的基督徒,在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交流等领域,通过在各自职业领域如外交、学术研究、企业或公司管理中与中国人的交往,使中国专业人士接触到基督教、成为基督徒的事例比比皆是,甚至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这是以知识分子背景、以专业人士为主体之中国城市教会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商界人士或企业家,正是上述专业人士之一。

1980至2000年的二十年,也是中国大中城市大学教育从恢复到发展的阶段:一批批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国企或工商界工作,随着市场经济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这批精英与港澳台尤其是西方国家企业(管理人员)开始建立各种联系。耐人寻味的是,1980年代末,大中城市大批大学生信主进入教会。二十年后,这批基督徒成为企业家、牧师或学者。他们的生活环境、知识背景和职业经历都为工商界人士接触和了解基督教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

另外,孕育工商团契出现的内在因素则是:中国人或企业家价值体系的转变。中国企业家普遍存在身份焦虑感:商人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引发企业家思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商人的地位以及商人与政府的关系。例如王石认为这种身份焦虑就是「不确信,没有安全感」。^{〈7〉}正如王石为寻找身份定位,从「无神论者」到「科学论者」再作为「不可知论者」研究宗教,^{〈8〉}

众多把目光投向基督教的企业家都经历了同样或类似的心理轨迹。

2、萌发期（2000–2010年）

2003年北京市第一个CEO团契出现。2004年，广州工商团契成立。同年浙江温州第一个工商团契开始筹备，2005年成立（三年后，华福基金会在该团契基础上建立）。

2000至2010年十年间，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多个沿海城市纷纷建立工商团契，即使河南和山西等内陆省份的个别城市也出现了这种基督徒商人的结社组织（见下表）。期间，即2009年5月，中国第一份关注商界与基督教信仰的杂志出现，曾先后使用《基督徒企业家》、《商界基督徒》名称，现更名为《新商道》，至今已出刊十七期。

内地工商团契的萌发（2000–2010年）

年份	月份	省份	工商团契名称
2003		北京	CEO团契
2004		广东	广州工商团契
2005		浙江	温州工商团契
2006	1月	广东	基督教深圳堂工商团契
	2月	福建	厦门工商团契
2007	11月	广东	广州协和神学院协和堂工商团契
2008		福建	罗源真光堂商人团契
		福建	泉州市区工商界基督徒团契

2009	3月	浙江	杭州市工商团契
	7月	浙江	温州苍南县「管家基督徒工商团契」
	8月	广东	东莞莞城福音堂迦勒工商团契
	11月	河南	洛阳市宜阳工商团契
	12月	广东	广州133团契
2010	4月	山西	太原市基督教堂工商团契
	6月	福建	福州基督徒工商团契
	11月	福建	泉州石狮基督徒工商团契

3、发展期（2010年至今）

工商团契之所以更多在沿海省市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海外基督徒商人组织，如香港工商基督徒协会（CBMC）、国际福音全备商人团契和「冠冕理财事工」，与沿海基督徒工商界人士的交往增多。前者推动后者或者后者自发效仿成立工商团契。香港工商基督徒协会在2010年11月的「世界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邀请中国内地近120位工商界基督徒领袖参会。这是内地工商团契经历了十年萌发期，转向发展阶段的分水岭。

2011年，宁波象山以勒工商团契（10月）、海南工商团契（11月）成立；2012年，河南商丘市工商团契（3月）、北京磐石商人团契（6月）、湖北工商团契、山东临沂工商团契、丰台堂工商团契成立；2013年，三桥（青岛）基督徒工商团契在海外「三桥工商团契」支持下成立。而苏州一市就出现四个工商团契：苏州独墅湖基督教堂工商团契、苏州使徒堂工商团契、苏州亚伯兰工商团契、苏州狮子堂工商团契。四川成都教会工商团契、陕西宝鸡基督教活泉教会工商团契也在该期间内出现。沈阳圣商学院也于这段期间在北京、湖北武汉、江西景德镇、韩国首尔开设基督徒企业家培训

班。就连乡镇也出现了工商团契，如浙江绍兴柯桥镇教会工商团契于2013年成立。

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深圳工商团契于2013年在民政局登记为「深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工商分会」。这是基督徒工商团契第一次在民政部门通过登记在法律上获得法人地位，尽管登记时未使用「工商团契」名称。之所以出现这种突破，不仅因为深圳的开放环境，更重要的是政府将工商团契定位于经济领域的结社和其隶属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关系。

2014年，一个全省规模跨教会的基督徒企业家团契——河南省基督徒企业家团契成立。该团契采用了多样化并成系统的活动方式：如作为发起者的牧师每天使用微信牧养团契成员、每月举行一次区域聚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全省聚会；同时，作为成员的企业家，每周仍在各自教会参加礼拜和团契。

由此可见，工商团契在全国的发展呈现为一种从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延伸，从大中城市向小城市、县城直至乡镇延伸的地域性格局；并且，各地工商团契开始了更多的联络和联合。

三、北京的工商团契

我们选择北京市作为本项研究工商团契的调查地。

因为北京市的政治地位，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是，对三自系统开放和扶持，对家庭教会则是在默认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下，一方面在不同阶段限制不同家庭教会的规模及影响，另一方面则警惕其对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的参与。

由于教会与团契的关系不仅影响着团契的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和持续

期间，而且决定了基督教神学（教义）对企业家生活、职业伦理产生影响的模式及程度，因此，我们从团契与教会关系的角度，将我们了解的工商团契分成四类：完全独立于教会、跨教会但负责人稳定在某教会、团契不属于教会但其成员都在同一教会、团契从组织到成员全部属同一个教会。

1. 负责人不属任何教会的 A 团契⁽⁹⁾

工商团契 A 于 2011 年成立，其前身可说是一个「弟兄会」。「弟兄」是基督教内对男性基督徒的称呼。该团契及前身「弟兄会」一直在其负责人苏先生家中聚会。苏先生是某上市公司副总，1991 年开始经商，2004 年成为基督徒。他在主持聚会时强调「这个宗那个派不重要。为什么大家愿意来这个团契？因为这里有爱。」他自己也不在特定教会聚会。很明显，A 团契不仅不归属任何教会，而且其领袖人物的理念也不倾向「团契应属于特定教会」。

1.1. 组织结构

A 团契并没有正式的、公开的章程说明其组织结构。所以，其组织结构无法一目了然。苏先生在主持时使用了「团队」一词来描述该团契核心成员，这些成员可以从聚会中观察出来：每个主日（即周日）下午聚会第一个阶段即「敬拜」时，站立唱诗的 7 人（包括苏先生夫妇）都是团队成员。其中一位男性是企业培训师，一位女性（被苏先生称作团契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过中国经济领域重要的国际谈判。根据对聚会整个过程的观察，可以看到该团契是以苏先生为主、其他六人辅助的团队模式来运作的。

负责人苏先生在主持时提及别人形容他「太独」，他也说自己「挑教会

时」，能从牧师的脸上看出牧师的生命。在查经时，苏先生为了论证宗派的不重要而提起马丁·路德，认为其作为改革宗的创始人还「招妓」；这导致现场其团队成员不得不提醒苏先生将关于1960年代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传闻，张冠李戴说成是16世纪掀起宗教改革序幕的马丁·路德所为。可见，苏先生对教会及牧师的态度，应该是该团契不属于任何教会的重要原因。

就成员身份而言，参与A团契聚会的有企业高管、企业法务人员、培训师、税务会计师、私立学校校长、婚姻咨询师、大学教师、导演等。核心成员为前述的团队7人，其中有两对夫妇（包括苏先生夫妇）。除此之外，还有10多位是经常参加活动的。所以，A团契稳定成员人数应该是20位左右。

1.2. 章程与目标

该团契没有章程，但其目标可以说是围绕家庭婚姻，或者说要在婚姻中活出上帝的爱。由此，该团契邀请了全国著名的基督徒婚姻辅导专家及其妻子参加每个主日下午的活动，并在2014年建立了「婚姻加油站」。

1.3. 活动形式

A团契的活动形式基本集中在每主日（周日）下午的五点到七点。第一阶段是敬拜：团队成员之一带领大家唱诗、祷告，敬拜上帝。第二阶段是查考圣经经文，稳定参与的成员轮流带领大家读经、解释并讨论经文含义。一般在七点结束后，大家在苏先生家聚餐：菜肴由雇请的小时工做好，大家一边吃饭，一边三五成群地交流和讨论。

该团契负责人苏先生没有稳定在任何教会，常到当地三自教堂的工商团契，向基督徒企业家分享其信主经历；也参加外地公开的企业家论坛，讲述其信仰对职业的影响及如何把圣经原则应用在商业领域。不过，该团契成员中的企业培训师夫妇，还有多数稳定成员都有家庭教会背景。2013年，家庭教会背景的某基督教书店的一位副总，被外省地方政府施以不实指控受审入狱；书店也被当地政府以各种检查形式施加压力，该书店被迫关闭当地一家分店，并以折扣的形式售书。A 团契成员组织起来，到该书店购书几万元以给予支持。

2. 负责人稳定在某教会的 B 团契⁽¹⁰⁾

B 团契于 2013 年 10 月创建，其负责人孙先生信主前经营过贸易、工业和互联网等方面生意，现从事培训及中小企业投资业务，其妻子、孩子及父母都信仰基督教。孙先生在 2005 年信主后，「委身」在 B 家庭教会十年，他在 B 教会曾担任周间查经小组组长，并参加过教会组织的神学学习，非常尊重牧师，维护牧师形象。

2.1. 组织结构

B 团契不属于任何特定教会，它由孙先生和几位「同工」（一位经营房地产的企业家及三、四位协助者）组成的团队一起负责。每周三晚的聚会场地是那位房地产企业家公司的办公场地，平常是其妻子所在公司；而另外一位企业家邵先生在团契内是「协助者」身份，但也与孙先生一起参加某资本运作培训公司内的「资本沙龙」。但从日常活动来看，该团契同工有：孙先生夫妇、邵先生夫妇、场地提供者夫妇、牧师及师母、专门司琴、专

门带敬拜者等共 10 人左右。

参加该团契活动基本在 20 至 30 人左右，稳定参加者十人左右。孙先生曾说「现在每周活动的稳定成员是二三十人。」参加者有咨询公司、房地产公司、房地产销售公司、培训机构的老板，还有经纪人及全职在教会服事者。另外，提供场地的公司至少两位职员是基督徒，晚上聚会基本都会参加。孙先生和邵先生两个家庭基本都参加团契活动，两位也都是「资本沙龙」的策划或推动者。基于上述观察，笔者认为该团契是以「合伙型同工」模式运作。

2.2. 章程和目标

B 团契没有章程，孙先生提到其创立目标是针对中小企业家及职场人士传福音，并「支持宣教和牧者」。之所以支持牧者，是因为在教会全职服事者尤其是牧师生活收入尚低，基督徒企业家希望联合起来在资金上帮助牧者。

2.3. 活动形式

B 团契刚创立时即 2013 年底，就在圣诞节办了一次活动，有 180 人左右参加，在那次大规模活动现场，就有人听到福音后立即皈信，所以孙先生一提起这次活动就很兴奋。B 团契的常规活动是每周一次，每月单数周外请牧师讲道，双数周是孙先生带查经。

笔者参加的那次讲道，由牧师分享圣经新约全书的《约翰福音》13:36-38；18:27，主题是「认识耶稣」。该牧师讲道中提到：做企业的人，应该知道赐福者是谁？跟随耶稣，不仅仅是吃饱肚子，不仅仅是求赐福，更重要的是认识耶稣。耶稣是王，耶稣是创造主。该牧师提及自己以前也

是做企业的,知道做企业的难处,因此做企业的比做其他工作都要努力工作。

双周的查经由孙先生带领,采用的是一本香港教材,主题是「个人成长:委身」。研经目标是:探讨领袖的身份、核心价值观,帮助企业家更新个人的生命。主题按五天分为五个部分,配有标题、经文及「领导反思」概要。参加者被要求在接下来五天内查考上述经文,并在两周内分享查经时学习到的内容。

3. 成员属于 C 教会但却独立于教会的 C 团契⁽¹¹⁾

工商团契 C 团契在 2010 年 3 至 4 月间成立,发起人都是 C 教会的成员,创立团契得到了教会主任牧师的同意及支持。该教会经历了「去团契化」时代,一些团契例如由海归成员组成的「尼希米团契」,就从最初附属于教会转为独立于教会的团契,C 团契也是如此。由于该教会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导致失去稳定聚会的场所,C 团契的稳定活动模式一度中断。

3.1. 组织结构:分工模式

该团契由 C 教会长老策划创建,另外五位发起人都是他沟通后参与的,所以当时他是灵魂人物。其他五位发起人分别负责管钱、管账、外联、祷告等事项。最初的聚会场地及日常用品都由其中一位发起人提供。后来,该教会与当地政府的矛盾以及其他原因,该长老活动受限,2013 年离开中国去国外神学院读书,一位发起人也移民国外,所以只有四人再继续维持团契活动。

该长老曾在高校任教,其他五位(两位女性)发起人都是企业家。最初参与者二十人左右,男女各占一半。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是在 2010 年,参加者有 40 至 50 人左右,来自不同的家庭教会。

2014年草拟的章程确定，参加对象以C教会的创业者为主，邀请企业高管、专业人士、牧者及外教会成员参与。加入条件如下：为了团契成员之间建立稳固的关系，新人必须有成员推荐，交由议事会审核，三分之二通过即可加入。

3.2. 章程与目标

C团契成立初期支持宣教，后来由于奉献给洛桑会议筹委会的金额有部分余款，因而成立了基金，用于支持一个助学项目。2014年9月，为了有利于团契发展，活动规范有序，C团契开始制定章程。第一稿确定其宗旨是为创业者、高管、专业人士的基督徒提供一个沟通、交流学习的平台，帮助创业者成功按照圣经原则经营企业，促进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动大使命的完成。

该章程草稿还设定了两个内部机构：议事会和秘书部。议事会是以异象和使命为导向进行宏观决策、监督事工的运营，处理重大事件和危机，协调处理外部关系，是团契的最高决策机构。秘书部则负责建立并更新团契成员及服事群体数据库，负责事工活动的宣传、联络、跟进等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以电话、微信、邮件等方式关怀、扶持目标群体，落实每次聚会日程安排。

3.3 活动形式

2010年，也就是C团契创建当年，几乎每月举办一次活动：按需要设定主题，邀请讲员，租用酒店或饭店场地；活动方式及程序是传统的敬拜、讲员分享、大家讨论及用餐。活动是开放性的，不限于其教会，对参与者没

有设定企业规模、年收入的要求。参与人数一般是 20 至 30 人左右，最多时达到 50 人左右⁽¹²⁾。

2011 年教会与政府产生矛盾后，该团契活动不再正常，几乎只是每年一次或偶尔的聚会。2012 年春节前一次聚会有 11 至 12 人。同年，一位美国企业管理方面的人士与企业家交流聚会，大约有 15 人参加。2013 年春节前有一次聚会，12 人参加，其中 8 人是 C 教会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团契从 2014 年 9 月开始预备恢复每月一次的稳定聚会。章程初稿提到：「暂定每月聚一次，每次有不同成员带领主题查经、敬拜主持，让成员都参与团契的服事，培养、造就时代门徒。」由于稳定成员工作忙碌或节假日等原因，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 月、3 月各聚会一次，也就是说每两月聚会一次，稳定参加成员 8 人左右，2015 年 1 月的聚会有 11 人，第一次参加活动者有 3 人，全部都是其教会成员。聚会形式仍旧是最初的敬拜和查经相结合的模式。在聚会交流中，因为成员推荐，多人购买《圣经·领导力版》。

4. 属于某个教会的 D 团契⁽¹³⁾

D 团契的全体成员都是 D 教会信徒，而且由 D 教会牧师或同工负责牧养事务。据了解，北京三个区的三自教堂在 2012 至 2014 年都成立了工商团契，D 团契并不是最早的，其成立源于 D 教会 2011 年的拓展事工计划，当时该教会建立了三个团契，另外两个是夫妇团契和残疾人团契。

4.1. 组织结构：走向正规化

2012 年 D 教会牧师筹备团契时，邀请了教会三位工商界人士于 4 月

组建弟兄团契，不接受女性加入。2013年D团契到东北某市三自工商团契参观访问后，大家热情高涨，开始筹建理事会，商议选出七位弟兄，条件是愿意奉献时间和金钱服事团契。然后再由七位推选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再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推选八个人。七位理事是当然的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的职能就是执行理事会的决策。理事会是决策机构，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日常决策模式就是每周一次理事会聚会，提前商谈，根据事工，理事长提出来，其他理事发表意见并去完善，达成共识后，由他们来实施具体的工作。每周一次决定周四的安排。教会的牧师是顾问，安排每周四晚讲道或分享的讲员，对其他事务只是把关，从信仰方面去引导。

由于有人借参加团契为名行传销之实，牧师开始考虑成立认证组考察参与者经营场所或企业。2014年下半年筹备认证组，其成员由理事会成员担任，常务委员配合来实施认证工作。之前已经有的策划组、信息组、赞美组、祷告组、新人接待组，由常务委员会领导。

团契成员基本都是信徒。第一次活动时 有 70 至 80 人，后来人员慢慢流失，只剩下 30 至 40 人；成员大都是个体户和微小企业家，经营大企业的并不多。2013年1月团契成员分成企业家、个体户、职场创业者三组，6月创业组改为企业管理组，成员主要是部门经理、企业主管和高管。

据牧师说：「抱着功利心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希望认识生意伙伴或认识更多的人脉，当有些人发现达不到此目的时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工商团契也是在不断地淘汰。」

4.2. 章程与目标

2012年4月刚成立时，D团契目标是：集合教会现有工商界信徒，实现团契内资源整合与共享；关注对工商界信徒的牧养，促进团契内基督徒

灵命成长；教导基督徒商人遵循圣经原则的商业道德，建立基督教商业伦理；推动职场呼召、服事，实践福音使命，努力开拓福音事工。2013 年章程仍旧保持上述四个目标。

4.3. 活动形式

最初团契确定两种活动模式：一是常规聚会，在每周四晚七时半至九时半，内容包括赞美、分享、见证和交通。二是定期的专题特会和培训，主题基本是企业经营管理、领导力、基督徒理财等方面。

周四晚六时半开始，但是该教堂里面主堂门口五时半就已经有穿统一服装的弟兄在准备茶水；五时四十五分，就已有一位弟兄在门口接待。主堂里有五、六位弟兄姊妹在练唱诗。门口靠里放着诗歌本，诗歌本封皮上印有「诗歌集」，下是「北京基督教 D 堂工商团契」字样。陆陆续续来的人男女分开坐，男性大概 40 人，女性大概 60 至 70 人，共 100 人以上。有的是一家都过来参加活动。开始时七位信徒站到台前，带领敬拜、唱诗，大家每三、四个一起，为各自的事情祷告。七时左右敬拜结束，由牧师或请来的嘉宾讲道。讲道结束后，大家分组一起祷告。

2012 年 8 月，该团契 20 多位成员到郊外参加退修会，经过学习、祷告和讨论，确立了活动初步模式：周四晚常规聚会敬拜后，邀请同是基督徒的企业培训师、理财顾问基于圣经分享企业经营和理财主题，如「经商有道」、「职场凝聚力培训」、「理财有道」等。团契凝聚力由此增强。

由于讲题安排不系统，而且企业培训的「高大上」导向与成员多数为小企业家不搭调，更重要的是该教会的牧师发现：「大家在信仰上还不是特别地清楚，比如认识上帝、创造、罪，甚至有的还不会祷告」，2013 年退修会后，团契决定调整重点：从成立当年注重所谓的圣经管理，转向重视

基督徒生命的建造。聚会内容按季度来安排：在一个季度中，每个月会固定的举行两次圣经学习；另外，每个季度会有一次职场信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方面的信息；每个季度还有一次祷告会、见证会和交通会。牧师特别提到：

「我把讲台牧养这一块接过来，七月份第一周我教导大家认识圣经，引导大家读圣经，引起大家的重视，让大家读圣经。这周可能有另一位同工会讲如何祷告，操练祷告。我们每个月两周讲基本信仰：神如何创造、救赎、得救、重生这方面的基本要道，我设计了十二次课，到今年年底，系统的、基本信仰的脉络告诉大家，让大家对自己的信仰有个清楚的认识。」

2013年D团契成立一周年，举办感恩餐会，将近350人参会，其中包括受邀的非基督徒、基督徒乐队和基督徒企业家。在牧师和基督徒企业家分享后，受邀而来的二十多位人士现场决定相信耶稣基督。

在2013年工商团契新春赞美会上，牧师宣布2013年计划，强调首先要建立的是生命：「先将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再在社会上荣神益人：即工商团契要更多参与公益活动以回报社会。团契章程在使命上提到「弘扬基督博爱精神服务社会」。团契目标在2013年已经清晰，在2014年得以具体实施：2013年12月资助神学院贫困生，2014年1月探访孤儿院，组织关心教会的残疾人，到附近医院与病友聚餐，邀请其游玩。同时，因为发现成员尽管企业或事业比较成功，但对家庭配偶和孩子非常缺乏关爱，所以团契办了一个亲子营活动：各个家庭一起到郊外有三天的共同生活，有灵修、读经、分享，并安排了一些游戏节目，让父母更多的陪伴和关爱孩子。

四、组织网络中的工商团契

在了解北京市工商团契的过程中，与工商团契有着各种关系的各种组

织 — 教会、家庭、企业、非营利组织及政府部门，进入了本研究关注的范围。因为我们不仅可以在工商团契与上述五种组织建立的关系网中勘察工商团契的成立原因、发展模式及将来走向，而且在这个网络中，基督徒企业家及其家人、教会牧师、非营利组织工作者、政府官员、企业员工等不同身份定位的价值观与基督徒企业家信仰、职业伦理的互动或碰撞关系，有助于理解基督徒企业家的精神结构。

1. 教会与工商团契

1.1 教会孕育团契

在团契活动中，经常听得到「教会」一词及教会方面的消息。教会对团契建立、使命及活动模式、内容产生怎样的影响，是这里考察的主题。

教义指示的「大使命」和基于信仰的「呼召」

「大使命」：圣经新约全书多处提到耶稣在复活后升天前告知其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是每位基督徒必须践行的大使命，即传福音。宣教或传教便由此而来。在笔者接触到的工商团契基督徒中间，有一位企业家和一位高管成为基督徒后为「大使命」放弃经商，成为牧师服事教会；还有一位企业家建立了工商团契并到国外从事宣教工作。

「大使命」也成为基督徒企业家创建工商团契的目的之一。工商团契每周定期聚会，尤其是圣诞节或年底举办大型活动，邀请合作伙伴、同事或家属参加，传福音就是其中一个目的。集合企业家财力或其他资源，为从事宣教工作的宣教士和经济贫困的教会神职人员提供资助，正是基于大使命而延伸成为工商团契的一个具体使命。B 团契负责人孙先生提及建立该

团契目的之一就是支持宣教；该团契牧师在讲道中明确鼓励说：「中国人二百年来一直接受别国（宣教士）的帮助，现在应该去帮助其他国家了。」支持宣教也可说是 C 团契 2012 年成立时的唯一目的，2014 年章程草稿表明其成立宗旨之一就是「推动大使命的完成」；D 团契 2013 年修改的章程提到其宗旨之一是「在本区工商界开展福音和牧养事工」，并具有「推动职场服事的福音使命」。

「呼召」：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的暴露，经济伦理和道德重建引起社会各阶层关注，宗教信仰与（商人）经济伦理关系也成为思考主题之一。基督徒这个新身份，基于圣经赋予的世界观，使企业家期待成为新型企业家。在「呼召」观念中，只要基督徒企业家按照圣经教导经营企业，并以荣耀神为唯一目标，经商或商人这份职业不再被看作世俗的，而与神职等同。由此，源自新教改革宗神学的呼召观引起了基督徒企业家职业伦理观念的改变。在这种变革中，基督徒企业家希望建立一个基督徒企业家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企业家寻求在世俗商界和政商关系中建造信任、安全感和友谊，而且探索如何根据信仰确立企业经营方向、塑造企业（管理体系），生产荣神益人的产品，革新市场秩序。简言之，寻求和建构一种新的身份、新的目标、新的秩序和新的使命，是工商团契成立的动力之一。

组织核心

工商团契创建者或核心成员，基本都是教会成员，甚至是教会精英，如查经小组长、长老或牧师。笔者在调研中所访谈的四位牧师，一位是从小信主，神学院毕业后到教会服事；另三位都是高校本科毕业后成为基督徒，其中两位分别是北大和清华毕业。四位牧师都直接或间接支持教会对工商团契的定位或运作。

即使 A 团契负责人不属于任何教会，但他曾经去过教会，其团队企业培训师曾是某教会长老，现在另一教会定期讲道；稳定参加者也多是主日上午在教会敬拜听道后，再于下午到该团契活动。B 团契负责人不仅曾在家中带领其教会小组查经，还参加教会组织的短期神学学习，而且该团契最初活动地点就在其教会某个聚会场所。C 团契就是由教会长老策动，所有发起人都在该教会内；经历了教会与政府冲突后，现在团契参加者限于本教会成员。D 团契从发起、建立到活动整个都是在教会内部，从领导（机构）、活动场所和财务都属于该教会。教会牧师亲自创立该团契，以顾问身份把握团契与教会关系，并设计和安排每周聚会讲台课程。

活动模式及仪式

工商团契活动模式基本来自教会，尤其是程序和仪式。团契活动程序包括敬拜（唱诗和祷告）、查经（或讲道、主题学习）、每人轮流分享心得及需要祷告的事项，最后祷告或以「主祷文」结束。这种程序基本就是教会周间查经小组和主日崇拜程序的综合：一般查经小组没有上述程序的讲道环节；主日一般没有每人分享心得及代祷事项的环节。

工商团契组织者采用这种效仿教会的活动模式，不仅表明他们是在教会中学习、熟悉并习惯了这种基督教的活动模式，而且显示他们的意图：一方面向工商界基督徒表明团契认同并采用这种教会的活动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对第一次参加团契的非基督徒介绍这种作为福音载体的活动模式。

在 A 团契，主日下午的活动流程包括敬拜唱诗和查考圣经。第二次到该团契来的一位二十多岁已婚女士就称：「觉得这里很光明很温暖」。一位从事经纪工作的四十多岁女士，第一次到 B 团契从圣经学习何为「委身」后分享道：「第一次来团契，觉得很温馨，很喜欢来这。」C 团契从 2010 年创立初期安排敬拜、讲道或分享的活动模式，后来由于教会与政府矛盾，

转为不定期聚餐，到2014年再重新举行每月一次的敬拜和查经活动。D团契则逢周四晚上在教堂内举行活动，专门小组带领敬拜，牧师安排之后的见证分享，最后是分组祷告。该团契经过了2013年的调整及2014的具体实施，确立主要方向为鼓励团契成员读圣经和操练祷告，让团契活动更多以圣经经文为中心，并以祷告仪式活动来建造基督徒的宗教生活。

1.2. 团契辅助教会

金钱支持

基督徒按照圣经教导每月要将其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全职在教会服事者（如牧师）的工资和所有活动经费（如聚会场地租金、圣诞节晚会费用），都来自基督徒的奉献。

同时，信徒中经商者在十分之一以外奉献的金额对教会格外重要。教会越小、教会发展（如购买写字楼作为教产）、或教会开展各种活动，需要更多经费时，基督徒工商界人士以奉献金钱来支持的空间就越大。一方面是教会发展需要金钱；另一方面，企业家或工商人士相对其他职业人士更为富裕，所以，当教会工商界信徒以团契方式聚集共同活动，以金钱来支持教会发展或宣教，就自然而然成为团契目标或使命之一。如B团契成立使命之一就是支持宣教或贫困牧者，启发C团契创建的原因就与基督徒企业家在金钱上对教会活动的支持有关，D团契捐助其教会残疾人士、看望附近医院病友，都表明工商团契成员使用金钱对教会各种活动给予了支持。

职场传福音：传福音网络的开辟

在所有的工商团契活动中，我们都看到其稳定成员将没有到过教会、

没有听过福音的合作伙伴、同事引进来，一同唱诗、互相介绍、共同分享，尤其是为他们家庭和生意遇到的困难祷告。在 A、B 和 C 团契活动或材料中，我们都发现有人因为参加团契、听到福音、并相信耶稣基督是其救主，开始稳定参加团契或进入教会。借助工商团契组建的工商界网络和团契活动使工商界人士听到福音，这是基督教传教模式和传教网络的一个新变化。这将使得工商团契成为「基督徒企业家的摇篮」。

1.3. 教会与团契间的张力

在教会内设立还是跨教会？

工商团契成立目的之一是实践圣经中的大使命，但工商团契只对工商界人士传福音。由于传教的教义来自教会，但传教对象却又限于工商界，因而教会与团契出现了张力。有牧师认为，这种选择与教会向任何人传福音并接纳任何人有冲突。另外，教会内以企业家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作为加入团契的门槛，会造成教会内的等级区分，所以反对在教会内设立工商团契。如 C 教会的一位牧师就认为：

「跨教会的工商团契最好。因为工商团契肯定有它的目标人群，如果教会的目标人群，不是以生理年龄、具体兴趣或侍奉划分的话，这种特定的团契划分肯定是有问题的。我理解的工商团契，肯定是在经济上高于社会一般人，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大财团或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总之个人收入高，才有资格参与团契。那我就不知道，教会的高收入者，成立一个团契，它的必要性在哪？」⁽¹⁴⁾

类似看法的确也在 B 教会主任牧师那里出现 — 据该教会原信徒转述了牧师不在教会内成立工商团契的理由：

『就不应该有「企业家团契」这么个说法。就不该有这么个组织存在。』

为什么有「企业家团契」呀？按〔这个〕理说，就有「钟点工团契」、「保姆团契」。把企业家单拿出来，他们凭什么好像就觉得比人高人一等的感觉似的，他觉得是不是企业家觉得比人有钱怎么着的，单拿出来，低层的基层的比如小时工、保姆，也就应有个团契？」^{〔15〕}

不过，同样在 B 教会的 B 团契发起人孙先生提到：牧师并不反对他办工商团契，所以他认为「不反对就是支持了」。而且，该团契最初在 B 教会一个聚会场所活动，但因活动结束后成员在那里谈论商业事项，引起争议而更换场地。^{〔16〕}

对于上述牧师对教会内不设工商团契的态度，D 教会的牧师认为：「其实这是对工商团契的误解，工商团契也需要牧养，他们在职场上更需要教会将圣经的真理运用在工作中。」^{〔17〕}他提到，工商团契的成员谈生意合作确实会给教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他理解基督徒企业家为了面对共同挑战而组织起来的做法，他说：

「牧者只是在生命成长牧养上帮助个人生命成长，给一些指导和建议。……但在专业上，我们做不到。牧师做不到这些，牧师只能是扶持他，陪伴他个人生命的成长，通过圣经安慰他鼓励他。为他祷告，陪伴他走过这段路程。但是如果认为牧师做不到，我们就必须成立另外一个机构，我觉得这个二者间也并不矛盾，需要搭配来服事。研究这些方面是帮助他按照圣经更好管理这些企业，牧者起到的作用就是牧养他的生命。不能单独强调这一点忽略另一点。」^{〔18〕}

竞争关系

部分基督徒企业家认为教会牧师由于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仅仅用圣经经文或祷告无法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或无法给予其实际的帮助。所以他们更多或渐渐期望工商团契能够实现这个目的。与教会其他群体相比，

基督徒企业家相对优秀的综合能力、较高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更加厚实经济条件，导致这个群体与教会领导层尤其是主任牧师关系的两面性：平时是支持和协助，如果产生分歧就可能产生较大的矛盾甚至分离。一旦教会反对企业家团契，上述两面性，就在工商团契问题上表现出来。

B 教会一位企业家表达了下述看法：

「教会很多人就很不平衡，你让我每月奉献那么多，我企业经营遇到问题的时候，教会又不给我解决，所以他心理有落差呀！就会让我们奉献，奉献就找到我们，干活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找到我们……」⁽¹⁹⁾

另一位换了教会的企业家说：

「我为什么要换教会？要委身教会，我也经常劝别人委身教会，不能随便换教会。就是因为教会这方面营养够了，但那方面不够。原教会在真理的根基方面对初信徒特别好，如果你是初信的，就特别好，去那没问题。小孩刚开始特别要喝奶，但是你十六岁了你肯定要吃主食了。我的问题是职场遇到的问题呀，教会解决不了，它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它给不了，而且有时它也不闻不问。我肯定要换一家呀。」

这位企业家还认为，B 教会牧师反对教会企业家在教会内成立团契更深的原因是：

「这种工商团契慢慢与教会会有冲突，就怕这种团契慢慢、咋的一下独立了，自己成立做教会了，他怕这样。原因可能是企业家是教会主要的奉献来源，这帮企业家都很优秀呀。」

但是 B 团契负责人认为，B 教会牧师应该只是反对在教会内成立工商团契，教会对基督徒企业家与其他职业基督徒应该同等，避免因其金钱奉献多而给予特殊待遇。

关于奉献，C 教会牧师更深刻表达了看法：他认为：「奉献乃是他上帝面前的心志，即使奉献得多也不意味着他在教会的地位特殊。」同教会的

一位商人也认为：

「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寡妇的三两个小钱，神也是特别看重的。我觉得你能够更多的奉献应该是感恩的，因为神给你的多，你才能奉献得更多。我非常认同冠冕理财的观点：所有的都是神给你的。」

对于牧养的问题，该牧师说：

「对这个职业可能有了解不够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个职业面临的属灵挑战有了解不够的地方。这个要区分开。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作地质勘探，我确实不了解他们具体行业的，例如出差呀等等，但不管任何一个职业，它所面临的属灵挑战都有共性。比如说不能撒谎、工作中尽心竭力、不能行贿、也不能受贿，在工作中不能使用一些不合适的手段获取职位、利益等等。我觉得这是具有共性的。或许对他这个场景有特定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有单独的一对一面谈，或许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每个行业有各自的特点，但不需要有这个行业就要配一个针对这个行业的牧师。」^{〈20〉}

另一位企业家认为：

「牧师对企业的了解肯定很有限，但是牧师能够倾听，能够感同身受为你祷告，其实这就足够了。有很多问题，就是必须自己去面对。」^{〈21〉}

上述种种看法至少表明，教会内的基督徒企业家群体与教会关系，可能存在两种模式：一是始终支持和辅助教会，发挥向心力作用；第二种则是以教会对其的支持为标准来衡量其对教会的支持力度，一旦教会无法支持、或不给予企业家特殊待遇或反对企业家团契，该群体就另换教会或创立工商团契。

就全国范围而言，的确有工商团契转换为教会或基督徒企业家在其企业内办教会的事例，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工商团契与教会的竞争，但更重要的是不同观念或思维模式的竞争：经济奉献是否决定教会牧养投入、牧师辅导是否解决现实职业困难。

2. 家庭与工商团契：良性循环

家庭婚姻是工商团契关注的重点之一。基督教信仰对企业家个人认知观的改变，延伸到其家庭观或婚姻观的转变。这种转变给企业家带来建立工商团契以分享和传播这种认知和经验的动力。

A 团契的建立和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最初是弟兄会，只查考圣经教导弟兄应该做什么。2004 年自称「被神意外拣选」的企业家苏先生，2011 年将弟兄会转为工商团契，同样在自己家中活动。该团契的核心人员可以家庭夫妇的方式参与，方便成员邀请同事或朋友夫妇参加。

2014 年的第一次聚会中，参加者中有：为了挽回婚姻第二次来参加的女士、因为工商团契前身弟兄会的帮助而复婚的夫妇、去了教会而放弃离婚念头的夫妇、预备婚礼的未婚夫妇等，还有著名的婚姻辅导老师，所以团契分享重点自然而然的是家庭婚姻关系。苏先生介绍自己的经历：

『大三下学期我就开始做企业。吃喝嫖赌，无所不作。倒私车。三天四夜没离开同一张赌桌，全世界的赌场我都去过。夫妻打架，打得 110 都来了好几次。……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到神那里去。做生意、做国度企业、做婚姻家庭，方法有很多，但「枝子不能离开树」，离开了，用多少招都没用。走过这段经历，夫妻关系比以前还好，完全跟以前不是一个档次。』

苏先生的妻子现场也表达：「没想到他这么不容易，这么大的转变。」苏先生从信耶稣发现自己是罪人并依靠神，开始认识到一种崭新的婚姻观：

『上帝造婚姻干什么？婚姻里的问题是上帝对你最大的祝福。你的罪显出来，修补过程把男子锻造出来。这个团契三年，学习爱人如己。爱一个不认识的人容易，爱认识的人难，比如员工，爱天天和你睡在一起的人更难。解决这个一定得两个人更像神。从对方观点出来，神用男人造成神样子的男子……我们夫妻两年基本没有争吵。最近争吵了一次。我后来去洗手间

祷告。当我照着镜子看自己时，看到镜子里明显是撒旦的样子，吓了一跳。出去跟老婆道歉，我要像主耶稣一样。透过神看自己，如果主耶稣在这，他会怎么做？婚姻为什么是男人最大的祝福？男人被神使用作精兵，锻造出来，有盐味，是在家里被打磨出来的。企业学习管理、学习领导力那些，都不如在家里打磨出来。慢慢做、慢慢做，你就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

团契另一对夫妻分享了信主前后的婚姻。信主前丈夫提出离婚，妻子不同意；后来妻子说：「终于忍不住了，离婚吧。」当时，刚被同学带着去教会的丈夫，却不同意离婚了。妻子经老家的舅妈传福音也信主。现在丈夫说：「以前她生气，我觉得不可理喻。现在当她生气，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应该帮助她。做头的，应该做仆人式的头。」

第一次来团契的牧师对一位分享其丈夫提出离婚的女士说道：

「当婚姻出现问题，对方不忠心，首先有两个原则：先往上看，透过耶稣的爱，看神的旨意。看到十字架，流血，婚姻是个盟约。为他祷告，越为他祷告，你就越爱他。靠着主对你的爱，主会把他拉回来。」

婚姻辅导员也提到：

「当我们认为问题在对方时，我们就错了。当我们这样想，都是在抱怨神。我们都认为改变对方，就没有问题了。先是你改变，你改变把对方交托给上帝。当你们遇到事，找法院，孩子今后遇到事，就找法院；你们找律师，他今后就找律师；你们若找神，他就找神。」^{〔22〕}

辅导员现场还为那对离婚后又复婚的夫妻按手流泪祷告，声称：「很久以前就在祷告中看到过这幅景象。」该团契只要在参加者提到如夫妻矛盾、生育方面的困境，就常提议带领者或牧师或辅导员现场为此祷告。

又如 D 团契，从 2012 年成立到 2013、2014 年，其常规活动重点基本集中在企业经营领域；但从 2014 年开始调整到 2015 年实施，重点转向基督徒工商人士的生命建造。所以牧师设计了每月一次关于婚姻家庭方面

的讲道分享，并在 2014 年办了一次亲子营。工商团契报名有七八十人，都是整个家庭全体参加，因为很多做父母的「没有时间陪孩子」。这次为了陪孩子，有两位企业家把店关了，两天不经营。参加者在一起有三天的共同生活：灵修、读经、早晨有分享，并安排了一些节目和游戏。

D 教会的牧师说：

「我们中间有的弟兄个人做的很成功，但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上 可能工作太忙忽略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对儿女的关爱上很缺乏。比如一位弟兄早上起床时孩子早上学去了，晚上回来孩子已经睡了，太忙，跟孩子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孩子跟他关系有点疏远。通过在我们团契分享后，他们现在开始注重家庭，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能够引导大家。其实挣再多的钱，失去了家庭妻子失去了儿女，再用金钱弥补是很难的。」

该牧师也提及亲属对待工商团契态度的转变：

『在我们团契，有弟兄因为这个环境，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受到环境很多的影响。加入团契后，通过我们引导，在这些方面已经改变了，明显改变。我们中间有几个妻子不信主，但听说去团契，都很支持，特别愿意。我们团契的爱宴，邀请家庭一起参加，他们发现跟我们在一起挺好，就说，多去教会，到团契里参加服事。一开始说「都像你们信耶稣，去教会，喝西北风去吧」，意思是到教会影响到生意了。但他妻子跟我们参加几次活动后，就非常支持她的丈夫来参与，说跟基督徒在一起，不会出太多问题。』⁽²³⁾

我们从观察看到：基督徒企业家初步确立的圣经世界观，对自己的认知及扩展到的家庭、婚姻关系观念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以至于成为创建工商团契以传播这种信仰及其转变模式的动力。不仅夫（妻）支持工商团契的各项工作，而且人际关系尤其是工商界网络中的家庭被带入和吸引到团契中。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成为信仰的基地。简而言之，基督徒企业

家家庭，通过工商团契这个中转站，既传教又重塑家庭。家庭又成为工商团契的后盾。

3. 企业家与工商团契：市场逻辑还是基督教逻辑？

3.1. 企业家为团契提供资源

一般而言，工商团契比其他职业群体组成的团契更容易集结或建立，原因是企业家把经营管理的能力应用到了团契的筹建和运作上，可支配的资金雄厚，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办公场所经常为工商团契提供了常规活动的场地；而且，场地的各种设备包括桌椅、投影仪等为团契活动提供了各种便利。即使是家庭聚会，企业家的住宅面积也比较大，客厅足以容纳二三十人，也成为小型团契常规活动的场所。A团契和C团契都在基督徒企业家家中聚会，D团契每周活动就在一对夫妇所经营的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场所内。

由于基督徒企业家的经济实力，工商团契组织的活动也比较多样化、活动空间更大。例如，A团契在查经过程中就请一位基督徒小时工，每周周日聚会结束后，在负责人苏先生家中为三十到四十人预备晚宴。B团契则为参加每周活动者预备了盒饭，并在活动中提供各种水果。C团契最初活动一般由一位企业家提供用品，包括水果，有时活动则在比较高档的饭店，实行AA制；至今最大一次活动就是在高档酒店租用会议室，邀请台湾地区牧师讲道，参加者五六十人左右；并一直与民间组织合作资助西部地区孩子的教育。D团契组织成员资助贫困地区教会的牧师、神学院学生、孤儿院、残疾人和医院病人；尽管D团契的常规活动和大型活动都在其教堂举行，但会邀请企业咨询师分享和基督徒乐队演出，为团契成员和新来者

创造一个新颖并有吸引力的环境。上述活动要稳定、持续的开展，需要金钱的支持；而这正是企业家与其他职业群体的信徒相比的优势所在。

企业中的同事、合作伙伴，都是基督徒企业家或工商人士传福音的重要对象。在 A 团契，负责人苏先生两位同事就在该团契，其中一位因苏先生传福音信主并以苏先生为榜样。一次在 B 团契活动中，一位基督徒将其香港合作伙伴邀请来至团契；据孙先生介绍，2014 年他们的圣诞节活动有多人现场作「决志祷告」。D 团契多次活动中都有非基督徒企业家或工商人士表示归信耶稣基督。可见，企业组织网络或商业网络，不仅为工商团契提供了组织者，还因为基督徒企业家传福音的动力为工商团契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参加者。

3.2. 团契对企业家的作用

企业家合作的催化剂

不用讳言，工商团契为基督徒企业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尽管这并不是团契主要的作用。共同的信仰本身就创造了一个信任的基础。共聚一个团契，从认识到熟悉，企业家间不可避免地会就各自企业或职业领域的问题进行分享或讨论。同时，商机或合作就在这个空间出现。恰恰因为如此，也有一些人参加工商团契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这种人脉，从而获得赚钱的机会。

在调查过程中，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坦言，参与团契最深的感受就是对有共同信仰的人会更加信任。苏先生对同事传福音并邀请其参加 A 团契，不仅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而且增强了他们之间的信任。这位职位不低的同事称苏先生是「自己带路人」和「榜样」。在 B 团契，两位负责人虽经营范围不同，但都参与并支持某「资本沙龙」。D 团契关注企业家的「生

命、生活、生意」，其牧师介绍说：

「我们考虑到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助。比方说你经营这个产品，你到别人那买也是买，我到弟兄这购买你的产品，大家一起来购买你的产品，但是你要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好的质量，大家把你扶植起来的时候，你就能祝福更多的人。」

在出现以参加团契为名搞营销的现象后，团契设定规矩：一旦发现在团契为推销保险或传销纠缠信徒，第一次是牧师谈话、第二次是警告、第三次则是请自行离开。例如，D团契准备设立认证组，即，参加团契的人要上交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认证组到实际经营场所核实一致者，才能参加工商团契。

因此，不管是源于共同信仰，还是有意打造基督徒企业共同体的设想，都使得工商团契活动成为企业家从相识到合作的催化剂。

使命的革新：传福音和国度企业

基督徒企业家之所以创建或积极参与工商团契，在宗教信仰层面存在四种原因：第一，教会无法帮助解决信仰与职业伦理之间的冲突；第二，经营困境、自认职业身份的特殊以至于无法融入现有教会；第三，积聚基督徒企业家资源宣教；第四，建立职业共同体寻找以信仰为基础的职业使命。由于传福音是每位基督徒的义务或大使命，所以，第一次参加工商团契活动者自然成为传福音的对象。就增加人数、扩展规模而言，传福音也成为工商团契发展自身的工具。基督徒企业家通过工商团契的联络和联合，一方面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职业共同体，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共同寻求如何在企业经营上实践宗教信仰。

在工商团契会经常听到「基督徒企业」、「国度企业」或「天国企业」(kingdombusiness)等词。工商团契强调的「国度企业」，反对圣俗二分，

认为经营企业就是神的呼召，以企业经营来实践神要求的「大使命」。所以，国度企业「注重使命 (vocation)，注重意图 (intention)；注重关系，注重经营 (operation)」⁽²⁴⁾ 基督徒经济学家赵晓提出国度企业有三个目标：生意上追求盈利；追求更好的产品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服务人们；追求生命的目标、去拓展神的国度、去传扬福音、去更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去改变人们生命。⁽²⁵⁾ 这些提法对基督徒企业家影响之大，以至于 2013 年家庭教会专门召开首届国度企业研讨会。

在商界风靡的「领导力」，也是工商团契关注的重点。与此不同的是，团契学习如何根据圣经来形成和提升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和财务或财富管理两大层面。一般工商团契是通过基督教领导力的相关教材来学习领导力。A 团契使用的是香港教材来探讨领袖身份、核心价值观和动机，帮助企业家更新个人的生命。C 团契的成员在 2014 年底、2015 年初纷纷购买《圣经·领导力版》。D 团契最初成立时的常规活动中，经常邀请有名气的基督徒企业家、企业培训师和理财机构专家，为信徒讲授如何按照圣经经营企业、管理财务。

基督徒企业家们在工商团契开展的各种学习及交流活动，开启了这样一种转变历程：从意识到偷税漏税或行贿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到逐渐实现不偷税漏税、不行贿、善待员工、保护环境，再自然而然地转向注重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新型企业观。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工商团契与基督徒企业家的互动格局：企业家传福音的使命感，确定了团契创建宗旨，并使用其能力、人际网络和资本来设计团契的多样活动及推动活动的开展。同时，团契在「国度企业」和「圣经领导力」学习和培训上的投入，不仅为基督徒企业家身份和经营企业构建了神学上的正当性，而且在商业伦理上为基督徒经营企业提供了现实中可操作的指导。另一方面，工商团契的两种功能隐含着两种逻辑：

基于传福音的大使命，推动基督徒企业家热心邀请其职业网络中所有人参加团契，期待他们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这是福音的逻辑。然而，团契作为一个平台，基督徒企业家基于国度企业和圣经领导力的学习，基于信任、共同的商业伦理和做法，从合作走向商业联盟不无可能。这是一种新式市场秩序的逻辑。

4. 非营利组织与工商团契：推动和服务

这里所说的「非营利组织」，是指旨在联络或联合基督徒企业家，推动工商团契成立或从事基督徒企业家培训，却由于政府社团管理政策的限制而不得不以公司名义成立的组织。

4.1. 非营利组织 N⁽²⁶⁾

2007年成立的N，负责人是一位基督徒经济学家。它明确宣示以圣经为核心价值，以领导力的培训、教育和咨询为主要业务，以「通过商业、文化和教育，在各领域兴起仆人领袖，成为社会的光和盐」为使命，宣称期望该组织「筑山上之城，兴道德中国，谋万邦恩福」。

它提出三方面「事工」：思想领导力、工商领导力和教育领导力，但目前基本集中在第二项：以圣经中领导原则为基础，在中国工商领域倡导仆人领导模式。通过工商领导力论坛、国内外联合培养的领导力硕士学位课程、领导力证书课程、各种企业家海外游学和管理培训课程，帮助企业家和职业人士提升自身领导力，帮助企业 and 机构提高内部团队领导力和外部市场领导力。

上述工商领导力论坛最早于2008年开始，每年两届。2008年冠以N

名义的第一届工商领导力论坛（第十一届企业家研讨会）在温州召开。同年它以「基督徒企业家」的名义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 100 万元，用于四川震灾援助；5 月 19 日，N 在绵竹安县建立四川赈灾救援站，投入赈灾救援；并与搜狐网、《商界》杂志、长江平民基金会等一起在成都举办了「筑山上之城：志愿者（机构）如何参与重建」论坛，在会议上写成了《6·12 中国（部分）企业家成都倡议书》。

2009 年 4 月，该机构组织策划了首次以色列圣地灵修与领导力培训之旅，并于 10 月主办和召开「首届全国基督徒企业家工商团契牵头人代表退修会」。

2010 年 3 月，第一届商人牧者团契在北京市召开，与会者就中国的基督徒企业家在宣教使命中的责任及如何实践、如何在企业中和个人生命里作光作盐等问题与牧师们进行探讨。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是：

「商人团契与牧者团契之间的联系，必然促进工商界福音事工的推进，促进具有国度胸怀的基督徒企业家和基督徒企业的生命建造，促进中国教会的宣教和社会责任的深化和实践，进一步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和平崛起。」

5 月，第一届仆人领导工作坊在北京市举办。主题是仆人领导、知行合一、服务之道，目标是支持企业家深入了解仆人领导核心理念，掌握运用方法，并在现代企业中更好地践行，激发团队及个人潜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2010 年 7 月，第一届思想力沙龙「一生的呼召」在北京市举办。2011 年 9 月底 10 月初，第八届工商领导力论坛在马来西亚举办。2012 年，N 策划并推动「善商长城宣言」：

『我宣告，「我是善商，爱人如己！」我要以爱心、道德和使命感经营生命、家庭和企业，竭力追求谦卑舍己、诚实守信、善良单纯的美好品格，最大程度地奉献自己、回报社会，让上帝的荣光照亮中华、照亮全球。我

承诺信守「善商十诫」。²⁷」

2014年2月，N成立「领袖学院」，力图「在中国培养国度型领袖，提高教牧领袖和职场领袖的国度视野、胸怀和能力，实现中国的复兴。」12月，N七周年庆典暨论坛召开，有来自六类基督徒群体的代表担任表演嘉宾和讲员：基督徒演艺人士晚会表演；教会领袖发表「复活节—中国基督徒爱心献血日长城倡议书」；基督徒商人宣读「善商长城宣言」；从事婚姻家庭辅导工作的基督徒发表「国际新生命新家庭运动宣言」；基督徒媒体人士首次发布了「爱邻舍从理解开始」报告；倡导宗教事务立法的专家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

对于工商团契，N公开表达其使命是：「协助建立并陪伴各地工商团契；搭建平台促进各团契间的联结与沟通；共同探索职场福音化的策略方针，成为推动其发展和成熟的纽带；帮助工商团契成为祝福中国、祝福世界的重要渠道」，其主要工作包括联络各地基督徒企业家，推动各地工商团契成立，组织基督徒企业家到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与当地基督徒企业家或团契交流。

N认为，工商团契本质是教会事工在工商领域的延伸，并将牧师作为工商团契的基本要素之一。其负责人明确指出：

「基督徒工商团契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协会、俱乐部，它不是以探讨普通经济话题或以经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而是关注信仰与生命建造的团体；它也无法代替当地教会牧养圣徒、成全完备、作为真理柱石的角色。」

可见N对工商团契的定位与教会并不冲突。

4.2. 非营利组织 M⁽²⁷⁾

2012年9月成立的M，创始成员都在东北某市三自教会。该组织最

初源于 2008 年在东北该市基督徒企业家家庭小组的培训，逐渐发展到两个工商团契，稳定成员两三百人，M 培训人数达两千人次，地域辐射范围包括东北三省、湖北武汉、江西景德镇、北京，甚至韩国首尔。其核心团队由基督徒企业家和经济学专家组成，核心业务是从事基督徒企业家培训。

该组织以「让有福音的人得智慧、立大业，让有事业的人得福音，立信仰」为宗旨，以「全是爱、全方位、全家人、全世界、全身心、全喜乐、全一生」为核心教育理念，以圣经原则及现代商业伦理为核心进行全方位的门徒式培训，简称「圣商」。这种培训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致力圣商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尝试将理论运用现代企业实践；另一方面向企业家提供圣商企业培训和管理咨询服务。

2012 年 9 月，M 在北京市开设第一期基督徒企业家培训班：学制三年半，每月安排一个周六集中学习一天。培训对象是年收入营业额 1 千万、或利润 1 百万、或员工人数 20 人以上的企业所有者、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费全免，但要求每一个学员承诺每年对社会奉献 6 万。其课程内容参考 MBA 教材但根据基督教信仰与企业关系分为：A. 核心课程（圣商之道、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管理、产品责任伦理、财务管理、投资管理、环境绩效与资源管理、企业法律实务、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企业创新管理）；B. 文化课程（基督教发展与西方文明、汉语神学、宗教社会学、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C. 游学课程（全学年 4 次：罗马—瑞士朝圣之旅、以色列圣经文化之旅、清教徒与美国文化之旅、外国宣教士在中国的脚步）。之外，M 还为学员提供商务考察、高端论坛、公益慈善和爱宴等活动。

第一期培训班学员 42 人，出席率达 70 至 80%，但高端企业家学员流失较多。学员在核心课程学习中提到最多的问题有三类：贿赂、借贷、追债。借贷问题是因为圣经提到不能借贷；追债是因为如果债务人逾期借债不还，

是否可以采取社会上常用的一些方法获得债权的实现。学员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明显低于核心课程，不仅出席率低，而且在文化课程中学员认真程度也较低，原因很简单：核心课程与基督徒企业家经营企业实践操作紧密相关。就游学课程而言，在某次游学中受到环保意识的强烈影响，一位学员回国后决定将其俱乐部备用供电系统中的烧煤设备换掉。另一位经营矿业的学员当时则流泪，想关闭其公司；M 负责人劝其不如留在行业内，一边尽力去减低企业运营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改变对该行业同行产生正面的影响。M 机构每年支出 200 万元举办这些活动，希望学员向社会回报的是一亿。

上述 N 和 M 两个非营利组织，都是由基督徒经济学家和商人合作去建立基督徒企业家网络以及创建工商团契。B 团契负责人就在 M 接受定期培训，并采用了 M 机构的名称给 B 团契冠名。N 负责人曾与 C 教会主任牧师见面并鼓励成立工商团契，这也是 C 团契成立的一个诱因。M 机构与 D 团契所属教会有着频繁的联系，其多位学员和义工都来自该团契。值得注意的是，N 和 M 这两个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参加者，都有来自家庭教会的，也有来自三自教会的，但是 N 机构明确定位于推动家庭教会的合一，M 机构则基本依托三自系统展开活动。

5. 政府与工商团契：独立还是依附？

工商团契与政府的关系，可以从三方面观察：团契内部是否讨论政治或人权问题、团契是否需要政府认可合法地位、团契内基督徒企业家如何看待行贿。而这三方面与团契负责人的神学立场、教会观以及对政商关系的理解相关。

第一次参加 A 团契的一位基督徒作自我介绍时，谈到自己曾从事人权

研究工作，后被该团契的一位核心成员私下提醒：「在这儿别讨论人权。」参加该团契的基督徒基本都是在家庭教会聚会，而且这位提醒者曾是某家庭教会长老。这就正是该团契从未考虑政府是否认可的原因。2013年，有家庭教会背景的一家基督教书店受当地政府压制时，该团契组织成员购买该书店几万元书籍，以表示支持。但是，A团契负责人苏先生也接受市三自教会工商团契邀请，发表关于信仰与职业关系的演讲。正如该团契不隶属也不反对某个教会一样，它对政府的态度也居于中间的立场。

在团契与政府的关系上，C团契也受到C教会的深刻影响：最初团契成立的原因之一，就与支持家庭教会领袖或宣教士参加基督教国际会议有关。家庭教会代表受到政府阻止参加会议后，团契与其中一位成员创办的某民间组织合作，将余款用于支持西部儿童的教育。尽管C团契独立于教会，但由于政府与C教会的关系紧张，该团契从2010年的每月一次活动变为2011至2014年期间的不定期活动，甚至每年一次聚餐；但经过2014年9月的重新筹划，当年年底开始了每两月一次的敬拜和分享。尽管政府屡次干扰该教会成员以教会名义的聚集活动，但对该团契活动没有采取任何阻挠措施。C团契与其他三个团契不一样的是，他们比较关注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2014年加入的一位基督徒律师，曾在多个案件中帮助家庭教会信徒面对当地政府的处罚，为他们维护权利，包括温州十字架被拆事件；该成员还在团契中作了专题分享，讲述如何为温州事件中受到处罚的基督徒维权。

笔者曾问一位企业家对宗教政策的看法，他说：

「圣经明确指出：不要反对政府。上帝让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统治，上帝有他的美意。顺服，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们算是弱势群体，面对中国特殊环境要灵巧如蛇。除非不让我们信仰，跟你死磕到底。」^{〈28〉}

就C教会与政府的矛盾及应对方式，他委婉地评论：

『上帝给每个教会带领不一样：各有各的异象、特殊的启示，就另当别论了。……学习顺服是最重要的功课。我曾跟一位统战部部长谈话，他说：「你们回来，我们都知道。但你是爱国的。」作为国家派出的精英，他们知道我们爱国。』^{〈29〉}

就 D 团契而言，政府没有直接表示支持或反对。根本原因是其所属的教会是在政府登记的三自系统。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团契获得了各种活动资源：首先是有稳定、公开和便利的活动场所；其次，教会的合法地位延伸到给予团契组织的合法性；第三，团契可以跨地域与其他三自教会的工商团契合作，而且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但也由于它被直接置于宗教管理系统中，团契活动的形式和深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曾在政府工作的 B 团契的一位负责人谈到自己最初从事贸易经营时也行贿和偷税。他提到：信主后一开始按照信仰教义去做是有挑战的，不合适的事情做得少些了，逐渐地、慢慢地「少做不做行贿的事」。不过他经常跟笔者以微妙的语气强调，基督徒企业家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完全做到符合信仰的很少或很难。B 团契参加者基本都是家庭教会背景，但也有个别稳定参加的成员曾在去家庭教会后改去三自教会。这表明该团契并不拒绝三自教会信徒。

另一位企业家认为：「领导帮你，你是否回报这个问题，争论大。不能行贿，但可以约领导旅游。」^{〈30〉}面对这个困境，他的解决方法是：

「基督徒企业要到一个地方，祝福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行出来，人家若觉得这个企业跟别人不一样，就不必行贿受贿了。基督徒企业家太散了，没有真正团结起来，我们如果做大、做强，那就是政府找你而不是你求他了。」^{〈31〉}

这两位企业家都非常尊敬他们所在 B 教会的主任牧师：B 教会是家庭教会，在坚持不到当地政府登记的前提下，牧师对政府的其他要求尽量妥协，

持守不对抗立场。孙先生创立的 B 团契不属于 B 教会，尽管公开活动，但也未到政府登记。很明显，该团契这种立场应该受到 B 教会主任牧师的神学观和教会观的影响。

C 团契成员都是 C 教会的会友。成为会友需要在教会上培训课程，其中内容包括禁止基督徒行贿。就这点，一位企业家介绍：

『第一次了解到信仰对企业的要求是因为：我当时要成为会友。会友的培训教程讲到，基督徒应该恪守的一个原则：禁止商业贿赂。这是我敏感的地方。培训完，一般人都要写个申请成为会友，但是我觉得我还不完全符合这个要求，达不到标准，等我达到标准了我再写申请。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即行贿〕拿掉。我想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一点一点的，等我们的产品做好了，做到不可替代了，我们就可以不用这种方式了。』

另一位企业家回忆了其公司一位股东，为争夺控制权不惜以公开公司行贿相威胁的经历：

『这一年我也安静下来，读经祷告，有时间来灵修。其实神让我看见，如果你公司有破口、有罪吧，就成为仇敌攻击的破口。我们的佣金问题、所有不完备的地方，全部成为攻击的破口。所以神让我们圣洁，是为了他儿女的益处。我突然明白了，这是神的爱。我们往往觉得吧，神有诫命，不让我们做这个不让我们做那个，其实，禁止儿女做，这个是出于爱。知道这个带来威胁，可能把整个企业都葬送了。从 2012 年到 13 年我们不再行贿。很多人就直接跟你要：能不能给我个卡，有的晚上十点半给你打电话，就是等你给他个承诺，不给，有的生意就没了。……员工这一年在痛苦的煎熬中，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他〔即那位股东〕一直拿着「炸药包」来威胁我。如果我们稍有瑕疵，我们就死定了。最后我们决定，反正是死，我们就不行贿了。死就死吧。这是我们核心团队五个人后来一致的决定。……另外，国家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也加大，这也是大

的环境的影响。从2012年后，我们就没有一分钱是灰色的。但神真的是很保守，神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个人的收入、公司的收入，都没有任何影响。13年销售没怎么做，13年11月的时候公司还是亏损，12月一下子来了四五百万的合同，公司一下收入挺高的。……这就是神的保守吧！你尽你的本分，其他的是神的事情了。我们其实走到这一步，能有这个信心，其实是被逼的，因为内外交困。后来我们成立了新的公司，也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宗旨。从信仰角度来说，我们内心不能得罪神。信心也是来自神，神把你放到这样一个地方，给你一个环境，其实是把你真的炼净了！」^{〔32〕}

C团契还有一位核心成员也是由于成为基督徒后不行贿，使公司无法经营，最后只得转行到文化产业。由此可见，由于教会的教导和要求，这个团契的核心成员都拒绝行贿。

政商关系困境，常常是企业家思考信仰问题的开始。财经作家吴晓波提到：两千年中国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33〕}王瑛直率指出恶性的政商关系无法建设良序运行的工商社会。^{〔34〕}王石则坦率承认直到今天中国商人思维方式不独立，「有依赖性，就是官商勾结」；^{〔35〕}在他看来，传统文化和政商关系无法赋予商人独立的人格，中国企业家普遍因不确信和不安安全感而有着身份焦虑。^{〔36〕}

正是因身份焦虑感而追求身份定位的大背景下，中国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一批批企业家或工商业主成为基督徒。「基督徒企业家」这个新的身份，开启了一种新的精神结构，其精神要素包括圣经、基督教文明、道德意识和「呼召」观或天职观。工商团契的建立，是这种基督徒企业家精神结构重塑过程中的产物。圣经文本和教会组织内的宗教生活为基督徒企业家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转变的动力，意图离开或跳出过去身处的政商关系（不管是剧烈切断还是逐渐摆脱），以基督教神学为理论基础、借助呼召、天职、国度企业、基督徒企业家等概念，构建具有神性、使命感

并整全的企业文化。企业家不仅在这种文化内获得了新的身份，而且可以创建一种企业家群体或共同体，从而共同履行新的义务和使命。

工商团契就是营造这种共同体的载体或这种共同体的原始形态。基督徒企业家在获得这种新身份并开始思考和行动的初期，旧身份、旧世界观与新身份、新世界观的矛盾与冲突也在工商团契内体现：既要摆脱现有的政商关系，不行贿不偷税漏税，又对政治权力存在依附或恐惧心理；既要开始争取独立于政府的身份地位，在新的身份基础上承担新的使命，又不愿反对政府或不想让政府误解自己在对抗。

五、结论：工商团契与企业家精神

1. 工商团契内企业家的转变

企业家精神，在企业界或工商社会最为人津津乐道。创新、领导力和整合资源的能力，都被看作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体现。而工商团契则更新着企业家的家庭观、职业伦理和产品 / 服务理念。

1.1 更新的家庭观

当今，中国的家庭受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诱导，不少企业家或工商业主的家庭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因为企业或生意经营非常忙碌，以至极少时间陪伴家人或儿女，更难以承受的是，由于恶性政商关系延伸出企业家吃喝嫖赌的职业生活，对要求忠诚和信任的夫妻生活造成了侵害。

为获得或维持依附政治权力格局以赢取经济资源或盈利的机会，企业家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人格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当这种情况维持一段日子

后，个人的心灵压抑和家庭破裂便会很容易产生。企业家为避免或解决这种危机的出路之一，就是进入教会或读圣经，他们成为基督徒后最直接或最明显的改变就发生在家庭中。

B 团契的牧师就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弟兄，信主前吃喝嫖赌都干，每次回家是因为输光了，妻子拿着支票帮他还债。他在我们教堂参加了一个婚礼，觉得特别神圣，来到教会里面，刚好我们一个姊妹认识他，他就参加我们慕道培训班，那位姊妹就把他介绍给我，从参加慕道培训班，受洗，一步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特别奇妙，一天两包烟，小时候爸爸打他都戒不掉，信主后烟瘾戒掉了，他说以前去歌厅做的那些事不能干。……他很多朋友发现他改变了。他们那个圈就都是做生意的嘛！……你没外遇，你不这样，人家觉得你有问题，你没能耐。大家，尤其是他的妻子发现他改变很大。因为以前他整天不着家。他妻子觉得挺奇怪的，他来教会后全都改变了。妻子也跟着来教会，一开始不愿受洗，后来主动提出来受洗了。」⁽³⁷⁾

成为基督徒在商界会受到排斥，但在自己的家庭得以自由。C 团契的一位企业家坦承：

「我信了主以后，以前商业上的朋友都不来往了，因为他觉得你在他面前显得他们都不好似的。比如去夜总会，你不去；他们找小姐，你不找；就让他们很不舒服。他的意思是你是男人，你都不喜欢女孩子啦？你那个信仰是信啥呢？曾经有人说：你以前比现在好，都能跟你交朋友，都能跟你一起玩，挺快乐的！现在你也不近女色，别人也没机会，在一起玩觉得不舒服，不爽！因此走不到一起了。」

信主之前，我的手机是不敢放在家里的，一直揣在兜里面，把着手机是很严的。信主后，手机充电，搁在家里面，也一直就没事了。」⁽³⁸⁾

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众多基督徒企业家的一位基督徒企业培训师提到：

「基督徒企业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正面的。他们普遍家庭比较幸福，不会出现离婚、包二奶、婚外情；他们也没有不良嗜好，随着时间推移远离社会恶习，比如抽烟、喝酒、与色情有关的东西……」^{〈39〉}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就是基督教教导信徒在婚姻上持守的立场和原则。基督教信仰不仅使基督徒企业家的家庭观得以改变，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得到改善，而且家庭与教会或团契的关系得以建立，因此，在以上四个团契，都能发现夫妻共同开放家庭或一起在团契服事的现象。在家庭中学习丈夫对妻子忠诚、妻子信任丈夫的过程中，企业家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和能力影响到其对企业和社会的态度，故此苏先生认为「婚姻是对男人最大的祝福」，「男人是在家里被打磨出来的」，「企业家学习管理、学习领导力都不如在家里打磨出来。慢慢做、慢慢做，你就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40〉}

1.2. 职业伦理的改变

「呼召」意指上帝指示基督徒在其职业和生活中运用自己的恩赐，来完成上帝所授予他们的使命。由此，基督徒企业家不仅在企业经营上被赋予神圣意义，而且获得了工作上的目标和使命。以这种「天职观」为基础，企业家逐渐改变过去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并思考如何摆脱以往依靠行贿或其他不正当方法与政府权力建立关系网络。这种信仰及由此引导的行动，逐渐确立和增强了基督徒企业家前所未有的新身份。这种具有独立人格的新身份得以确立，转而又设定了企业家与政府关系的边界和职业伦理的内容。

基督徒企业家签名的「善商长城宣言」即「善商十诫」，完整阐释了基督徒企业家的新型职业伦理：1、不做假帐；2、不偷税漏税；3、不发生婚

外性关系；4、不行贿受贿；5、不从事不道德行业（包括产品和服务）；6、信守合约（无论正式或口头合约）；7、善待员工；8、善待环境；9、爱配偶、爱家庭、孝敬父母；10、爱邻舍、爱公义。

这种新型职业伦理，通过工商团契分享的方式，在基督徒企业家群体内传播、建立共识并具体深入到职业生活中。这种新型职业伦理一方面被基督徒企业家群体，尤其是工商团契试图用来确立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和经济伦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基督徒企业家确立自我形象并向其他人传教的媒介或工具。

1.3. 企业管理、产品及服务理念变革

由于决定不再依靠与政府权力的不正当关系获得垄断地位或盈利机会来经营企业，基督徒企业家就逐渐转向从技术、管理及环保上创新，以提供更满足一般消费者或客户需要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这种转变带来了企业文化转型的趋势，结合「呼召观」或「天职观」的流行，一整套基督徒企业家职业伦理观的形成，「国度企业」、基督徒企业或「圣商企业」的概念得以确立，为基督徒企业家的转变提供神学基础。

非营利组织 N 负责人提出的「国度企业」是基于商业与宣教结合的模式构建，由此奠定企业的目标：盈利；设计生产更好产品或提供更高质量服务，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宣教，以更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改变人们的生命。由此，基督徒企业的终极使命不是赚钱，而是宣教。

非营利组织 M 对基督徒企业家的培训以「圣约式管理」为重点：即让「企业家认识到自己职责定位是好管家并与神立约，企业内外都有明确符合圣经原则的完备契约和合同」，确立基督徒企业家守约的观念，将扶贫等慈善事业和传福音都纳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范围，并且要求其产品体现神性：

即创新、完善、可持续、价值。M 的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要求基督徒企业家按照基督徒企业的标准，即宗教生活、企业管理、绩效、社会责任和环保五方面去创建或经营企业。

2. 工商团契的困难及其展望

有人直接批评工商团契是「一群既想谋求『永生』又想在地上拿到好处的人所组成的『熟人』或『半熟人』化了的『小圈子』」。^{〈41〉}而工商团契自身成员，尤其是创立者，也开始反思这类发展十年左右的基督徒结社现象。如广州工商团契发起者认为，工商团契目前有八大挑战：身份定位不清；神学定位混乱；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定位不清；团契实际领导力归属不明；缺乏针对性牧养；遭遇瓶颈期，亟待突破；缺乏专业的牧养团队；缺乏标本和领军式人物。^{〈42〉}基督徒经济学家赵晓还提到：「工商团契领导人的属灵成熟度和品格根基成为工商团契发展的考验」，而且「职场实践缺乏神学理论的有力支撑」。^{〈43〉}认同上述分析也曾创立工商团契的家庭教会领袖，则提出如下建议：加强教会讲台信息中关于职场神学与职场伦理的教导；以教会为中心，推动全方位神学研究和教育，逐步建立体系化的神学院、教育机构、跨教会事工机构及出版社；以神学院和研究机构为中心对职场神学及职场伦理进行专题研究；建立职场化的职场事工机构；邀请基督徒领袖指导。^{〈44〉}

3. 评论

笔者曾长期观察基督徒法律人团契和媒体人团契。工商团契与这两种团契的区别在于：第一是成员不同。工商团契主体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

员，尽管常有律师参与；法律人团契主体基本都是法律职业人士，媒体人团契都是记者和编辑。第二，数量和范围不同。工商团契出现的时间比其他两种团契略早，而且数量、覆盖的地域远远超过法律人团契和媒体人团契。第三，规模不同。不仅在省、市、县、乡镇各层级都有工商团契，而且人数最多的达至千人，百人团契比比皆是，其他两种团契人数则逊色许多。第四，活动内容不同。其他两种团契基本集中在基督教信仰与职业关系，法律人团契更多讨论社会公义问题；而工商团契的关注是多方位的：包括婚姻家庭、子女教育、职业伦理、企业管理，而且对宣教和社会服务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即使是其他职业团契也关心的婚姻领域，企业家更加公开强调自身成为基督徒之前婚姻家庭问题的严重，尤其是成为基督徒后相应的改变，这个群体对婚姻领域传福音投入的力度也更大。第五，对职业群体的影响不同。形式上工商团契对相应的职业群体即企业家的影响更大，不管是职业使命的提出，还是基督徒企业家共同体的创建，例如「国度企业」的观念和基督徒企业家各种形式的联络或联合。

上述五种差异，可能导致工商团契比其他职业团契对教会及神学的影响更加明显并更有潜力。

3.1. 对教会的影响

工商团契运动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不是教会而是工商团契，赋予了工商界基督徒以「基督徒企业家」的身份。这个前所未有的身份，借助工商团契的各种活动来重构工商界基督徒的人格和使命，重塑他们的家庭观和职业观或企业家精神。由此，家庭建设、企业经营和宣教成为工商团契的三重主题。工商团契在上述主题结构中展开的活动内容，似乎给基督徒企业家提供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宗教生活。

有人认为，企业家整合资源的能力在工商团契宣教使命中的应用，可能导致其生发出一个目标：即教会的合一。不仅是家庭教会的合一，而且是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合一。合一的载体就是工商团契。由于神学定位的混乱，这种合一的期待最终将演变成工商团契自身成为一类教会：即不同于中国传统教会、知识分子背景的神职人员主导的城市教会，而是由基督徒企业家创建并起决定性影响的教会。

然而，笔者认为，在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信奉基督教的背景下，此类教会的社会定位可能会越来越接近主流，教会领袖越来越寻求在教会网络和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并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以更主动的姿态探索更灵活的处理模式。最终这类教会不仅无法完成上述合一目标，反而会与前两类教会群的差异增大。

3.2. 乐观的进步主义对神学的影响

在调研过程中接触到的该市基督徒企业家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是充满活力和乐观的一群人。大多对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没有韦伯所说的焦虑感，即使是明确自称为改革宗教会的信徒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没有对自己已经被神拣选有任何疑虑或焦虑，反而认为正因为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要在家庭、企业里有一个更新的开始。创建工商团契也是这个逻辑下的产物。

似乎越有知识、学历越高或影响力越大的基督徒企业家，越是抱乐观的态度，越明确主张并相信通过工商团契的宣教和国度企业的建立、发展，越能够帮助中国人认识基督，相信基督，即实现中国的福音化，由此建立一种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的宣教，与中国的文明建设，合而为一在一种乐观进步的线性历史观中。不难看出，这种神学仍然是自始至终以国家为中心或中心之一来建构的。●

本文原题目为：〈城市新兴基督徒职业群体——以工商团契为例〉，首发于：高师宁主编：《田野万象——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报告》（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8），第8章，页472-530。

《世代》转载此文，已经文章作者、文集主编、出版社同意。关于此文和文集及转载或其它事宜，请访问出版社网站进行了解和联系：

http://www.cscrc.org/publish_tc.php?id=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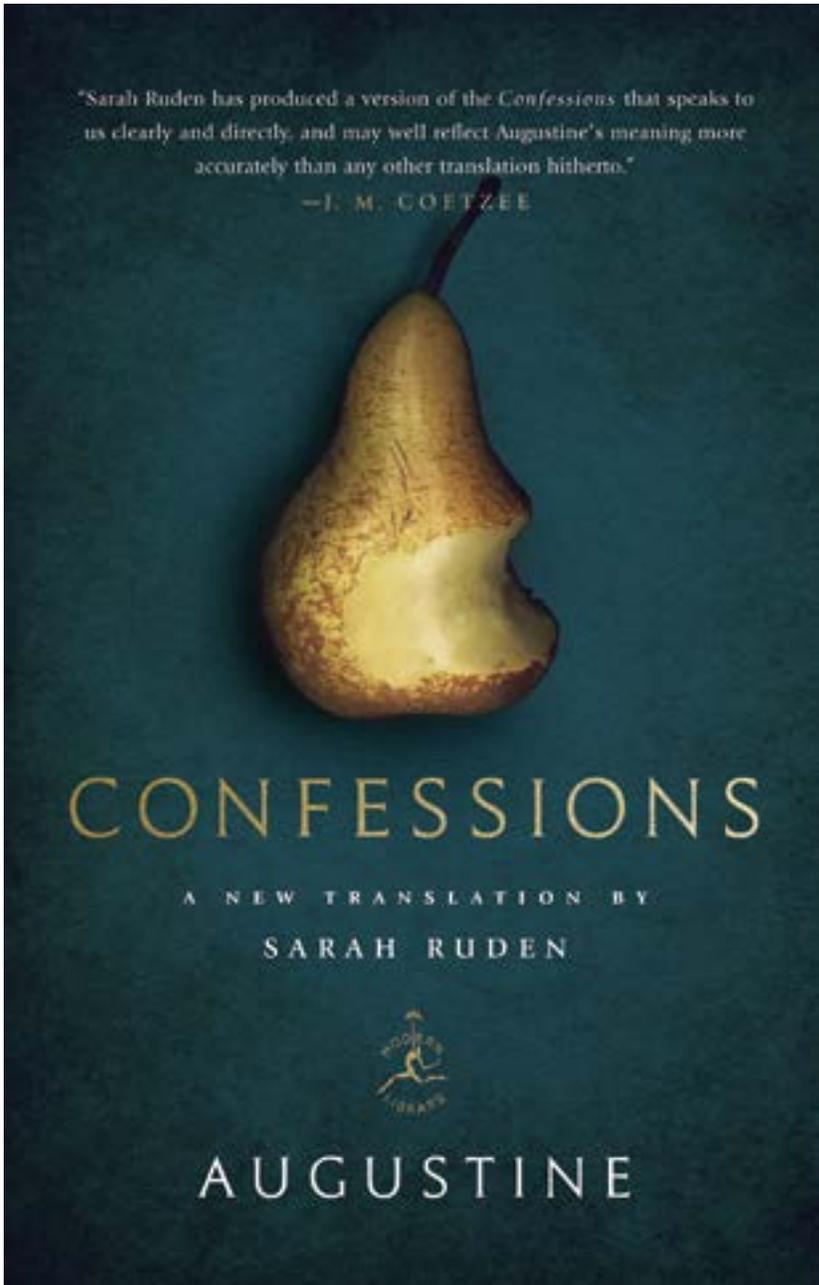
http://www.cscrc.org/contact_tc.php。

此文经过《世代》编辑的版本首发于《世代》第8期（2019年夏季号）。《世代》的编辑只限于文章格式的调整、个别文字和部分标题数字的修正、几处引号的添加、题目的改动（基于原题目和文章内容）。

-
- 〈1〉 韩牧：〈中国基督徒商人〉，《财经天下》（2013年期26），2015年2月1日浏览，<http://bschool.hexun.com/2014-01-06/161185289.html>。
- 〈2〉 沈阳：〈基督徒商人，真有那么美？〉，《时代周报》，2014年1月9日，2015年2月1日浏览，<http://news.hexun.com/2014-01-09/161274779.html>。
- 〈3〉 张沐恩：〈基督徒工商团契，如何才能美？〉，《天风》（2014年期2），2015年2月1日浏览，<http://www.jdjcm.com/jiaohui/504.html>。
- 〈4〉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no. 3 (1985): 481-510; 戈登·雷丁：《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谢婉莹译（上海：格致、人民，2009）。
- 〈5〉 其中有一次是某教会的职场团契，包括企业家等各类职业人士。
- 〈6〉 李秀娟、纳超洪、芮萌：〈从草根一代到梦想一派〉，《经济观察报》，2013年12月27日，2013年12月31日浏览，<http://www.eeo.com.cn/2013/1227/254115.shtml>。
- 〈7〉 龙玉琴：〈王石——我不移民，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跑了算什么〉，《南方都市报》，2014年12月30日，2015年3月9日浏览，<http://edu.163.com/14/1230/10/AEN4M6O900294III.html>。
- 〈8〉 同上。

- 〈9〉 以下材料来自笔者2014年1月5日、1月19日对A团契的田野观察记录。
- 〈10〉 笔者2014年1月18日对孙先生的访谈整理；3月12日、3月19日对B团契的田野观察记录及收集的现场资料；3月13日对「资本沙龙」的田野观察记录。
- 〈11〉 笔者2014年1月25日、11月22日、2015年1月24日对C团契的田野观察记录；2014年1月10日对O1的网络访谈整理；2014年1月14日对S5的录音访谈整理；2014年4月10日对S7的录音访谈整理；2014年5月16日对S4的录音访谈整理。
- 〈12〉 那次是邀请到台湾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总干事的夏中坚牧师。
- 〈13〉 以下内容源于《福音时报》和该教会网站的团契活动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料；笔者2014年7月5日在D教会工商团契D的田野观察记录；2014年7月15日对牧师M3的访谈记录。
- 〈14〉 笔者2014年1月24日对C教会牧师M4的访谈记录。
- 〈15〉 笔者2014年3月27日对基督徒企业家S9的访谈记录。
- 〈16〉 笔者2014年1月18日对基督徒企业家孙先生的访谈记录。
- 〈17〉 笔者2015年1月28日对D教会牧师的访谈记录。
- 〈18〉 笔者2014年7月15日对D教会牧师的访谈记录。
- 〈19〉 笔者2014年3月27日对基督徒工商人士S9的访谈记录。
- 〈20〉 笔者2014年1月24日对C教会牧师M4的访谈记录。
- 〈21〉 笔者2014年4月10日对C教会企业家S7的访谈记录。
- 〈22〉 笔者2014年1月5日对A团契的田野调查记录。
- 〈23〉 笔者2014年7月15日对D教会牧师M3的访谈记录。
- 〈24〉 麦可·贝尔 (Michael R. Baer): 〈我的公司——基督教企业或国度企业?〉, 周亦婷译, 载微信公众号: 新商道, 2014年6月13日。
- 〈25〉 〈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博士——神国经济与国度企业〉, 载《基督时报》, 2011年3月1日, 2015年3月8日浏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3320d90100ozcq.html。
- 〈26〉 以下材料来自该机构网站发布的信息、该经济学家的博客和其文章。
- 〈27〉 笔者2013年12月4日对该机构负责人的访谈录音整理；2014年1月18日、3月1日、4月12日、7月5日对该机构举办的基督徒企业家培训班的田野观察记录。
- 〈28〉 笔者2013年10月29日对基督徒企业家MD的访谈记录。
- 〈29〉 同上。
- 〈30〉 同上。
- 〈31〉 同上。
- 〈32〉 笔者2014年4月10日对企业家S7的访谈记录。

- 〈33〉 吴晓波：〈中国进入政商博弈新周期〉，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2015年2月3日。
- 〈34〉 王瑛：〈中国政商关系躲不过，也躲不得〉，中国企业家网，2014年4月21日，2015年3月9日浏览，<http://www.iceo.com.cn/mag2013/2014/0421/288099.shtml?ihojrsrzplwqgmfb>。
- 〈35〉 贾鹏：〈王石——「不行贿」作为我的标签是社会太荒唐〉，《新京报》，2014年2月14日，2015年3月9日浏览，<http://business.sohu.com/20140212/n394806819.shtml>。
- 〈36〉 龙玉琴：〈王石——我不移民，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跑了算什么〉，《南方都市报》，2014年12月30日，2015年3月9日浏览，<http://edu.163.com/14/1230/10/AEN4M6O900294III.html>。
- 〈37〉 笔者2014年7月15日对牧师的访谈记录。
- 〈38〉 笔者2014年5月16日对S4的访谈记录。
- 〈39〉 笔者2014年1月2日对G3的第二次访谈记录。
- 〈40〉 笔者2014年1月5日对A团契的田野调查记录。
- 〈41〉 沈阳：〈基督徒商人，真有那么美？〉，《时代周报》，2014年1月9日，2015年2月1日浏览，<http://news.hexun.com/2014-01-09/161274779.html>。
- 〈42〉 张远来：〈有关中国基督徒工商团契的一点反思〉，载作者博客，2014年1月16日，2015年2月1日浏览，http://blog.sina.com.cn/s/blog_8a7279a20101r98i.html。
- 〈43〉 赵晓、聂文光：〈中国工商团契事工的回顾、展望暨工商职场事工思考〉，《香柏快讯》总第18期（2009年10月23日），2015年1月1日浏览，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4d3a8c0100h3dp.html，<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5460>。
- 〈44〉 刘官：〈他山之石，如何攻玉？——中美基督徒职场事工比较〉，微信公众号：北美学人，2015年2月17日。



奥古斯丁《忏悔录》撒拉·鲁登（Sarah Ruden）英译本，2017年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版，
<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books/239720/confessions-by-augustine/9780812986488/>，
https://www.amazon.com/Confessions-Modern-Library-Augustine/dp/0812996569/ref=tmm_hrd_swatch_0?_encoding=UTF8&qid=&sr=。

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时间问题

文 / 孙毅

以往有人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倾向于将他所说的时间理解为心理化的时间，或者是仅存在于人的内在主观性中的时间；其实，这并不是他时间观的主要特征。在他的《忏悔录》中，我们甚至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奥古斯丁确定了时间本身的实在性。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既不再附属于事物的运动，也不限于人的心理或主观层面。

如果说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肯定了时间在本体层面上的真实性，⁽¹⁾那么，他的这个工作一方面受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他从圣经中继承来的创造论。时间作为上帝创造世界中的一种受造，它的真实存在来自于上帝的实在性。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将时间的真实存在与上帝的实在性关联在一起，而他的上帝观又因为希腊哲学的影响而被理解为是永恒不变的上帝，因此带来其时间观的一个重要难题：如果只有“现在”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反映时间之延展性的真实时段如何可能？引伸出来，量度这样一个时间段又如何可能？本文试图简要地

分析，在《忏悔录》十一卷中，是什么因素使他在时间问题上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并以此讨论在此基础上所开展出来的思索时间问题的不同思路。

一、《忏悔录》十一卷带出的时间问题

如果说在历史上，奥古斯丁首先肯定了时间在本体层面上的真实性，那么，虽然他的这个工作受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他从圣经中继承来的创造观。上帝作为创造者，时间为他所造。时间与这个世界一道被创造出来。这里的出发点，不是人对时间的经验，而是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上帝。

这位上帝赋予时间以真实或实在性：“你的日子，没有每天，只有今天，因为你的今天既不递嬗与明天，也不继承着昨天。你的今天即是永恒。”^{〈2〉}因为上帝之永恒的实在，“现在”真实存在，时间本身“整个只有现在”。^{〈3〉}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看，作为最终实在的上帝通过赋予“现在”之现实性而赋予时间以实在性。如此，“现在”如同一个参照系的原点一样，进入到受造世界之中，成为受造世界之时间参照系的原点。

奥古斯丁从其创造论的角度出发，将时间与作为创造者上帝的创造关联起来的结果就是，可以将时间与事物的运动分离开来而在思想中考察时间本身。在他之前，按照亚里士多德，时间是与物体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时间被看作是物体的运动，作为运动之属性或者是对物体运动的一种度量。^{〈4〉}但奥古斯丁却认为，“时间并非物体的运动。”^{〈5〉}时间已经被看作是独立于物体而存在的：“我听说物体只能在时间之中运动。”^{〈6〉}因此他所试图量度的是“物体在其中运动的时间本身”。^{〈7〉}当时间还没有作为时间本身被分离出来之前，时间与对时间的测量被看作是不分的，因此测量一个物体的运动过程似乎成了一个时间段。但当时间与事物的运动分开，而与上帝的

永恒现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时间作为延展性的时段本身则出现了难题。

按照奥古斯丁的上帝观，作为不动不变的上帝所居的永恒，其中没有时间，有的只是现在。相对现在，过去已经不存在，而将来尚未存在。如此，奥古斯丁问道：“不存在的时间怎能有长短呢？”^{〔8〕}既然过去，已不存在，何有长短？还未来到，尚未存在，何有长短？同样，就算是“现在”也不过是一个瞬间，“现在是没有丝毫长度的。”^{〔9〕}这样，奥古斯丁在这里表达的时间观似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时间作为“现在”从它的创造者那里似乎获得了真实存在；并且它的存在被看作是一种由将来流逝于过去的延展：“我看出时间是一种延伸。”^{〔10〕}时间的基本特点是其具有向某种方向的延展性。但另一方面，时间似乎又不具有时段之长短。时间的延展性表现在哪里呢？体现延展性的时间段是否具有实在性？如果唯有“现在”是实在的，并且它就是当下的瞬间，那么量度某个时段何以可能？

对于第一个问题，奥古斯丁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只在人的灵魂中才有可能量度时间。时间从其特征上作为有方向的延展，无法在上帝之永恒的层面上说明，只能在心灵度量层面上说明。如果我们把心灵对时间的量度当作是他所说的时间本身，就会得出时间具有人内在或心理时间的结论。但这只是掩盖了他时间观中所存在的核心张力。一方面他确实说，时间本身就是指一种延展性。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指出这种延续性的来源，即与创造者上帝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主要是从度量的角度来解释心灵借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划分来对时段的度量。这里暴露出奥古斯丁时间观上的一个二元论的张力：永恒不变的上帝与具有延展性的受造物之间的张力。

这确实是奥古斯丁时间观所遭遇到的一个困难：由于在永恒与延展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甚至到了近于两元的地步，如果时间自身作为“现在”不具有任何长度，只在心灵的度量中才有延展性，那么，时间作为一种延

伸似乎就存在于人的主观内心世界。不过更深层面的问题是，这延展性是时间自己的特性，还是心灵使之如此？如果时间作为现在不具有长度或延展性，那么时间的真实性、以及说它在经过现在时才有可能对它度量，⁽¹¹⁾又有什么意义呢？这里，度量某个东西的延展性，前提是已经设定了其延展性的真实存在，说明它本身有某种伸展性对其度量才有意义。

这样就带来两个追问时间问题的角度：第一，进一步考察创造者上帝与受造世界延展性的存在性关系。第二，在二元论的框架下，将时间就看作是这种存在者之生存的特征。

二、自然神学视野的时间思路

将时间仅看作是自然世界、特别是人内在心灵的生存特征，将其与上帝所是之无时间的永恒对应，明显具有希腊二元论的思想特征。从希伯来传统的一元论出发，如果时间本身的延展性来自于创造者上帝的永恒实在性，那么受造物之时间性其实是以某种方面反映了创造者上帝的恒久性（constancy）。而上帝的这种恒久性并非无时间的永恒不变性。就是说，这里涉及到两种对永恒的理解。

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永恒意味着非时间性，过去并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永恒之实在仅意味着现在：“一切过去和将来却出自永远的现在。”⁽¹²⁾然而在古代教父中，也可以看到另一种对永恒的理解，就是将其理解为延展至永久的恒久性。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就是从过去与将来这两极点间的无限来看永恒超越性：“神永远‘曾是’（was），永远‘是’（is），永远将是（will be）。或者更确切地说，神永远‘存有’（Is）。……他在自身里聚集、包含了所有的‘存有’（Being），既没有过去的开端，也没有将来的终了。”⁽¹³⁾如果从过去与将来这两个极点来思考上帝的无限，那么将他称为永恒的就

具有如下的意思：“因为永恒（aion）既不是时间，也不是时间的部分；永恒是不可度量的。按太阳的运行轨道衡量出来的时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永恒对永恒者也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像时间（time-like）一样的运动，与它们的存在共在的间隔。”^{〔14〕}这里将永恒表达为一种像时间的运动与共在的间隔，而不是某个瞬间。相对奥古斯丁的永恒观念，显然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的永恒观念更具有某种动态或时序内涵的恒久性。

这种恒久性就如旧约所说的，耶和華神在没有比他更高的情况下，便以自己的永生作为誓言的保证：“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15〕}如果参照旧约中平行的经文，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我指着我到永远的永生起誓。”这里“‘到永远’似乎要提醒我们：这永生有延展不断的时序观念。”^{〔16〕}

这个意义上说，创造者上帝之永恒中的时序性构成了受造世界的时间的延展性，而这种延展性成为受造世界的存在构架：“时间的本体基础是由于三一上帝的生命散发出来，神性时序的永恒提供了被造界的‘存在构架’（frame of existence）。”^{〔17〕}这种“存在构架”在受造世界中，主要体现为所有受造事物均在“先后顺序关系的规律”制约之下。事物在受造世界存在着，即意味着其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中衍生变化着。事物的这种流逝与变化虽然是通过事物自身的属性表现出来，但从时间本体角度来看，其与作为终极实在的上帝之时序性的关系，反映出时间相对具体事物之属性的客观实在性。

这种考察时间问题的思路力求将时间观建立在一种希伯来传统的一元论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奥古斯丁时间观之二元论的张力。不过，这种思路有一种明显的自然神学色彩，其理论前提建立在上帝与其受造界具有“存在的类比”的基础上。时间是所有被造物活动于其间的舞台，因为这种客观实在性，所以整个宇宙的时间具有同步性，而这种同步性的源头在于创造了时间的三一上帝的时序性：“因为时间与上帝的神性时序一致，

所以彼此有‘同步性’，这同步性不仅是‘横向’在宇宙中同步，也是‘纵向’与三一上帝同步。”^{〔18〕}三一上帝的时序性与被造界的时间性在指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从过去指向将来。就如旧约诗篇中所说的，“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19〕}这里是从亘古指向永远。

其实，这种思路没有真正触及到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涉及到的时段之可能性的问题。指向未来的时序仍然表现为是一个向着未来行进的时间点。无论这个时间点划过多长的轨迹，这个时间点依然是一个点，并不自然地凝聚成为时段。

三、生存论视野的时间思路

奥古斯丁所说明的这个事实：只有心灵这种存在者能够以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方式量度出时间的延展性（即时间性），这可以说是他对时间观的一个贡献。时间的延展性只能以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同时”呈现而表现为是一个时段，不再是一个时间点。这只能在心灵中得以实现。不过，对奥古斯丁来说，这是心灵对时间之延展性的一种度量方式。

现代的生存论者差不多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奥古斯丁的思想。用现代的语言，一般的事物只是存在（to be），而只有人（心灵）这种存在者生存着（to exist），即具有时间性。“生存”意味生存者向着将来的某个目标作出决定，从而使其作为当事者进入到某个不可回转的进程之中。这个进程所向之行进的目标构成了这个时段的将来，当初的决定变成了过去，而现在则是这个不可逆转之过程中的某个点。由此，人的生存活动将时间点展开为一个时段，表现为人进入到由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构成的生存进程中。

我们这里所说的由过去、现在及将来构成的时段，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时间性。如果此在的本质就是生存，^{〔20〕}那么此在的生存总以时间性呈

现出来。“时间性是源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因而我们把上面描述的将来、曾在、当前等现象称作为时间性的绽出。”^{〈21〉}生存的时间性与一般世界的流俗时间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流俗时间不过是一个向前行进的时间点：“时间被当作一种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而在这种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中，源始时间性的绽出性质被救平了。”^{〈22〉}与流俗时间点总是基于过去而向着将来运行有所不同，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基点是将来：“本真的将来绽露其本身为有终的将来，正是它首要地使构成先行决心的意义的那一时间性到时。”^{〈23〉}因此，对于进入生存的当事者来说，并非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而是基于所决定的某个有终的将来，过去显露出来，进而在将来与过去连成的时段中，到时的当下显明出来。

生存论的进路将人的生存与意义关联起来，比较容易说明人生存的时间性（意义凝聚的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近代认识论带来的主客观的划分，即将时间性看作是人的心理与主观现象。不过，生存论以人为主体的这种出发点，并没有超越近代笛卡儿之后所带来的划分，即心灵与物质二元划分之下，自然物质的特征被归为广延性，而人类心灵的被与延展性关联起来。从而将时间看作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特征。这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自然是非时间的（非历史的），只有人的生存是时间性的，因而是历史的。按照莫尔特曼，由于历史性的分别所导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分离，意义（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正是导致现代人类生活某些危机的主要根源。^{〈24〉}

四、一种基督论视野的时间思路

这种思路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在希伯来一元论传统中，继承奥古斯丁从创造论角度将时间的实在性建立在上帝永恒实在之基础上的思想。不过，从持续创造论角度将创造者上帝与救赎者上帝看作是同一个上帝，将时间

的实在性与基督作为的实在性关系起来。这种思路特别代表了宗教改革之后的思路。加尔文这代改教家与中世纪自然神学的思路不同之处在于：以上帝之作为的实在来认识和谈论上帝，而不是以上帝某些本性的实在来认识和谈论上帝。在这个方面，基督特别体现了上帝向人类所展现的作为。^{〔25〕}

这个意义上，时间的实在性可以建立在基督事件的基础上。就是说，基督的复活其实是构成基督教思想家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立脚点。而这个基点并不只与人类社会的历史相关，同时也与自然世界的历史相关。按照莫尔特曼，随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与复活，以“末世”所指称的弥赛亚时代的时间已经临到这个世界。彼得对五旬节圣灵降临事件的解释表明，末后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是耶稣以其复活表明他就是弥赛亚这个事件所显露出来的。基督的复活表达出这种本质上全新的将来已经在现今时代开始：“新的世界时间闯入这个世界的时间，使之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26〕}在这末世，“基督事件”是将三一上帝神性时序与这个世界时间联系起来的桥梁。从客观实在的层面来说，这个时间段由两个相互间存在着一定张力的时间点——今世与末世——交织在一起。将两者连接起来，就拥有了凝聚在一起的时间段。

与前两种思路不同的是，既不是自然流逝的时间点自然的分出过去、现在与将来，也不是人在自己的心灵中按照自身的筹划分出将来、过去与现在，而是客观发生的复活事件带出来的应许所展开的历史视域给人带给盼望，这盼望给人带来将来。“将时间分成昨天和明天的不是发展、进步和进展，而是应许的话语介入事件当中，将现实区分成已经过去、可以抛诸脑后的，以及必须期盼、找寻的。在应许的话语上可以看到什么是过去，什么是将来。”^{〔27〕}当事者想要站在这个自然流逝的时间点之外，凭借着人自己是不可能的。对于人来说，唯一的可能性在于：某个外在的应许介入进来，通过对这个应许产生的盼望，将来出现了；相对于这个将来，衬托出

已经有的过去。进而只有在将来与过去连接起来的时段中，当下或现在具有其意义。作为境域之融合，这其中既有人经历到的一面，也有超越于人的、上帝之应许开启的那一面。

莫尔特曼看到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这似乎是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基本特征：“从本体论上说，过去难道不是在时间上居先吗？产生的东西消失了；期待变成了记忆；记忆变成遗忘；每种生成的结局都是死亡。”⁽²⁸⁾时间的指向似乎是经由现在流逝于过去；如果过去是事物走向的目的，那里就意味着它们的结束，那么似乎死亡就是事物的结局。其实，如莫尔特曼所期待的，当他强调未来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时，他已经是在讲时段的问题。从未来之应许产生的盼望所投过来的光照在这个被展开的时段上，不时地更新着过去以及对现在的理解，而它本身并不被过去所决定或被其吞没。就是说，并非现在、而是将来是时间之实在性的本体。

奥古斯丁所写的《忏悔录》，其历史叙事部分终于第九卷，自十卷以后的四卷主要讨论他遇到的一些理论的主题，如存在、记忆和时间等。第九卷在描述完他母亲在梯伯河口去世这个事件后结束。然而，第九卷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段叙事是，在他母亲去世前几天，他与母亲在梯伯河口的住所凭窗远眺时发生的那段谈话，其中他们谈到了末后生命的丰盛。那段谈话让“他们的心灵被一种热烈的激情提升到永恒存在本身，越过所有有形事物，甚至普照着大地之日月星辰所在的天上。”⁽²⁹⁾在这永恒中，他看到了智慧本身，“在这智慧中，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是存在，因为它就是永恒。存在于过去或将来都不是这智慧的特性。”⁽³⁰⁾或许对奥古斯丁来说，这就是那永恒进入到时间的“当下”。不过，这“当下”并非我们日常意义上的某个“现今”，似乎人们可以凭此再向将来展望，似乎在这个“现今”之后还有下一个“现今”。其实这个“现今”已经是将来，除此之外没有更

远的将来。就是说，从这个将来投过来的光既是他写作《忏悔录》的起点，又是它的终点。说它是起点是指，整个《忏悔录》不过是用这终末投过来的光让作者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用新的时间去连接和重整过去的时间，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时段。说它是终点是指，就历史的叙事来说，《忏悔录》只可能写到这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将来。●

-
- 〈1〉 李锦纶，《永活上帝生命主》，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44页。
- 〈2〉 奥古斯丁，《忏悔录》，XI，13，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以下均引自此译本。
- 〈3〉 同上，XI，11。
- 〈4〉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VI，10-14，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121-138页。
- 〈5〉 奥古斯丁，《忏悔录》，XI，24。
- 〈6〉 同上，XI，24。
- 〈7〉 同上，XI，24。
- 〈8〉 同上，XI，15。
- 〈9〉 同上，XI，15。
- 〈10〉 同上，XI，23。
- 〈11〉 同上，XI，16，21。
- 〈12〉 同上，XI，11。
- 〈13〉 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神学讲演录》，石敏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44页。
- 〈14〉 同上，146页。
- 〈15〉 《圣经·旧约》民数记14：21，28；以西结书14：16-20。
- 〈16〉 李锦纶，《永活上帝生命主》，230页。
- 〈17〉 同上，246页。
- 〈18〉 同上。
- 〈19〉 《圣经·旧约》诗篇41:13；90:2；106:48。
- 〈2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2页。

- 〈21〉 同上，390页。
- 〈22〉 同上，390页。
- 〈23〉 同上，391页。
- 〈24〉 “如果人类和地球的共同灾难毕竟还是可以避免的话，那么，当然只能通过使人类历史和自由历史共时化，……为了实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切实可行的共生，重要的是‘冷却’人类历史，减缓其片面性的进步。”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隗仁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92页。
- 〈25〉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5,9；I,10,2。中译本参见，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基督教要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 〈26〉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170页。
- 〈27〉 莫尔特曼，《盼望神学——基督教终末论的基础与意涵》，曾念粤译，香港：道风书社，2012年，105页。
- 〈28〉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164页。
- 〈29〉 奥古斯丁，《忏悔录》，IX，10。
- 〈30〉 同上。



哈里·伊耳哈特及其外孙吉米·肯尼迪（后来管理伊耳哈特基金会），1948年6月。
H. B. Earhart & Grandson Jimmy Kennedy, June 1948. Rights Held By: Donated by the Ann Arbor
News. © The Ann Arbor News. https://aadl.org/N071_0510_007.

沃格林、哈耶克……的赞助者

文 / 许宏

读书的收获，常常不仅来自书的正文。

对于关注研究和创作支持机制的人来说，前言、致谢、后记、版权页之类的文字往往透露出作者获得的帮助从何而来。

在本期《世代》的考察中，不少线索就是在很多书的正文以外被发现的。顺着如此线索，可以进一步了解提供帮助的个人或组织。那些在相对较多的书中正文之外出现的个人或组织，大约是某个或某些领域的重要支持者。

除了本期已经提及的有着明显基督教新教自由派、福音派、天主教背景的个人或基金会，还有一些个人或组织在近百年来于西方文明及人的生存根基方面也做出了资金支持上的贡献。

这或许值得做一点儿简要介绍。比如，十三年前，我收到埃利斯·桑多兹（Ellis Sandoz）教授的赠书时，不光从这位美国政治哲学家那里开始认识他和他老师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的思想。

我逐渐注意到，他们的书中多次出现“Earhart Foundation”（伊耳哈特基金会）的字样。后来，我在读他们同道的书时，也不止一次遇见这个组

织的名字。

我向桑多兹教授说起这个现象,并对此作了初步查询。相比皮尤、利历、坦普顿、洛克菲勒、菲尔斯泰德,伊耳哈特基金会可能既是更加不为大众所知却又是对西方近百年来政治哲学、经济学研究提供关键赞助的组织之一。

早在1929年,伊耳哈特基金会就已成立。然而,该组织不曾建立自己的网站,公开的信息非常有限。但就已知的来看,其所资助过的人士有一些是西方政治哲学、经济学界的重要研究者,而且这些学者在最初受其支持时大多还没有后来的知名度。

除了沃格林和桑多兹及其同道们,政治哲学界还有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及其学生和同仁们。经济学界的可能更有名,包括这几位诺贝尔奖得主: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1911—1991)、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919—2013)、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1910—2013)、加里·贝克(Gary Becker, 1930—2014)、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

与皮尤、洛克菲勒类似,伊耳哈特基金会的资金也源于石油天然气产业。其创立者是美国企业家哈里·伊耳哈特(Harry Earhart, 1870—1954)。

他曾经拥有的白星石油公司(White Star),后来变作美孚石油(Mobil)的一部分。他在密歇根安娜堡(Ann Arbor)的故居如今位于那里的路德宗协和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校园之中。

伊耳哈特是基督教循道会成员。基督徒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伊耳哈特看重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对于西方文明和人之自由

的价值。因此，他的基金会尤其支持跟此相关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1〉}

当然，沃格林、哈耶克、施特劳斯等人获得过的赞助不止来自伊耳哈特基金会。

沃格林、施特劳斯在20世纪中叶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所做“查尔斯·沃尔格林基金会讲座”（Charles R. Walgreen Foundation Lectures），是这两位政治哲学家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们各自的讲稿经扩充而出版，成为近几十年来西方思想界中影响深远的文献。^{〈2〉}

设立此系列讲座的是美国连锁药店沃尔格林（Walgreens）的创建者，查尔斯·沃尔格林（Charles R. Walgreen, 1873—1939）。

跟伊耳哈特近似，沃尔格林也重视美国传统的自由价值观。在去世前，他出于对当时欧美流行思潮熏染下的芝加哥大学的担心，出资创办了致力于美国制度研究的基金会。对流行思潮进行反思的学者，如沃格林和施特劳斯，就成了此基金会的受益者。^{〈3〉}

而沃格林早年时在维也纳大学（Universität Wien）的朋友哈耶克，则从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得到长期资助。

威廉·沃尔克（William Volker, 1859—1947）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美国家庭装饰企业家。沃尔克去世后，他的外甥哈罗德·拉诺（Harold Luhnnow, 1895—1978）开始将基金会的捐赠重心从地方慈善转向支持自由制度研究。

哈耶克得以执教芝加哥大学就离不开于拉诺的帮助。哈耶克虽然获得芝大的教职，而且他所任教的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也为关注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人士所知，这位经济学家在那里工资的来源却非芝大而是沃尔克基金会。

拉诺领导之下的沃尔克基金会，与伊耳哈特基金会有着相似的思路，

两者之间也就有捐赠上的显著交集。然而，由于它们特别是伊耳哈特比较低调，它们的存在便很少为大众所知。

在英语世界，提及它们的，一般是记载所谓现代西方保守主义历史的文献。但是，对于如沃格林、哈耶克而言，他们并不认同将自己简单归于如此标签式的分类之中，虽然他们及其赞助者们在对待流行思潮方面有某种或多种保守派的表现。⁽⁴⁾ ●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世代》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世代 Kosmos）或电子邮件（kosmoseditor@gmail.com）联系。

《世代》第 8 期主题是“研究及创作的支持机制”，却也有并非可以简单分门别类的文字。《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励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认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
- 〈1〉 Lee Edwards,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The Movement that Remade Ame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140. John L. Kelley, *Bringing the Market Back in: The Political Revitalization of Market*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1997), 62. Lee Edwards, “Earhart Foundation”,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 Encyclopedia*, edited by Bruce Frohnen, Jeremy Beer, and Jeffrey O. Nelson (Wilmington, Del.: ISI Books, 2005), 247-249. Alfred S. Regnery, *Upstream: The Ascendance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08), 186-188. Ivar Jons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ories to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63-164. Kari Barbic, “Harry Earhart”, *The Almanac of American Philanthropy: 2017 Compact Edition*, edited by Karl Zinsmeister (Washington, D.C.: The Philanthropy Roundtable, 2017), 103-104. Grace Shackman, “The Earhart Mansion”, *Ann Arbor Observer*, June 1997, <https://aadl.org/aaobserver/18380>. “Earhart Foundation”, Right Web, last updated: May 12, 2015, https://rightweb.irc-online.org/profile/earhart_foundation/. Gary North, “Anonymous Funding of the Academic Right: William Volker and Henry Earhart”, Mises Institute, May 10, 2018, <https://mises.org/wire/anonymous-funding-academic-right-william-volker-and-henry-earhart>.
- 〈2〉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3〉 Milton Mayer,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A Memoir*, edited by John H. Hick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49-166. John N. Ingha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V-Z*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3), 1533-1536.

⟨4⟩ Murray N. Rothbard, *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Right*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 67. Kim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The Making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from the New Deal to Reagan* (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42-43, 51-52. *Voegelin Recollected: Conversations on a Life*, edited by Barry Cooper and Jodi Bruhn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8), 43, 142-143, 210.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2006), 341-355.



约珥·弗莱士曼 (Joel L. Fleishman) 著,《基金会:一个重大的美国奥秘——私人财富如何改变世界》
(*The Foundation: A Great American Secret—How Private Weal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9。
https://www.amazon.com/Foundation-Joel-L-Fleishman/dp/1586487027/ref=tmm_pap_swatch_0?_encoding=UTF8&qid=&sr=

κ
ό
σ
μ
ο
ς

二零一九年第二期总第八期
夏季号

